ASPJ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中文（简体）

空天力量杂志

2010年冬季刊 — 第4卷第4期

本期主题：军队文化

- “不问，不说”军队政策调查报告
  美军退役将官调研组
- 挽救军人家庭
  Gene Thomas Gomulka 海军退役上校
- 培养外语人才：美国空军如何与民间高校合作共赢
  John Conway 空军退役上校
- 新版野战手册 FM 5-0 — 指导持久冲突时代中的指挥与控制
  Clinton J. Ancker 陆军退役上校，**Michael Flynn** 陆军退役中校
- 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理论研究
  李大光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

AIR UNIVERSITY
THE INTELLECTUAL AND LEADERSHIP CENTER OF THE AIR FORCE

在天空、太空、网空飞行，战斗，直到胜利。

本期导读

军队文化 2

将帅视角

带兵之道 （终篇） 4
Stephen R. Lorenz 空军上将 / 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司令

施瓦茨上将在英国皇家空军 2010 年空中力量研讨会上的演讲 6
Norton A. Schwartz 空军上将 / 空军参谋长

确保空军指挥与控制机制适应二十一世纪联合作战需要 11
Philip Breedlove 空军中将，Brian Tyler 空军少校

教育训练

新版野战手册 FM 5-0 — 指导持久冲突时代中的指挥与控制 13
Clinton J. Ancker 陆军退役上校，Michael Flynn 陆军退役中校

培养外语人才：美国空军如何与民间高校合作共赢. 20
John Conway 空军退役上校

“不问，不说”军队政策调查报告 34
美军退役将官调研组

挽救军人家庭. 48
Gene Thomas Gomulka 海军退役上校

陆军乐队上前线 54
John S. Fraser 陆军特级准尉

不标榜自我 58
Darryl W. Burke 空军准将

战略战术

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和此战略对美国空军的影响 60
Dale Hayden 博士 / 空军退役上校

澄清曲解和误解 — 效基作战理论没有错，错在用之不当 63
Jeffrey B. Hukill 空军退役中校

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理论研究 69
李大光博士 /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

反击时刻已到：将网络防御转向“作战化” 77
Nicolas Adam Fraser，Robert J. Kaufman 空军退役中校，Mark R. Rydell 空军退役中校

争鸣建言

零核错在哪里? 83
Charles E. Costanzo 博士 / 空军退役中校

实现可信核威慑 86
Samuel L. McNiel 空军中校

编读来往 94

军队文化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 这是中国军人当前的核心价值观；荣誉，勇气，忠诚 — 这是美国海军的核心价值观；忠诚，责任，尊严，无私，荣誉，正直，勇敢 — 这是美国陆军的核心价值观；正直为先，无私奉献，追求卓越 — 这是美国空军的核心价值观。

对照美国军人和中国军人核心价值观，我们既看到双方共性，也看到各自特征。而核心价值观是军队文化的浓缩。本期主要文章探讨美国的军队文化。

美国朝野对始于1993年的“不问，不说”军队同性恋禁令的辩论一直没有停止，最近更是一波多折，险象环生。“不问，不说”缘何牵动如此众多美国人的神经甚至可能成为掀翻总统宝座的定时炸弹?“‘不问，不说’军队政策调查报告”一文可给读者提供一些答案 — 以及更多的悬念。此文所附的 1,163 名退役将军请愿书亦能折射出这项法律无论是废除还是保留后的长远影响。同性恋问题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军队的担忧，也不是话题，这也许是中国一些军事和政策研究者对美军“不问不说”政策不闻不问的重要原因。但是从这篇文章中，读者应超越同性恋从军问题去思考其对军队文化和信念的深远影响。

本刊本年夏季刊“带兵之道”一文曾介绍空军把 2009 年 7 月到 2010 年 7 月定为“空军家庭年”，旨在稳固空军将士的“大后方”。和天之骄子的空军相比，在地面摸爬滚打的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对家庭“战备完好率”的重大意义或许感受更深，因为他们的婚姻/伴侣危机感更重。“挽救军人家庭”一文讨论现役和退伍军人的离婚及自杀现象，探索这些问题与军人长期驻外作战的因果关系，并提出一些疏导和缓解建议。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文工团奔赴前线慰问“英雄儿女”激励士气的故事令多少中国人感慨不已。美国军乐队也定期部署到战区。“陆军乐队上战场”一文向我们展示美国军乐队的更广泛功能，包括战略交往、部队支援、家庭支持、公共外交、社区关系、音乐教育等等。其中后三种功能明显是出于美军近年倡导的全频谱作战、尤其是维稳和民政支持方面的需要。

作战准则（条令）的编写和修订是美军各军兵种的一项长期活动。本刊2008年秋季刊曾发文介绍陆军 FM 3-0 野战手册《作战行动》更新版。与 FM 3-0 同期启动修订的还有 FM 5-0，现在新版 FM 5-0《作战过程》终于出炉。本期所登“新版野战手册 5-0 — 指导持久冲突时代中的指挥与控制”一文介绍这部新版文件的重大修改。新版 FM 3-0 和 FM 5-0 突出了美军对现代战争的思维转型，两部文件一脉相承，互相贯通，尤其都强调全频谱作战，都重视在作战计划中预先考虑行动结束后的维稳和民政支持。另外，FM 5-0 弃用“效基作战”等词汇，也都值得注意。

美军创造的效基作战理论（EBO）发轫于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初，成熟于此后数场战争之间，并写入各军种的作战准则。然而突然间，时任联合部队司令部司令的马蒂斯上将在 2008 年 8 月突然发函指示终止使用和 EBO 有关的术语（参看《联合部队季刊》2008 年冬季刊）。于是

辩论顿起。“澄清歪曲和误解 — 效基作战理论没有错，错在用之不当”即在此背景下于次年 3 月发表。作者在空军指参学院授课多年，深谙效基作战理论，底气不可小觑。并且，作者以退役中校之阶普通研究员之职，公然发文挑战显赫的四星将军，勇气可嘉，诤行可风。

自从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进入“维稳”和“民政支持”阶段之后，美国空军缺乏小语种外语军官的问题日益突出。如何解决?“培养外语人才：美国空军如何与民间高校合作共赢”一文试图解答。文章指出，美国空军培养军官一般通过三种途径：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最大来源，生源为报考民间高校的高中毕业生和民间高校在校生）、军官训练学校（第二来源，生源为民间高校毕业生）、美国空军学院（第三来源，高中生直接考入）。作为远期储备和爱国军事教育手段，空军还在许多高中设有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作者以严密的取证、分析和论证过程，证明在外语军官培养问题上，这几种入伍途径几乎都与民间高校（和初高中）的外语教育架构紧密相关，因此欲解决空军小语种外语人才缺乏问题，必须从民间教育改革做起。中国读者可顺带从此文中了解美国军官生入现役（Accession）体制与中国国防生入伍（Accession or Enlisting）体制的一些差别。

有人认为，美中军事实力对比中差距最小的领域是网络作战。此论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中国军方的确极其重视网络作战研究和运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李大光教授的专著《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即是最新成果之一。本期所登之“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理论研究”一文或可视为这位作者对其专著的提炼和浓缩。

美国军方在网络作战领域亦从不敢怠慢，如本期“反击时刻已到：将网络防御转向‘作战化’”一文所言，自 1992 年始即启动网络监控，更于 2010 年 5 月成立了跨军种的网空司令部（隶属战略司令部）。美国空军先行一步，曾计划设立空军网空司令部，后决定缩编为第 24 编号航空队，由第 67 网络战联队、第 688 信息战联队、第 689 作战通信联队、第 624 作战指挥中心等组成，归太空司令部指挥，并作为空军组成部队加入网空司令部的行动。作者认为美国空军在网络战中被动有余而主动不足，故而建议向“网空寻的和网空交战”的主动出击新战法过渡。

战略核威慑继续是本刊关注的主题，理由很简单：美国空军严重关切政府的核威慑政策走向、其对整个国家安全的冲击，以及其对空军未来发展的影响。本期“争鸣建言”栏目中的两篇文章 —“零核错在哪里?”和“实现可信核威慑”— 对国家当前政策均持反对态度。前文要求就核武器的未来开展全国辩论；后文提出美国不仅应继续目前的“可靠替代弹头”计划，更应“设计、试验和部署新型核武器”，以收重振美国核武器生产能力和恢复美国威慑可信度的双重效果。

本期“将帅观点”栏目登载三位将军的文章，其中包括洛伦茨空军上将的“带兵之道”终结篇。将军从戎四十一年，拥有特级飞行员证书，驾驶过 8 种机型，累积 3,300 飞行小时，带领过空军中队、大队、联队，主管过空军财务、审计、教育，可谓阅历无数。而今功成身退，于 2010 年 11 月从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司令一职回归平民。将军的“带兵之道”，连同他撰写的其他大量文章和演讲，将成为美国空军的宝贵财富。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

带兵之道(终篇)

General Lorenz on Leadership — Thank You

史蒂芬·R·洛伦茨上将，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司令（Gen Stephen R. Lorenz）

在2010 年的 11 月，我将正式退役，离开我热爱的空军。四十一年前我下车走进美国空军学院，情景恍若隔日。此后至今的每一天都充满意趣，因为我有幸与诸位共度风险，共享挑战。

我进空军学院的那年，空军才 21 岁。但在我看来，空军似乎并不那么年轻，总觉得它一直存在。我怀着敬畏之心研究空军高级将领的生平,他们的经历是如此丰富:二战、韩战、越战；他们有些人的衣橱里，在新制的空军蓝军装后面，还挂着早年陆军航空队的绿军装。

现在，我以同样的敬畏之心看着你们每一位。当今时代，区域性冲突前所未见，我们空军官兵所面临的挑战也无与伦比。你们每一天都在演绎精彩的人生 — 我为你们感动，也为你们骄傲。

在脱下蓝军装，退出空军现役之际，我想给你们留下三点人生感悟，也是我接受每一项任命时所遵循的三条不成文的原则。这三条原则帮助我在面对时间、资金和人力限制的平衡挑战时，每天都能保持健康的心态；也与我们空军正直为先、无私奉献、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它们让我受益良多，希望对你们也有所启迪。

第一条最要紧 —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珍爱自己的家庭。一定要对你的伴侣、儿女和家庭成员时时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让他们知道你是多么感激他们、热爱他们。归根结底，你之所以能够报效国家，全赖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他们也在以多种方式为国家服务，而且有时比我们困难得多。作战行动的快节奏，加上频繁部署，对前线和后方的每一个人都增添了压力。不论多么繁忙、多么疲劳，都请理解家庭的付出，抽出时间陪伴家人。

第二条，我们必须努力把营地越建越好，出门时胜于进门时。我常常告诉人们，当接受一项任命时，应挑选出最重要的两三个事项，排出它们的先后顺序，把这些挑战整合起来,对照长远目标加以应对。在当前形势下，有些努力可能需要比原来预期的更多人参与和更长的时间经营，才能体现其效益。请保持耐心,鼓励你的战士都积极投入其中。毕竟，营地的经营和改进需要整个团队的努力。

最后，我们每天都要乐于帮助别人改善人生。要记住每一个时刻都有其意义。如果你偶尔碰到某人突然向你道谢，那是因为他在过去某一刻曾经获得你的帮助。施者也许出于无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刻的重要性，但受者却可能因此改善了人生。经常有人对我表示感谢，或者为我多年前的几句忠告，或者为我不久前帮助解决了某个家庭问题。这些感谢常常令我动情，也叫我沉思，让我更加珍惜每一时刻的价值，理解每一时刻的意义。请时常注意自己一言一行的作用，永远坚持在带兵中言传身教。

自不必说，当我离开部队时，我希望自己留给别人解决的问题越少越好；希望因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们今天的空军环境比昨天更完善；希望由于自己的努力，更多的官兵提高了人生质量；希望自己在珍爱家人的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官兵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家庭。

行文至此，我要向美国公众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位卑未敢忘忧国，祖国把自己最宝贵的两件珍品托付给我们，其第一珍品即是他们的儿女。美国的青年豪迈献身国防事业，勇敢面对各种挑战，时刻准备着奔赴全球各地开展军事行动。空军将士在充满变数的动荡国际环境中顽强拼搏，越战越强。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祖国的未来无限光明，因为我们每天都有这些抱负远大的青年，志愿加入到军队中来。

美国人民还把国家的财富托付给我们。公帑之分厘都是美国家庭的辛苦收入和纳税奉献。人民之托重如山，身为美国军人，我铭感终身，心情恰如托马斯·培恩在 200 多年前所言："荣幸之至，诚惶诚恐。"对这份神圣职责，我们切不可有丝毫懈怠。

从军至今已然四十一载，回首以往所作所为，我常自嘲：有其意趣但终将消散。重要的是，在我脱下空军蓝军装、将之闲挂于衣橱之后，你们必须继续作为公仆，担负起带兵重任。如果你们能够践行我的上述三点感悟 — 珍爱自己的家庭、把营地越建越好、改善别人的人生 — 明天的美国空军就将继续保持为世界上最卓越的天空、太空和网空作战部队。感谢你们投身伟大祖国的国防，感谢你们改善了我的人生。愿大家志向高远 — 飞行、战斗、取胜！♣

史蒂芬·R·洛伦茨，美国空军上将（Lt Gen Stephen R. Lorenz），毕业于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北科罗拉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2010 年 11 月退役，退役前任美国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司令。洛伦茨将军是特级飞行员，拥有 3,300 个小时飞行经验，驾驶过 8 种机型，曾指挥一个空中加油中队、一个分布在不同地点的作战大队、一个空中加油联队（获得 1994 年第 15 航空队 Riverside 最佳联队奖）以及一个空中机动联队（获得 1995 年第 21 航空队 Armstrong 最佳联队奖）。将军曾担任过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学员队指挥官，并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空军总部负责财务管理和审计的空军助理部长办公室服务，担任预算处助理副处长，后调任美国空军大学校长。洛伦茨将军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校、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空军战争学院和国家战争学院毕业生。

施瓦茨上将在英国皇家空军 2010 年空中力量研讨会上的演讲

Gen Schwartz's Remarkes at U.K. Royal Air Force Air Power Conference 2010

诺顿 ·A· 施瓦茨上将，美国空军参谋长（General Norton A. Schwartz）

2010 年 6 月 18 日

引言

女士们先生们，能够面对这样一批出类拔萃的听众发表讲话，我深感荣幸。拜福德上校，非常感谢你热情的介绍。我的朋友和同仁 — 道尔顿将军 [英国皇家空军参谋长]、帕络默若斯将军 [法国空军参谋长]，以及伯尔南迪斯将军 [意大利空军参谋长] — 和我一样，都相信空中力量在现代军事成功中的核心作用，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空中力量的本质属性，亦即其无与伦比的速度、远程、灵活性和普适性，都将保持不变；但是空中力量的运用，以及其追求的可调、及时和精确的效果，必须根据当前战争的要求不断评估和修正。同样，我们的人员和设备也必须妥善部署，以有效地应对战略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带来的不断变化的、多层面的挑战。

这进一步意味着，军事战略家必须不断调整自己，适应当前的现实和趋势。意识并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在关注目前行动有效性的同时，前瞻未来的威胁。难题是，我们的战略环境似乎越来越模糊。随着环境出现新的特征，生发新的要求、角色和责任，战略家在领会形势和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困难显而易见。此外，全球经济衰退造成财政紧缩和购买力下降，将迫使我们各自国家在预算中削减或至多维持国防开支。这将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能力建设，使我们更难在既满足今天的要求又备战明天的挑战之间做好平衡。

简言之，这种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严峻性的聚合效应，要求我们空军从伙伴角度去考虑，为了我们各自国家的国防和我们共同的安全利益，各国空军作为整体将发挥哪些作用？本国空军作为个体又应该发挥哪些作用？

女士们先生们，我有幸今天有机会表述自己的想法，讨论美国空军在这些努力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平衡各方利益的需要越来越紧迫，以及为什么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复杂化在国家预算进一步吃紧的背景下将使这种平衡更加艰难。空中力量的显著作用不容置疑，它能向国家领导人提供更多的战略选择；由此，正如道尔顿将军即将在他备受期待的演讲中所言，空中力量必将赋予更大的“政治机动自由。”

进一步，当我们各自的国家在调理治国手段的效率时，我们空军界必须考虑空中力量如何通过最佳途径做出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为国家决策提供相关的信息，以及，我们作为伙伴空军和伙伴国，如何在这项努力中携手共进。

为二十一世纪制定战略

我们所熟悉的二十世纪国际安全环境中的那些元素，已被二十一世纪政治、社会经济、金融、法律、环境、信息、军事等相互关联

的新元素层所取代。虽然这些元素本身并不新，但各种元素的具体表现和互动构成一种非常不同于我们的空军在组建时的战略格局。

正在窘境中挣扎的全球经济进一步加大了挑战难度，迫使各国政府紧缩开支，削弱购买能力。因此，各自国家预算中的国防份额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难见增长，或者被砍削，使得我们更难做出战略选择，也易引起更多争执。

所以，我们身为军人，不仅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战争认知模式，而且要理解这种环境演变的复杂性和后果。美国倡导安全与繁荣、对普世价值的广泛尊重、对法治的根本认同，以及有益合作的国际秩序，通过这些作为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我们必须依靠全政府努力,运用深思熟虑、全面平衡、精心整合、相辅相成的国家力量工具，处理多方面的挑战，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充。这正是国务卿克林顿和国防部长盖茨所称的“巧实力”的本质和精髓。如果说克劳塞维茨提出了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关联，那么当今的思想家们进一步证明两者已经密不可分。国家权力的各种工具互联互动，是在当前和未来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自明之理。

自明若此，我仍觉得“全政府努力”并不够,我认为应该是“全国努力”— 包括政府、工业界、学术界和其它有影响的各界，共同努力克服挑战。我们与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我们在诸如今天的空中力量研讨会等论坛上的研讨，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新思路，引领向充满创意并切实可行的新战略。

此外，我们与民营工业的合作，特别是双方为着共同的事业时，一直是我们创新、发明和进步的源泉。然而，随着产业界的兼并趋势，企业数量逐步减少，越来越多的公司跨国经营和设立子公司，再加上金融和业务风险增大，关系复杂，政府、军队和企业的领导人可能不得不重新反思旧的范式，以顺应当前环境求取平衡与整合。否则，面对新兴的市场与客户，更广泛的人才资源所带来的好处，更全球化的供应链所体现的效率，以及经济规模的增长和稳定的成本，我们将无所适从，难加利用。

即便是“全国努力”，仅有美国一国也还是不够。有关各国政府必须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动员有着共同追求与目标、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友人、国际伙伴和盟邦等一道努力。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就强调与长期盟友和新兴伙伴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国防部在今年二月公布的《四年防务评审报告》也提倡这种合作。

展望未来，决策过程将更加困难，因为想求取的平衡更加微妙，并且体现在许多层面上，例如：

- 当前需求与未来能力之间的平衡；
- 全球力量投射能力与本国和地区防务能力之间的平衡；以及
- 应对当前不规则威胁与备战未来可能的高端及大规模冲突之间的平衡。

单枪匹马，实现平衡的难度将更大；合作行动，实现平衡的机会将更多。虽然我们在努力建设“全方位服务”能力，但事实上，各国空军不可能面面俱强。如果大家能合作互补，每一方都在多个使命领域和兵力部署方式上发挥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在所有层次的冲突上发挥能取得平行效果的最大程度的普适性，那么，各家的不足之处可以通过团队合作解决。

事实上，我们在遥驾飞机和无人飞机运作上，在天基“情监侦”合作上，在战术空中控制、近距离空中支援、特种作战、作战搜索与救援、战区内空运和空中加油等方面，都已开始开展联盟合作和团队运作。这些成功表明，我们必须继续共同合作，为实现更大的交互操作和协同而努力，最终将增强我们的战略选择，同时降低风险和潜在的责任。

运用空中力量支持国家战略

的确，作为一流的空军，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空中力量如何做才能继续促进这种全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努力？空军必须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才能确保联合和联盟部队在战场行动的自由，才能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外交斡旋的能力？当然，我们的空军将必须顺应我刚才描述的多方面战略环境 — 但是怎样去顺应？

以美国为例，美国空军特别擅长、能够，并准备好在四个领域与联合和联盟伙伴们开展合作：夺取制空制天权及在网空保持强大行动能力；全球精确打击；全球快速机动；以及全球情监侦行动。在所有这些使命领域，美国空军致力立足全球视角，在全球范围发挥空中力量无与伦比的速度、远程、灵活性和多功能性。

例如，友军在任何战场行动都必须享有制空权，才能保持行动自由同时将空袭风险降到最低。即使敌方的空中威胁可以忽略不计，友军的空中力量能够对敌军的地面部队构成持续威胁，从而增强联合和联盟部队在地面的行动自由。

那么，作为一支全球力量，意味着空军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对任何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我们就必须确保对此地区的制空权和制天权，投射军事力量，以实力支撑外交努力、宣传影响和经济手段。而且，鉴于我们对任何领域的控制和兵力投射越来越依赖于在其它领域自由行动的能力，因此，我们在执行国家使命的过程中必须实施跨域合作，以保持我们国家的优势。

以战区作战为例。我们需要运用空中力量的机动性、空中打击和情监侦能力；需要运用太空的一些保障能力，如精确导航和定时、卫星通信、气象观察、早期预警，以及情监侦；我们还需要发挥网空的潜力，用以传送信息和保障我们的整个指挥与控制体系运作。还有，虽然我们主要依靠海军和商业船舶将作战物资运入战区，但地面联合后勤部队必须执行战场物资供应链最后一段距离的运输。这几个例子表明各种作战空间互有区别但又紧密相关，行动从地面开始，升向天空和太空，又经由网空实施整合，实现指挥与控制。

显而易见，我们必须依赖跨域保障能力。就最近而言，我们在这些领域尚未受到重大挑战；但是由于这些领域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性不断增长，挑战也将逐渐激烈。我们的对手和敌人已经认识到这些共用区域的中心作用。可以预期，挑战将不仅来自所谓“近乎同等”的对手，而且其他一些与我们利益相左的非国家实体也会挑战我们目前所享有的宽松环境。人们可以合理地断定，随着敌对实体的挑战逐渐逼近，如何以威慑遏制侵略或挫败敌人阻止我们进入全球公域的行动，将继续是本世纪的重大任务。高新技术的扩散，特别是计算能力的爆炸性提升，大幅度降低了入场门槛，使得某些潜在敌手能够实施某种程度的制域权。于是，即便是个人或者非国家实体也能够影响战略环境；而战略

环境曾一度被只有享有相当资源的国家所控制。

顺便说一句，谈威慑并不是怀旧。我们必须有能力继续劝服我们的对手，威镇我们的敌人，同时让我们相互之间放心，让我们的朋友和盟邦放心，相信我们将恪守对全球稳定和安全的承诺。我们的全球打击空中力量，连同我们的核力量，继续是美国和盟国推行这种战略威慑的基石。因此，我们对空战部队和核能力的承诺仍将是我们的最高优先。

在建设持久远程打击能力的道路上，我们开始向一整套系统进行初步投资，这些系统将比那些完全独立及更加尖端昂贵的系统能更好地解决当前更迫切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严格控制成本和新出现的需求。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例如：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核常并举还是仅抓常规、防区外打击还是渗透突防，等等。另外，速度、航程、有效载荷等因素之间如何统筹兼顾。但不管如何，我们的决心不容置疑，这就是运用空军和国家的能力向全球投射军事力量，把世界上几乎任何目标置于打击范围之中。美国空军正与国防部长办公室一道，对这些要求进行界定，以确定这一整套系统的运用方式和组成，一切为着能合理地满足美国及其盟国的远程打击需要。

当然，这种作战能力和全球软硬实力的投送需要机动部队的支撑。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仍在继续之中，我们的空运作战也将继续绷紧。自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开始以来，空军已经快速空运了 300 多万吨物资和 700 万人次。加油机将继续担当美国全球力量投送的骨干，过去九年间完成的 32,000 次空中加油就是最好的验证。由此可见，空中加油能力将继续是我们的战略要务。

在这种空运努力中，还包括我们追求的更广泛战略平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建立伙伴空运能力。例如在阿富汗，我们的作战空军过渡部队为阿富汗国民军航空兵提供重要的培训，帮助他们在今年初执行了第一次空袭任务，由两架 Mi-17 将阿富汗国民军的突击队空运到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

我们知道，单打独斗不可能包打天下，但这只是建立伙伴能力的原因之一。我们经常发现，在战术和战役层级上完成的任务，却在战略层次、甚至大战略层次上收获效果。且举一例：去年 9 月，阿富汗航空兵第一次独立执行了医护后撤行动，将一名阿富汗伤兵从战场空运到医院，完成了这支部队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行动。这一事件的长远意义不可低估。这些轻型机动作战行动将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信心，因为战士知道他们再不会被遗弃。阿富汗国民军增强了凝聚力，就能有效地执行更重大的使命；增强了信心，就能加强部队的忠诚。凝聚力和信心只能发自内心，其他的灌输方式都不会生效。美国空军及其联盟伙伴能够为之建立基础，我们的空军战士将致力于这项努力。

顺便再举一例，它有力说明战术空中力量的成功能不断展现巨大的战略价值，这也是空军普适性的本质所在。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努力帮助阿富汗建设本土空运能力，使偏远腹地的民众缩短与喀布尔中央政府的心理距离。阿富汗的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山区乡村世代与世隔绝，阿富汗本土飞行员将喀布尔官员空运到遥远的乡村，与民众建立并保持前所未有的实质性关系。空中力量还促进了其他有意义的接触，例如在

去年 11 月的朝觐活动中，中央政府向许多阿富汗人提供交通，将他们从偏远地区空运到中心城市，以便他们前往麦加朝圣。在一个电视机都罕见和文盲率高达 70-80% 的国家，这些直接互动正是中央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关键所在，是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推行有效治理取得重大进展的体现，因此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总之，无论是在冲突地区执行作战还是灾区执行人道救援，空中力量使我们各国具备快速和及时空运、空中加油、空中医疗和伤员后撤的能力，获得精确与准时空投及动能与非动能打击效果。空中力量不仅能迅速介入危机，而且可在持续行动过程中稳定提供不间断和可靠的能力。

所有这些能力的发挥都离不开我们的情监侦系统架构。我们为各级领导人，从战场指挥员到国家事务决策者，提供无与伦比和前所未有的态势感知。从目前来看，对反映战场动态的近实时、全动态和宽域视频的需求将有增无减。我们已经定下了在 2011 年底实现空中战斗巡逻始终保持 50 架的硬性目标，为此，我们从美国空军其他使命领域调遣了 4000 多名官兵专门执行情监侦作战。同时，我们正在努力创新运用高科技，改进人力密集型方式，应对需求的不断增长，尽管我们的能力也在增长。这种能力，连同联盟伙伴提供的重大能力，也将有助于满足联盟作战的需求。从“北方守望”和“南方守望”，直到后来的“伊拉克自由”和目前仍在进行的“持久自由”，在所有这些作战行动中，联盟军队在战术侦察领域的贡献对于发现敌人行为模式非常有用。要推测敌军究竟是躲在角落，还是在屋顶或者墙后非常困难，情监侦能力有力帮助了我们的地面部队发现敌人。这种能力对所有层次的冲突 — 无论是战略、战役、还是战术层次 — 都必不可少。

结语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有许多的机遇，也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努力构成挑战。我们必须依靠坚定的决心和坚强的领导，来实现机遇，并克服不确定性。我们所处的现实中充满微妙、复杂和模糊，它们将继续存在下去，构成不可预见的挑战，要求我们找到尚未找到的化解之道。但是，通过与长期联盟和新兴伙伴合作，我们将继续寻求共同的目标，面对共同的挑战，整合我们的战略，战胜挑战，同存共荣。

我渴望与大家讨论未来的合作方式。有人可能会对我今天表达的观点提出质疑，也有人可能认为这些观点不言自明。无论为何，我们只有通过象本次会议上这样坦率的讨论才能取得进展。我们都正全力以赴于当前的冲突，作为空军战士、作为空中力量战略家、作为领导者，我们有责任充分认识和理解认真规划未来的迫切需要。我希望我的这番话，以及这次会议上其他各位资深发言人的演讲，能够激发我有幸视为战友、我有幸称为美国伙伴、以及全球空军界的同仁，开展持久的有意义的讨论；我们作为空军，志在提供全频谱能力 — 包括制域权、远程打击、空运和情监侦 — 而不仅仅是互相分离的能力。

祝大家返程安全，前途光明。♣

确保空军指挥与控制机制适应 21 世纪联合作战需要

Reenabling Air Force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Twenty-first-Century Partnerships

菲利普·布里德勒夫，美国空军中将（Lt Gen Philip Breedlove）
布莱恩·泰勒，美国空军少校（Maj Brian Tyler）

时机已到，美国空军应调整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C2）机制，视之为当前复杂安全环境中开展联合作战的一部分。今年早些时候，联合参谋部发布了联合作战准则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的最新版本。[1] 和所有的作战准则一样，JP 3-30 的发布标志着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这部准则是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努力的结果，归纳了各军种在天空和太空开展 C2 运作的经验和理解，给今后的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提供了权威指导。文件中包含若干重要的概念，例如主战区和次战区联合部队空中统一指挥官（JFACC）的组织协调、空中部队协调单位的作用、对遥驾飞机的 C2 运作，以及指派 JFACC 负责太空作战协调权限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JP 3-30 的发布也标志着新一轮修订从此开始。信息时代的演变要求我们连续改进；我们空军也始终在创新求变，立志保持在天空、太空和网空领域的优势。现在有了新版 JP 3-30 为我们的联合部队阐明当今空中作战的 C2 原则，我们鼓励空军官兵重开讨论，思考如何为着明天的联合作战建立最有效的天空、太空和网空部队指挥与控制机制。

这场讨论应关注两个全局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联合部队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另一个是关于作战灵活性。在第一个问题上，指挥官个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比指挥体系关系更加重要。历史上有过很多成功合作的范例：罗伯特·李将军和托马斯·杰克逊将军、欧玛·布雷德利将军和埃尔伍德·丘萨达少将、诺曼·施瓦兹考夫将军和查尔斯·霍纳中将、汤米·弗兰柯斯将军和迈克尔·莫斯利中将，等等。这些伟人（及其参谋人员）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频繁互动，共同应对困境，及至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无论我们今后如何组织空中部队和 C2，我们都必须有意识地加强**联合**指挥官和**联合**策划人员的相互接触，以期加强**联合**信任，从而实现统一（联合）指挥和（联合）效果的永恒原则。当杰克逊将军在 1863 年的钱萨勒维尔战役中受伤阵亡之后，李将军悲痛地说，他失去了右臂。如果空军官兵对联合部队的其他伙伴单位也保持同样强烈的感情，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再谈作战灵活性问题。未来联合部队的空中部队必须充分利用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的速度、远程和灵活性等优势，做到快速响应，值得信赖，胜任各种安全挑战。国防部长盖茨在介绍 2010 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时说，“美国需要拥有广泛的军事能力和最大程度的普适性，能应对最宽广冲突频谱内的各种事件。”[2]

假定资源是有限的，那么我们的打击能力就在于灵活性。灵活性在我们的兵力结构、兵力体现、作战能力、使命和流程中都不可缺少，其意义重大。就 C2 而言，JFACC、联合部队空中作战中心和整个战区的空地系统必须能够执行从大型突发事件到平叛和人道救援在内的各种作战行动。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精通集中规划流程（如战略打击），也要精通分散规划流程（如平叛），既能有效提供整

体支援，也能有效提供直接支援。我们的联合部队和联盟部队伙伴都知道，不存在所谓“一付药方包治百病”的普适方法，因此 JFACC 必须审时度势，灵活指挥和控制天空、太空和网空部队。

再者，随着美国陆军向旅级战斗单位建制过渡，把以前由师级单位控制的资产下放到旅级，我们的作战灵活性就变得更加重要。当间接火力、防空和情监侦资产分散运作时，原本就复杂的空域控制和区域防空就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如果联合部队对快速响应和资产保证的要求超过集中使用和效率的优点时，JFACC 就必须及时调整，适应变化，否则将被边缘化。

最后，我们关于未来 C2 的讨论还应该关注网空领域今后的发展。2010 年 5 月，美国参议院确认了基斯·亚历山大将军（Gen Keith Alexander）担任美国网空司令部司令的任命。我们空军采取了一些关键行动支持国防部在网空领域的建设，包括指派第 24 航空队作为网空司令部内的空军部队。在我们探索网空作战的 C2 时，联合部队各单位的相互信任和作战灵活性仍有直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集中执行网空作战 C2 是恰当的。但是我们也能想象，当某个联合作战区域内某些网空作战行动的协同和响应能力对战役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时，则有必要移交某些特定的 C2 权限。就像 JFACC 可以承担太空作战协调权限一样，他们也能向联合部队指挥官们请求承担网空协调权限。空军指挥官、太空指挥官以及空天作战中心太空专业人员在第 14 航空队和太空界内建起的桥梁，给联合部队带来了巨大的价值。在网空领域，我们能否建起类似的桥梁，把联合部队指挥官们和相关的网空作战能力联结起来？

JP 3-30 体现了 JFACC 和 C2 的成熟程度有了巨大提高。现在，开展另一场关于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未来 C2 的健康讨论及反思的时机已经来临。♣

注释:

1. Joint Publication 3-30, Command and Control for Joint Air Operations [JP 3-30：联合空中作战的指挥与控制], 12 January 2010,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30.pdf.
2.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 Gates, “Defense Budget / QDR Announcement”[国防预算 /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发布声明] (speech, Arlington, VA, 1 February 2010), 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16 (accessed 18 June 2010).

菲利普·布里德勒夫，美国空军中将（Lt Gen Philip Breedlove, USAF），乔治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理学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理科硕士，国家战争学院理科硕士，现在华盛顿特区美国空军总部担任负责作战、规划与要求的副参谋长，就制订支持天空、太空、非正规战争、防扩散、国土安全、气象和网空作战等领域的政策策略向空军部长和空军参谋长负责。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空军作战的代表，他负责审定支持国家安全目标与军事战略所必需的作战要求、能力及训练。担任现职以前，他曾任驻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的第三航空队司令官。他是指挥飞行员，拥有超过 3,500 小时的飞行经验，主要飞行 F16 战机。布里德勒夫中将曾在“联合锻造 / 联合监护行动”中执行过作战飞行。

布莱恩·泰勒，美国空军少校（Maj Brian Tyler, USAF），美国空军学院毕业，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硕士，现就读于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大学高级空天研究学院。此前他作为空军研究员派赴华盛顿特区美国空军总部作战、规划与要求部从事战略政策实习。泰勒少校参与过欧洲、非洲和阿富汗的信息与网空作战的战役层规划。他也曾多次主导朝鲜半岛及伊拉克上空 U2 与 RQ1 使命的情监侦收集、处理、运用和发布行动，并担任第 67 网络作战大队分队长、联盟联合特种作战空中部队情报副主任，及西南亚联合特遣部队情报收集主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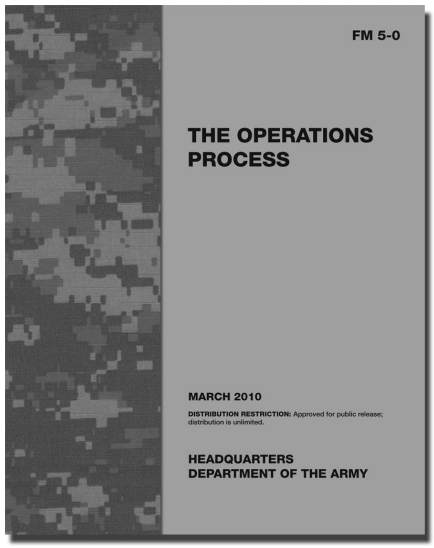
新版野战手册 FM 5-0 —
在持久冲突时代实施指挥与控制

Field Manual 5-0: Exercising command and Control in an Era of Persistent Conflict*

克林顿·J·安科三世，美国陆军退役上校（Col Clinton J. Ancker, III, Ret, U.S. Army）
迈克尔·弗林，美国陆军退役中校（Lt Col Michael Flynn, Ret. U.S. Army）

从七年多的战争中，我们获得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迫切需要提高战斗指挥的认知能力 — 提高理解力和设想力。[1]

— 威廉·B·考德威尔中将（Lt Gen William B. Caldwell）



美国陆军作为联合部队中与其它伙伴相互依存的一部分，继续在世界各地参与全频谱作战行动。纵观全球趋势 — 比如一些国家正在或已经衰败、资源需求加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 未来几十年很可能呈现**持续冲突**的特征。那些越来越依赖暴力手段实现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的国家、非国家及个人行为体之间无疑将沉陷在长期对抗之中。我们陆军无论是应对自然灾害还是打击武装敌人，都将继续在复杂的、变化不已的、不确定的作战环境中开展行动。

作战经验和教训、军事转型带来的变化，以及最近对联合作战准则及陆军作战准则的修改，都要求现在对野战手册 FM 5-0《作战过程》进行重大修订。自 2001 年开始的战争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们需要提高指挥与控制中的“思考”能力。[2] 2010 年版 FM 5-0 强调指挥与控制中的认知能力，体现了陆军作战准则的一个重大发展。

新版 FM 5-0 描述了在开展全频谱作战行动中指挥官应如何 — 在参谋部、下级指挥官及其他伙伴的支持下 — 行使指挥与控制。在行动中，指挥官面对的是不断思考和适变的敌人、经常变化的民众看法，和作战区域内各种组织的不同侧重。指挥官预测敌人的行动、民众的反应，或事态的发展，都不可能做到精确无误。在实施作战行动中，指挥者必须不断预测、不断学习和调整，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不断适变的对手。为了达到最好的结果，指挥者必须全面了解环

* This article is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Military Review*, the Professional Journal of the US Army, Combined Arms Center,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March-April 2010 issue of *Military Review*.

境、辨识问题、构思出解决或控制问题的方案。立足于这种理解，指挥者便能制定出简洁而灵活的作战计划，在计划中着重关注希望达成的结果，从而将自己的设想和意图有效传递给各方。指挥官必须鼓励各部队之间在整个行动过程中保持合作，从而更好地了解形势，及时调整计划或重新辨识问题。

修改过程

FM 5-0《作战过程》的修订与 FM 3-0《作战行动》的修订在 2006 年同步开始。在修订 FM 3-0 的过程中，合成兵种条令编写处（CADD）向军队和民间许多组织的广大关注人士发送了一系列询答文件，旨在激发争论，从而在陆军作战准则的总纲文件的总体方向上取得共识。讨论议题涉及的范围从陆军的全频谱行动作战概念到作战职能（情报、调动与机动、火力、保护、后勤支持、指挥与控制）的构成。从这些询答的反馈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缺陷，其中包括：作战准则对作战评估没有给出充分说明；需要更好地说明如何把维稳行动纳入全频谱作战行动；需要就指挥所的组织与运作给出指导；以及需要阐明陆军对所谓“效基作战”的立场。[3] 为了解决这些不足，陆军编写了 2006 年颁布的过渡版野战手册 FMI 5-0.1《作战过程》。这部过渡版文件弥补了作战准则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一直使用到 FM 3-0 和 FM 5-0 中的观点得到充分审视、评价和正式发布。FMI 5-0.1 为 FM 3-0 的指挥与控制章节提供了依据，也为 FM 5-0 的修订奠定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陆军还审察了一些概念，帮助指挥官理解那些复杂且结构错乱的问题，并给出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直观设想方法。训练和条令司令部（TRADOC）的陆军概念整合中心、高级军事研究学院（SAMS）和陆军战争学院等几个统称为“设计班子”的组织，探索了如何把设计的理论和原理与军事行动的实际应用相结合。在 2008 年元月，TRADOC 发行小宣传册 525-5-500《指挥官的理解与作战设计》，解说如何通过设计来强化指挥与控制的最新观点。与此同时，SAMS 也编写并开始讲授自己的“作战设计艺术”课程，内容包括设计的理论基础，和通过三个正式练习掌握将设计应用于实际作战的过程。TRADOC 的小册子和 SAMS 的努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指导我们将作战设计融合到陆军关于指挥与控制的作战准则中。[4]

在过去三年的重大合作努力中，陆军配备人力编写了三份 FM 5-0 草案，呈送联合参谋部、各作战司令部、相关的跨机构组织（包括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审阅。合成兵种条令编写处召开了三次上校级行动执行军官会议，目的是汇总与融合各方面对三份草案提出的 3000 多条意见，以尽量吸收专家的见解、思想和经验。会议组织了专题论坛，旨在促进争论、达成共识、并赶在 2009 年 12 月举行 TRADOC 指挥官审批会议之前议决来自评审机构的关键而重要的意见。

主要修改及理由

读者将注意到新版 FM 5-0 的一个首要变化是标题，原名“陆军计划制定和命令生成”（Army Planning and Orders Production）被改为“作战过程”（The Operations Process）。新的标题意味着 FM 5-0 在内容上也有重大修改。新版 FM 5-0 保留了有关计划制定与计划成果的细节，同时扩大了这部文件的范围，纳入了关于在整个作战过程中行使指挥与控制的作战准则。这一变化的目的是想更好地说明作战过程中所有活动 — 不只是计划制定 — 之间的动态关系。

文件中描述的作战过程是一个典型的部队学习过程模式，它包含行动期间实施的主要指挥与控制活动：作战计划、准备、执行、连续评估。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驱动作战过程。作战过程的活动可以顺序开展，特别是在整个行动过程的起始阶段。然而行动一旦开始，指挥部常常把各项活动的某些部分同时进行，并根据形势需要在作战过程中不断循环。

作战过程的概念（计划、准备、执行、评估）虽然简单，但其执行却是动态的。指挥官与参谋人员使用作战过程来整合众多的活动，其中包括整个司令部执行的数百项任务。指挥官必须组织和训练参谋人员运用批判和创新思维，同时开展作战的计划制定、准备和实施，并持续评估进展情况。

陆军这种通过作战过程行使指挥与控制的模式并不是新创造。2001 年版 FM 3-0 和 2003 年版 FM 6-0 都对战斗指挥和作战过程作了详细论述，2005 年版 FM 5-0 也描述了如何把作战计划的制定融入作战过程。然而，新版文件的不同之处在于更着重强调指挥官在作战实施中的作用，更详细说明了在行使指挥与控制期间指挥官、参谋班子、下级指挥官，以及其它伙伴之间的互动关系。新版 FM 5-0 把作战过程视为一个整体，专辟一章论述作战设计，再各辟一章论述作战过程中的每项活动，通过附录阐述组织司令部实施作战的战术、技巧和规程，包括如何运用军事决策制定程序（MDMP）、执行部队领导程序和编写作战计划与命令。

立足于全频谱作战

2005 年版 FM 5-0 中的示例和重点都集中在进攻和防御作战上，而新版 FM 5-0 通篇贯穿全频谱作战这一核心思想，是以强调对全频谱作战的关注。这部新文件要求指挥官理解作战环境中的民众因素，注重这些因素对使命 、敌人、地形与天气、部队与可用支援，以及时机等的影响。FM 5-0 强调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指挥官要始终关注如何在行动的计划制定和执行中把针对民众的维稳任务与针对敌人的进攻及防御任务结合起来。它描述了运用各种尝试线制定全频谱行动计划的方法，并修改了陆军的作战命令，以更好纳入对民众的考虑和维稳任务或民政支援任务。

有关执行行动的一章描述指挥官如何使用部队和其它资源在关键地点和时间实现集结性效果，解说指挥官如何争夺并保持主动权，如何建立并维持强势，以及如何充分利用行动成果。另外,有关使命型指挥（Mission command）方式的指挥与控制原理以及允许合理风险的原则在这一章中和新版 FM 5-0 通篇中都有详尽说明。

把作战设计纳入陆军作战准则

> 失败之常因，不在未能解决问题，而在未能发现问题的要害。
>
> —罗素·L·阿科夫（Russell L. Ackoff）[5]

全频谱作战行动如果在民众集聚区域中展开，指挥官必须以这些民众为背景思考问题，才有望取得成功。作战设计，就是在了解背景之后，确定如何、是否、以及何时行动，这也是指挥艺术的内在部分。新版 FM 5-0 描述了贯穿作战过程的设计做法。

作战设计是运用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来理解、设想和描述复杂而结构混乱的问题，并制定出解决方案。设计是为作战过程中行

使战斗指挥提供依据，指导如何反复并常常循环性地运用理解 / 设想 / 描述过程。设计有助于澄清计划制定中的概念问题，包括了解作战环境和辨识问题，设想期望达到的终局状态，就解决或控制问题形势的全局作战方式形成概念。指挥官在设计概念中说明自己的理解和设想,并由此制定出更详细的计划。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应不断开展设计。指挥官一边实施一面学习，从而不断更新理解和修改设想，并描述这些设想以修正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指挥官也许不只是修改基本计划，而可能决定重新辨识问题，制定新的作战方式，结果得出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

新版 FM 5-0 专门有一章论述作战设计，描述设计的基本原则,提供设计的全套方法。而在介绍作战过程、计划制定、行动执行和行动评估等基本做法的章节中，也都涉及到作战设计。另外，新版文件的附录在介绍军事决策制定程序时也描述了如何将设计与军事决策制定程序衔接。

其它修改

新版 FM5-0 除了扩大论述范围即涵盖作战过程中的一切活动及纳入作战设计这个概念之外，还做了以下重大修改：

- 把基于“战场作战系统”的指挥与控制技巧和成果改为“作战职能”。此修改影响到好几个领域，包括组织参谋开展作战和调整战斗命令及其附件的格式。
- 强调并说明指挥官如何运用五项“陆军信息任务”来营造作战环境。
- 描述指挥官如何把参谋部组编为指挥所、指挥站、工作组、操作台来实施作战过程。
- 更新 MDMP 和战斗命令格式，以更好地说明设计、全频谱作战、作战职能 ，以及五项陆军信息任务。

作战过程的基本原则

除了 FM 3-0 阐述的作战原则之外，FM 5-0 规定的作战准则进一步建立在六项基本原则上：

- 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驱动作战过程。
- 形势理解是有效指挥与控制的基础。
- 批判与创新思维有助于整个作战过程中的理解和决策制定。
- 指挥官不断思考并把针对民众的任务（维稳或民政支援行动）与针对敌方部队的任务（进攻或防御作战）结合起来。
- 使命型指挥是行使指挥与控制的首选方法。
- 持续评估能够使部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不断学习和适变。

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驱动作战过程。新版 FM 5-0 的一个关键主题是指挥官在作战过程中的中心作用。参谋人员履行扩大作战效能的基本职能，但指挥官通过战斗指挥在作战过程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战斗指挥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需要理解、设想、阐述、指导、引领和评估行动，领导部队完成使命。

战斗指挥的各项活动和作战过程的各项活动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战斗指挥的所有活动发生在计划、准备、执行和评估期间，但在作战实施全过程中各阶段呈现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在计划制定期间，指挥官把活动集中在理解、设想和描述方面。而在作战

行动执行期间，指挥官则常常把重心放在指导、引领和评估方面，同时提高对相关形势的理解并修改设想。

陆军战斗指挥模式的重大改变之一，是在 2008 版 FM 3-0 里增加了“理解”这项活动。[6] 新版 FM 5-0 强调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加强和保持理解的重要性。指挥官与上级、友邻、下级指挥官、以及作战区内的其它军民组织相互合作和对话，以建立和保持自己的理解力。指挥官也尽量经常地巡视自己管辖的整个作战区域，亲自观察行动的进展，同时与下级指挥官、战士和其他军方及民间组织成员进行交谈。指挥官随着行动的进展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解并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设想；进一步，指挥官根据自己随时理解的情况，以及参谋和下级指挥官随时理解的情况，来帮助下属调整理解和设想。

形势理解是有效指挥与控制的基础。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指挥官（在参谋人员、下级指挥官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努力建立并保持对形势的理解 — 而理解是通过对相关信息与知识的分析和判断取得的结果 — 来帮助自己做出决定。形势理解是基础，指挥官在此基础上建立形势背景、制定有效计划、评估作战行动，并在行动实施过程中做出优质决定。指挥官与参谋人员必须始终努力保持形势理解，在形势出现变化而导致理解度降低时必须能挺住及克服。

指挥官在发展自己对形势的理解时，会看到作战环境中有一些规律性现象出现、消失和再现，这有助于指挥官根据其它友军部队与伙伴、敌人、地形和民众的情况来指挥自己部队的行动。完全的形势理解固然对制定计划和决策最为理想，但这种理想的情况很少发生。指挥官必须面对现实，常常不得不在对形势的理解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始行动。

合作与对话有助于建立学习的组织环境，形成对形势的统一理解。在整个行动中，指挥官、下级指挥官、参谋人员，以及其他伙伴都积极合作与对话，分享并辩论信息、看法和观点，从而更好地理解形势和制定决策。合作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人或组织分享知识，建立共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工作 。对话是合作的一种方式 ，它涉及到参与者各方坦率地交流思想或意见，鼓励对分歧进行坦诚的讨论。有效的合作与对话能增进对形势的理解，包括对面对的问题的理解。

批判与创新思维有助于整个作战过程中的理解和决策制定。为了帮助指挥官理解形势和制定决策，指挥官和参谋班子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需要运用批判和创新思维技巧。

批判思维是指带有目的、不断反思和自我调节的判断过程，是以确定所观察或所表示之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它也涉及到以某种推断或论证为基础来确定接受某种结论的理由是否充分。批判性思维是理解形势、辨识问题、发现原因、得出合理结论、制定优质计划，并评估作战进展的关键。

创新思维是指构思出新颖的有独创性的想法。指挥者常常遇到不熟悉的问题，或是需要新对策的老问题。创新思维可引发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新的视角，以及理解和构想事情的新途径。指挥者通过比较不同的选项来解决问题。创新思维包括运用适变法(吸收以往类似经验)或创新法(产生全新想法)。

批判与创新思维是理解作战环境、辨识问题、制定解决或控制问题的行动方案的根本要求。

指挥官不断思考并把针对民众的任务（维稳或民政支援行动）与针对敌方部队的任务（进攻或防御作战）结合起来。军事行动涉及的不只是武装对手之间的战斗。赢得战斗与冲突的胜利固然重要，但还不足以保证成功。营造民间形势对长期的成功也同样重要。因为这个原因，指挥官在计划和执行期间要不断思考，并把针对民众的维稳任务与针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性任务结合起来。为了国土安全，指挥官把行动重点放在民政支援上。

使命型指挥是行使指挥与控制的首选方法。因为作战行动的复杂、无常、变幻不定的特征，使命型指挥和细节型指挥（Detailed command）相比，应是行使指挥与控制的更好方式。使命型指挥是以使命指令为基础，通过分散执行来展开军事行动。成功的使命型指挥要求各层下级带兵者在纪律约束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指挥官意图范围内大胆而独立地行动。使命型指挥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是：运用使命指令；全面熟悉使命要求、指挥官意图和作战行动的概念；以及指挥官与下级之间相互信任和理解。FM 5-0 阐述的使命型指挥的原理适用于作战过程中的一切活动。

持续评估能够使部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不断学习和适变。评估是作战过程的一个连续性活动，也是指挥部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学习和适变的主要反馈机制。评估同时还是一项战斗指挥的活动。作战计划是根据不全面了解和指挥官对形势发展的合理假设而制定的。有时候，结果达不到预期，或者形势发展超出预料，包括意外的成功。在这些情况下，指挥官要判断原因，查明究竟是由于计划的实施（执行）中出现失误，还是作战计划本身和其基本逻辑有缺陷。持续评估帮助指挥官认识到计划中的不足和形势的变化。有时，评估能暴露出现实情况和指挥官的设想之间的细小差异，指挥官可以相应调整作战计划。如果评估结果显示实际情况与指挥官的最初设想有重大差异，指挥官就需要重新辨识问题，并根据需要制定出全新的作战计划。

今后贯彻与落实

为了推动整个陆军学习和掌握 FM 5-0 作战准则，合成兵种中心成立了一个作战准则教育及训练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目标，是确保作战准则颁布之后尽快在生成部队及作战部队中落实和使用。指挥参谋学院主导教育方面的努力，以保证 FM 5-0 的要旨在军官和士官这两个教育系统中都得到充分关注。合成兵种中心则主导训练方面的努力，确保对战斗训练中心的训练进行更新，以在训练中纳入 FM 5-0 的要点。合成兵种条令编写处正在编写 FM 5-0 学习材料并制成互动媒体分发下去，以帮助官兵自习这部文件描述的作战过程。除此之外，合成兵种中心还组织一个流动训练小组，在陆军各部队进行有关作战过程的作战准则宣传教育。

新版 FM 5-0 是陆军各部大力合作的智慧结晶。这部新版文件为陆军领导人提供了开展作战中行使指挥与控制的起点，为陆军领导人建立了在制定计划、准备行动、执行行动和评估效果所使用的统一参照框架和认知工具。通过建立用于指挥与控制的统一方式和语言，这部作战准则促进相互理解并提高效力。新版作战准则重在指导，而不鼓励墨守成规；它为指挥官提供权威指导，同时要求他们根据形势创新应用和适时调整。杰出的指挥官在作战行动中，总能洞观形势，及时察觉在何时及何地不可机械地套用作战准则、训练套路，或者以往经验，并相应做出调整。♣

注释:

1. William B. Caldwell, "Design and the Art of Battle Command" [设计和战斗指挥艺术], reflections from Frontier Six, Combined Arms Center Blog, 6 March 2009 (17 October 2009).
2. 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备忘录，主题："Vision for a Joint Approach to Operational Design" [以联合方式开展作战设计的构想], 6 October 2009. 在该备忘录里，马蒂斯将军指出：改进联合作战准则、训练和联合专业军事教育，需要运用批判和创新思维，尤其是这种思维方式关系到作战计划的制定。
3. 美国陆军过渡性野战手册 FMI 5-0.1《作战过程》和 FM 3-0《作战行动》都清楚指出:陆军不会采纳效基作战（EBO）的联合作战概念。虽然 EBO 概念的某些方面（比如评估技术和分析作战环境的方法）强化了陆军作战准则，但陆军关于指挥与控制的作战准则是以使命型指挥的原则为基础的。
4. Stefan Banach, "Educating by Design: Preparing Leaders for a Complex World" [通过设计进行教育：培养领导人应对复杂世界], Military Review (March-April 2009) 和 Brigadier General Huba Wass de Czege, "Systemic Operational Design: Learning and Adapting in Complex Missions" [系统的作战设计：在复杂使命中学习并适变], Military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09). 此两篇文章概述了陆军如何转变思路，将作战设计应用于军事行动。
5. Jamshid Gharajedaghi, Systems Thinking: Managing Chaos and Complexity, [系统思考:驾驭混乱和复杂], 2d ed. (Burlington, MS: Elsevier Inc., 2006), 126. 作者在讨论如何界定问题时，把这条摘录的出处归于最早提出系统思考的 Russel Ackoff。
6. 2001 年版 FM 3-0 和 2003 年版 FM 6-0 把形势理解作为指挥官的设想能力的一部分来讨论。2008 年版 FM 3-0 把"理解"作为一项活动纳入了陆军的战斗指挥模式，以强调整个行动过程中这项活动的关键作用。

克林顿・J・安科三世，美国陆军退役上校（Col Clinton J. Ancker, III, Ret, U.S. Army），堪萨斯州列文沃斯堡美国陆军合成兵种中心合成兵种条令编写处处长。他是美国军事学院、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及海军战争学院的毕业生，持有不同学科的四个硕士学位。他曾在越南战争和"沙漠风暴行动"中服役，并随第 11 装甲骑兵团服役九年，先后三次征战海外。

迈克尔・弗林，美国陆军退役中校（Lt Col Michael Flynn, Ret. U.S. Army），合成兵种条令编写处条令撰稿人。他是 Eckert 学院、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和高级军事研究学院的毕业生，曾在科威特及阿富汗参与"持久自由行动"。他在陆军服役期间担任过各种步兵职务并在作战规划岗位任职。弗林先生是 2005 版和 2010 版野战手册 5-0 的首席撰稿人。

培养外语人才：美国空军如何与民间高校合作共赢

Civili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merica: How the Air Force and Academia Can Thrive Together

约翰·康威，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John Conway, USAF, Retired）

高等教育主要是为政府和其它部门长期提供普通与专业人才。它是蓄水库，而不是水龙头。虽然它能够对政府需要的稀罕“彗星”要求做出快速反应，但它的强势在于保持一个资源“星群”。

— 南希·L·卢瑟（Nancy L. Ruther），耶鲁大学

2006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次提出：美国国防部的外语人才规划部门应该重视军官入伍前外语教育，而不是花费时间和财力安排新入伍和二期入伍军人学外语。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再次提及这个问题。[1]“军官入伍前外语教育”一般是指接受正规高校的外语课程，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份最近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意在加强军官训练团的外语技能。然而，如果军队不了解美国高校的外语教育系统能提供什么，也不为其办学方向提供指引，那么军队拓展军官入伍前外语训练的努力将继续受挫。

我们现在仍能感受到一战时期美国外语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一战前的几十年见证了高中和大学都火爆注册外语课的现象，它反映出国家牢固的移民传统。[2] 德语学习获得了“崇高”地位，因为美国的公立学校接受了德国的教学模式。许多人认为德语是有教养人士的语言，所以德语占 1915 年公立高中所有语言教学的 24%。[3] 学习注册人数超过德语的只有传统拉丁语（37.3%）。而且，美国所有大学中有三分之一要求申请入学者学习过 2-4 年的德语或法语，还有 85% 的大学要求未来的学生在注册入学前通过一项外语能力测试。[4]

美国 1917 年参战以后，德语在反德情绪的浪潮中几乎从所有高中课程表上消声匿迹，只吸引了选修外语的所有学生人数中不足 2% 。[5] 注册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人数增多，但是两者都没能达到以往德语的人数。拉丁语仍是热门，但是由于德语课程减少，致使一些学生干脆一门外语都不学。[6] 随着德语的边缘化，法语成了新的崇高语言，演变成专为想上大学的人开设的语言课。[7] 在这种趋势推动下，只有准备继续报考大学的学生需要修学外语以满足高考要求，而准备高中毕业后就找工作的学生则彻底放弃外语课。因此，一度几乎遍及美国整个教育领域的学外语热潮，在一战后的几十年中持续冷却。[8]

但是，一个更糟糕的趋势出现了：到 1920 年时，已经有 22 个州禁止外语教学，其中有些州宣布八年级以下的任何外语教育为不合法。[9] 这种最初受一战期间反德情绪所煽动起来的语言排外症更受另一种思潮的驱动，即公民如果不用英语来学习美国理想的话，就不可能理解或尊崇这些理想。于是，外语教学被视为“非美国”或者说“不爱国”行为。[10] 学习另一种语言使学生接触到其他文化，故而会分散他们的忠诚，诚如当时内布拉斯加州的一项法规所述：“让移居本地的外国人子女从幼年起就接受父母国家语言的

教育，就等于是把那种语言作为母语来培养他们。这种教育的结果会使他们养成以那种语言来思考的习惯，自然而然会给他们灌输不符合美国最高利益的理念与情感。”[11]

这种法律最终在 1923 年被一项最高法院裁决所推翻。[12] 然而破坏已经造成，在其后 40 年中，外语教育在小学中几乎绝迹，到了高中才设外语课，孤立主义在美国的高涨使外语学习成为爱国主义的敏感话题。[13]

就这样，国家把外语教育是长期培养过程并应从小开始这个基本道理拦腰斩断。1940 年有一份关于高中应该设哪些课程的国家报告建议删除外语及一些其他学科，因为高中如果开设“过于学术化的”课程，会造成太多学生不及格。[14]

这个后遗症延续至今。2001 年的《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强调测试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而排除了许多其它科目，其中包括外语。[15] 在 2007 年的一次联邦外语战略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专题小组成员特别批评了这项法案，指出这种标准化测试方式阻碍把外语教学纳入学校课程，一位发言人更直言不讳地说：“外语受排挤应归咎于《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16] 应用语言学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指出：这项立法负面影响了约三分之一设有外语课程的公立中、小学，并称此法案导致学校把资源从外语教学转向数学和阅读中那些可“计入统计”的课程。[17]

语言学习的连续性

小学和高中外语教学和空军有何相干？2002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在除美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里，都把小学外语教育作为学习第二语言这个“连续过程的起点”，而美国则不现实地把培养期缩短，指望以高中 2-4 年或大学 2-4 个学期培养出优秀的外语人才。[18] 这项研究的作者赞同其他许多语言学者的看法：掌握一门第二语言需要长期的学习。总之，学习语言，越早开始越好。

前白宫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曾说，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体制“不连贯”，高中到大学之间的外语学习出现“严重滑坡”。[19] 在 2000 年（能找到中学外语课注册人数最新数据的最近年份）大约有 590 万学生在高中修外语课。[20] 两年后，仅有 140 万学生在大学修外语课。[21]

一种解释认为，许多高中生不上大学，是导致这种落差的部分原因。然而在 2006 年全国 1700 多万名大学生中，仅有 157 万人选修外语课，说明无论是学生个人还是大学校方或者双方面，都继续对外语学习保持一些冷淡。[22] 大部分高校不要求学生必须学习一门外语才能毕业；事实上，连许多博士培养计划也没有外语要求，更遑论要求学生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23] 现代语言学会在 2006 年对四年制院校进行了调查，这些院校中有 7.8% 报告说没有设置任何外语课程。[24]

况且，学生在大学里选外语课，多数也只选初级课程（第一、二年），他们之中只有不足 20% 的人继续攻读。[25] 高中和大学在外语教育上如此松垮，大学中读完 4 学期基础外语后再继续深造的学生是如此之少，这个令人心酸的现实表明，大学外语教育很难满足空军的需要。

对语言教育的简单量化评估

大学外语教学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培养出满足军队需要的人才？学时数与国防部外

语测试成绩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一方面，有些学者声称：学习积极性与天赋不可量化，所以没有公式能精确判定需要多少课时才能使学生达到相应程度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各方面语言权威企图对上面提到的相关性做出量化分析。

“国际语言圆桌会议”（ILR）把 1/1 级听 / 读能力界定为“初级水平”。1 级水平的听力意味着能听懂满足生存、礼貌、旅行基本需要的会话。1 级水平的阅读能力表示能充分理解简单的意义连贯的句子。[26] 国际语言研究中心的计算是：150 个课时能够培养出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语言（被认为最容易掌握)的 1/1 级能力。[27] 在这根标尺的另一端，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日语、朝鲜语 — 对讲英语者而言最难学的一些语种 — 需要高于这个数字两倍多的时间（350 课时），相当于将近八个学期的大学教学（假定四个学期的大学语言课程等于大约 180 个小时的课堂教学）。[28]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八个学期肯定能保证学生副修一门语言。（见表 1：ILR 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请注意：任何 3 级以上能力都需要在该语言本土环境中经历融入式学习。换言之，课堂教学只能把学生培养到这一级的水平。）

而且，由于民间大学外语教学的节奏通常相对轻松，不像在国防语言学院或外事学院那样紧张和有目标，所以学生可能不得不花更多的课时数才能达到国防部外语能力测试的同等成绩。[29] 根据 2005 年对国防语言学院代理校长的一次访谈，该院的法语学生“在大约六周时间内突击学完一本标准大学法语教材”。[30] 还要指出的是：为达到熟练程度所投入的小时数通常呈几何级而非线性增长，这一事实严重影响着那些希望提高外语技能但学习时间有限的学生。获取基本外语能力需要相当多时间，获取高级外语能力需要投入更多时间，这对那些在和外语能力没有直接关联的任何空军部门中工作并想学外语的人造成困境。例如，医务人员如参加国际卫生服务组织的外语学习项目，将不得不从临床工作（以及作为医务专业人员必须完成的

表 1：ILR 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

ILR 外语说 / 听 / 读水平分级：	1 级	2 级	3 级	4 级
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德语、南非荷兰语、丹麦语、荷兰语、挪威语、瑞典语）	150 学时	400 学时	650 学时	见 (a)
阿拉伯语、汉语普通话、日语、韩语	350 学时	1100 学时	2200 学时	见 (a)
所有其它语言（例如，东欧、非洲和亚洲语言）(见 b)	250 学时	600 学时	1100 学时	见 (a)

(a) 通常情况下，仅通过课堂教学达不到 4 级水平，要求在本土语言环境中大量运用所学语言才能达到。
(b) 印尼语与马来语的学时数大致为：说/读-1 级 = 200；说/读-2 级 = 500；说/读-3 级 = 900。

注：
1. 本表改编自国际语言学习中心的《按语言难度计算的各级熟练程度所需课时数》，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语言学习中心，http://www.icls.com/FLD/ILRlevels.htm。

2. 达到这些目标的假设是，每五个学时需要学生预习至少 2-3 小时。

3. 此表以美国国务院外事学院的计算为基础，对不同课时期望达到的会话能力进行了调整，以满足民间部门学生的需要。

4. 这些公式有细微差别：外事学院估计：学习罗曼语系的学生将需要 575-600 学时，才能达到 3/3 级水平。参看 Mary Ellen O' Connell and Janet L. Norwood, ed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国际教育和外语：保障美国未来的关键],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 45. 对于最难学的语言（汉语、阿拉伯语等），外事学院规定：凡参加 88 周语言课程的学生必须在第二年安排去目标语言国家学习。

专业进修教育）中抽出愈来愈多的时间，才能在国防部外语能力测试中取得较高的成绩。这种时间管理难题使空军战士在做好本职工作和提升外语技能之间处于两难。

培养精通外语的军官

2006 年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都指出，军队应该强调军官在入伍授衔前尽量学好外语以满足在军队工作的大部分需求，而不是依赖入伍后的外语学习。[31] 军官入伍后第一年需要完成各种密集训练，如飞行学员训练、领航学员训练，或一系列其它技术课程，很少有时间顾及外语学习。

我们还必须重视一个涉及面更大的问题。美国空军的作战军官一般是通过三种途径之一进入现役：美国空军学院（USAFA）、军官训练学校（OTS），和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AFROTC），极少有例外。每种途径都培养一些有外语能力的学员，但在外语教育上的短处也显而易见。

空军学院每年毕业的人数有限，主修或辅修过外语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学院也增加了外语课程选择，但仍然远远比不上全美各地民间院校（2006 年约有 219 种外语供选择）。[32]

在写此文的时候，军官训练学校只招收技术背景的学员，如工程学、生物学，等等。语言专业毕业的学生无法经此培养途径入现役。[33] 军官训练学校碰巧也会录入几个以非英语为母语的报考者，但这只是碰巧。总体而言，经由军官训练学校入伍的军官中有外语为母语背景的人数很少。

其结果，美国民间高校代表着国家最丰沛的外语教育“蓄水库”。最近，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为外语专业学生所设的奖学金名额大幅增加，很多外语专业学生都有资格申请这些奖学金。[34] 除此之外，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的高年级学员可得益于《2009 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条款，此条款规定修完某外语课程的学员可获得奖金，即便其外语学习不拿学位。[35] 空军预期参加该奖金计划的人数在 2010-2011 学年将增至近 1000 人。[36]

然而，如上所述，美国的教育体制因自身问题而无法满足空军的需求：在接纳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那些美国高校中，大约有一半只开设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即所谓“三大外语”课程，另有约 15% 的学校根本就不设语言课程。[37] 倘若空军真希望新军官进现役前就完成必要的外语训练，就应考虑把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设置到那些提供多语种课程的民间院校，或在容纳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民间高校中推动外语课程改革。[38]

美国公法 111-288（201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即经由该项国会报告成为法律）第 529 节把这一概念再推进一步，授权国防部长“在正规大学、高等军事院校或其它类似高等教育机构建立语言培训中心”，以加速培养“关键与战略性语种的基础性专业人才”。它批准了军队利用国家各院校全面开展外语教育、并且对国防部所有军职和文职人员开放。这条法律也特别重视这些计划与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整合。[39] 虽然该法律何时得到实施目前尚难预料，但是它的确突出了高等院校将在军队外语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尽管这些努力有助于全面推动民间院校设置小语种课程，以让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获得这类外语学习机会，但学术界与军界的语言目标还是有着显著不同。学术界秉承纯知识学习的理念，有别于国防语言学院甚至

空军学院的培养目的。比如，民间学院不必匆忙在六个月内培养出 24 名达里语毕业生，只需把达里语作为一门语言来探索。又比如，民间院校没有责任必须培养出达 3/3 级水平的乌尔都语语言专家，开设乌尔都语课程几乎都只是偶然，对它们而言，有胜于无，但绝非必须。

即便民间院校设置小语种课程，始终需要面对经费难题。按照杜克大学国际事务副教务长吉尔伯特·默科斯（Gilbert Merkx）博士的说法，美国院校的语言大厦“宏伟但脆弱”。他认为许多小语种课程可能会“销声匿迹”，除非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来维持。[40]

还有，军队现在强调外语能力不仅是读和听，而且要能会话。[41] 但这种高级会话能力要求不符合学术界传统的语言学习法，后者强调的是语法和文学，尤其是在基础外语课期间。诚然，学校也开设口语课，但是这些课大多安排在学习过程的后期，是建立在掌握语法和词汇技能的基础之上。整个学术界都采用相同的外语教学方法，都以文学为主，而不是针对学生的工作需要灵活设置课程。[42] 有人将这种形态视为“工具”派和“正规”派之间的冲突，前者由“独立外语学校”采用，学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后者由高校外语系采用，主要学习内容是文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认知结构和文化知识。[43] 现代语言学会在 2009 年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正规教学法：“语言文学需始终作为英语系和其他语言学系教学的中心内容……文学的作用需加以重视……语言学习应该是文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4] 尽管这种传统方法始终是人文学科的最佳教学方式，现代语言学会属下一个专题委员会的确讨论了设置笔译和口译课程的必要性，理由是有一个巨大的“未满足需求”。[45]

国会已经建议把后备军官训练团外语和文化培养补助经费拨给最大的“输送学校，尤其是那五所老牌军事学院”，用于开设关键外语课程。[46] 这五所院校 — 南卡罗来纳州军事学院、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北佐治亚学院及州立大学、诺维奇大学、德州农工大学 — 除开设“三大外语”课外，还有各类小语种课程，其中阿拉伯语和汉语最为普遍。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与德州农工大学开设最高级课程，但这五所院校都遵行大专院校普遍采用的以文学为中心的教学法。[47]

在学院式教育和定向性教育之间，形成差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前者节奏相对轻松而后者强度大。国防语言学院用一年左右时间培养出阿拉伯语语言专家，其程度相当于普通大学四年课程，此四年中暑假不上课，或者有一个暑期到国外融入环境学习。许多语言专家认为：如果不主修外语，很难成为合格的外语人才。[48]

最后一点，外语专业学生普遍没有动力加入空军。空军在专业军官代码中没有为外语、翻译等人员设置专业岗位，也没有提供他们真正的用武之地。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目前在军官授衔时没有外语能力要求，新军官入伍后也少有机会马上运用外语技能。[49]

外语课注册人数

两年制和四年制院校的外语课程注册人数都持续增加，在 2002 年到 2006 年期间增长了近 13%（见表 2）。2006 年有约 158 万学生注册外语课，比 1960 年选修外语的学生（608,749 人）增长了 260%。然而从比例上看，2006 年的这个数据相当于高等院校 1,765 万学生总数的 8.9%，只及 1960 年 16.1% 这个比率的一半。[50]

西班牙语是 1970 年以来高校最普遍开设的外语，2006 年选修此课程的学生高达 822,985 人，盖过了选修所有其他外语课程人数的总和（约 755,000 人），这一趋势从 1995 年保持至今。法语遥居第二（206,426 人），德语第三（94,264 人）。令人吃惊的是，美国高校中名列第四的热门语言是美国手语，其选修人数为 78,829。这四门语言占 2006 年所有院校语言课注册人数的 76% 以上。然而，空军部队里会说西班牙语、德语和法语的已大有人在，我们或许有理由说非洲司令部责任区需要法语，不过，美国手语根本就没有实际军事用途。[51]

对这个表里的总数，需要做些说明与提示。这些数据反映的是粗略数字，并不表明学生是否在同一时段兼修了一门以上的外语，若是如此将会使累计总数降低。如果从数据中除去两年制大专学校，初级外语课占注册人数的 78% 以上（约 915,000 人），那么修高级课程的就是其余的 22%(约 255,000 人)，其比率为 7:2。[52]

况且，这些数据没有明确指出口语课的数目，想必属于高级班。由于高级班中选修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的有 198,598 人（这个数字占到高级班 255,105 总人数的将近 78%），这意味着高校中教授小语种高级课程的学校寥寥无几。[53]

无论如何，小语种毕业生数量在总体上还是呈增长趋势。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毕业生数据，美国高校在 2007—2008 年颁发了 17,866 个外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其中近 72% 是西班牙语(9,278 名)、法语(2,432 名）和德语（1,085 名）。[54] 剩下的部分是小

表 2: 2002 年和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外语课注册人数（语种按 2006 年各语言总数递降排列）

	2002	2006	变化率 (%)
西班牙语	746,267	822,985	10.3
法语	201,979	206,426	2.2
德语	91,100	94,264	3.5
美国手语	60,781	78,829	29.7
意大利语	63,899	78,368	22.6
日语	52,238	66,605	27.5
汉语	34,153	51,582	51.0
拉丁语	29,841	32,191	7.9
俄语	23,921	24,845	3.9
阿拉伯语	10,584	23,974	126.5
古希腊语	20,376	22,849	12.1
圣经希伯来语	14,183	14,140	–0.3
葡萄牙语	8,385	10,267	22.4
现代希伯来语	8,619	9,612	11.5
朝鲜语	5,211	7,145	37.1
其他语言	25,716	33,728	31.2
总计	1,397,253	1,577,810	12.9

摘自 Nelly Furman, David Goldberg and Natalia Lusin,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06*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的注册人数],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3 November 2007), 13, table 1a, http://www.mla.org/pdf/06enrollmentsurvey_final.pdf.

语种学位，仍然可观，共为 5,071 名（其中汉语 289 名，阿拉伯语 57 名），这批人很可能成为新军官的丰富来源。[55]

小语种的崛起

除圣经希伯来语之外，其它前 15 种语言的选修人数都在持续增长，可喜的是，这大部分语种都是空军需要的。其中阿拉伯语（现代标准语）和汉语（普通话）的学生人数自 2002 年起增长最快（分别为 126% 和 51%），而且，开设这些课程的院校数量也大幅度增多。[56]

这两种语言都属于我们通常所指的小语种语言类。尽管“小语种”的说法不解自明，但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做些说明。事实上，小语种包括“三大外语”之外的所有其它语言。有些，比如伊博语，其使用人群很小。小语种中的大部分语言在整个学术界都不易找到选修的地方，像豪萨语和约鲁巴语这些非洲语言，以及马来语和印尼语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就是如此。[57]

全国各地都有教授这些小语种的地方，但通常只由规模较大的院校提供，其中有些大学为这些语言设有正规的教育中心。班级通常很小，有时没有固定的教师，而借助拿福布赖特奖学金来美国进修的讲母语的访问学者授课。典型的情况是，今年开设一门小语种课，明年就可能停下来；课本可能要临时编；而且教学质量可能参差不齐。[58] 虽然通常认为小语种难学，其实这些语言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有些并不比法语或西班牙语难学（比如葡萄牙语和斯瓦西里语），而有些则相当难（如汉语、日语、朝鲜语和阿拉伯语）。[59] 毫不奇怪，空军和其它军种都非常愿意从学术界这个蓄水库吸取许多小语种人才。

外语教育的“社会需求论”

也许在美国，人们确实没有感到缺少讲外语的人，缺少的是对外语人才的正式需求 — 这种观点被描述为“社会需求模式”。该模式揭示需求（在此指各类小语种人才）与实际产品（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专业的学生，而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空军中这类语言人才已经很多）之间的缺口。[60] 该理论的支持者指出，为了精确地描述这个社会需求模式，就需要给出需求的详细信息。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确切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就无法提出需求。所以，既然提不出具体的需求，你就只好有什么接受什么了。

虽然国防部对外语人才需求做了全面评估，但还不足以明确促动学术界开设具体的外语课程。前面谈到，高校学生选修阿拉伯语和汉语非常踊跃，这个趋势令人鼓舞，不过对阿拉伯语的兴趣很可能源于 2001 年 9/11 事件以及在伊拉克的军事活动；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多也许是由于意识到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将成为一个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想更好地了解和欣赏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些原因似乎更合乎情理，而不是因为国防部发出了明确的号召。另一方面，学习美国手语的学生人数在同时期显著增多且呈现几乎同样强劲的增势，又无法用以上任一种原因来解释。除非国防部的具体外语需求与外语人才蓄水库即美国高等院校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在此之前，双方将在不同的轨道上行驶，相遇纯属偶然。

从两年制大专找人才

在美国，最渴求人才原坯的用户当数大学美式足球教练，他们提前几年就做好人才

规划 — 这儿要个外线卫，那儿需要个弃踢员 — 并从高中球队寻找最佳人选，然后百般游说，甚至不择手段，不惜违反常理和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的规定。毫不奇怪，这些招募高手更常常能在大专学校中发现货真价实的人才。这些队员虽然缺少四年球场资历，但比高三或高四学生已多踢了两年球。教练能认真挑选，并放在最合适的位置磨练。如果大学足球教练能从大专学校中招到最好的球员，那么空军和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外语负责人也能招到优秀的外语学生。

美国的两年制大专和职专在过去十年中大力发展外语教育，尤其是汉语、阿拉伯语和日语。[61] 两年的外语学习当然达不到精通程度，特别是像阿拉伯语和汉语这些较难学的语言，但这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是，外语学习注册人数显示了学生的兴趣和意愿。从网上简单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哪些院校在开设国防部感兴趣的外语课程，许多这样的社区学院就开设在族裔群居社区的附近。例如，很多开设汉语普通话课程的两年制大专都在美国西海岸，这当然不是巧合。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两年制大专开设某些外语课程时，需要考虑学生报名人数多寡和有无师资，故而不稳定。尽管如此，军方应可充分利用这些大专学校现有的外语课程，从其学生中发现有基本语言功底和天赋的潜在外语人才，这是一种节时省钱的可取途径。比如，空军可以从这些已完成两年外语学习的大专毕业生中选择所需语种的人才，招入后备军官训练团，直接送入四年制大学的最后两年继续深造，完成外语学位。显然，空军征兵人员和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教练们”应当注重这条途径。

观察和疑问

国防语言学院的外语中心定期培养出难学语种的合格外语人才，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它有求必应，随时为所有军种提供所有语种的人才。我们应把美国民间院校外语教育作为另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为美国空军及姊妹军种培养合格的外语人才。

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已注重外语人才培养，开始招收特定外语专业学生并通过执行外语人才补贴政策作为鼓励。然而，这种做法不是受需求驱动，也没有前瞻性，后备军官训练团与大学外语系之间缺乏沟通，所以大学管理层不注重军队的需要。

国防部在确定外语人才需求方面的程序并不完善，现有程序中缺少对各军种的具体外语要求。这种缺失导致空军认为本军种内并不需要多少语言人才，但这种看法很可能并不正确，并因此造成整个军种不重视外语人才培养。这种态度还忽视了现代军事行动的联合性质，忽视了每年有一万多名空军官兵部署到联合远征训练基地的事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和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一道，共同执行“陆军靴子”的地面任务。既然我们是在和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并肩作战，既然他们重视外语训练，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既然现实情况要求我们对外语不仅要会读会理解，还要会说，我们又如何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要？还有，我们应如何训练和测试这些外语技能？

最后，既然我们目前开始重视军官人伍前的外语培训，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新军官刚学到的但很不扎实的外语技能？我们是否应该认可他们的努力并发放外语技能奖金作为鼓励？我们是否应该把他们分配到能发挥外语特长的岗位上？更实际地讲，我们

是否应认可他们的外语能力，做到人尽其才，使他们愿意留在军队中？

对今后的建议

以下的建议涉及到如何利用美国高校资源来提高空军部队的外语人才培养，这些建议不仅适用于空军，也可供姊妹军种和国防部借鉴。

首先，空军应该解除对非技术专业的限制，从而允许外语专业毕业生申报军官训练学校。许多大学生和毕业生是在民间就业市场求职无果才选择军人职业。根据现代语言学会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对主修外语的大学毕业生进行的全国调查中，政府公务员没有被看成是一种“职业类型”，而可能被湮没在比例为 6.3% 的“其它职业”类中。对大多数外语毕业生来说，任何类型的政府公务员工作 — 包括从军 — 都不是他们优先的职业选择。[62] 如果招收非技术性专业可能违反军官训练学校的政策，那么空军应该将外语定为“技术性”专业。

顺着相同思路，必须将征募关键外语人才列为一项征兵优先。不仅军官层面缺乏外语人才而形成“新发现”的渴求，士兵和士官层面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有增无减。[63] 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只是后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士官队伍也应将招募外语人才列为优先。

借鉴陆军在该领域的成功经验，空军征兵局应探索如何从美国许多外语族裔群居社区挖掘外语人才。[64] 现代语言学会绘制的语言地图就是一个简便精确的好工具，可帮助我们找到这些社区并发现人才。[65] 但是招兵人员应该知道，这些“天生的外语人才”大多需要进一步的训练，才能有效执行军事任务。

空军应该带头执行新的国会立法，在大专院校建立外语研究中心。选择合适地点时，应首先考虑那些接纳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的院校和靠近空军基地的院校。另外，空军可以在许多院校现有关键外语中心的课程基础上增设小语种，以满足军队的外语需要。例如，德州农工大学作为一项国会研究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列举的五大“军事学院”之一，不仅拥有一支优秀的军校学员队伍，而且还有一支庞大而多元的师生队伍，它具备发展能力，也具备多元化环境，是这项努力的理想选择。

我们也应该运用社会需求理论，和高校外语系共同讨论课程设置，强调初级口语课程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的重要性，让他们有机会读这些课程，并作为鼓励训练团学员学习外语的一种措施。作为进一步推动，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各分队应和在大学里的其他训练团培养计划保持协同，形成统一口径，明确提出军队需要学校开设哪些语种课程。

在美国的高中，我们应鼓励空军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选读学校的外语课程，这一举措不费空军分文，但帮助把外语教育链延伸到高中层次，提高中学对外语课程的“需求”意识（一举两得），这样做还有助于向空军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学员灌输空军“全球”观。在高中设置这些课程，也能鼓励更多高中学生竞争后备军官训练团高年级外语奖学金。训练团中也可开展一些奖励措施，例如举办校际外语竞赛（类似于军事操练比赛），为外语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授勋带，等等。[66] 鉴于美国大多数高中所能提供的外语课程语种有限，学生选修任何一门外语 —

甚至拉丁语 — 都会成为进入后备军官训练团的优势。

要完善这条教育链，空军应当鼓励愿意做教师的语言专业人士担任空军青少年后备军官训练团教员，或者更理想的是，依据国防部“军人当教师”计划返回校园担任外语老师。为了展现外语的军事用途，我们应鼓励那些“有亲身经历”的军人现身说法，做学生的导师和楷模。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目前国防部和空军对外语教育的重视逐渐淡出视野，再一次重复过去多次发生的“一阵热”现象。

精通一门语言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最好的做法是及早开始并在整个教育系统中保持连贯，这对国防部需要的那些高难度外语（对西方学生而言）尤其如此。我们必须保持这个外语蓄水库源源不断。♣

注释：

1.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6 February 2006), 17, http://www.comw.org/qdr/qdr2006.pdf; and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0), 54, http://www.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2. Paul Simon, The Tongue-Tied American: Confront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risis [哑口无言美国人：遭遇外语危机], (New York: Continuum Press, 1980), 3. Mr. Simon 是前美国参议员。另参看 Deborah M. Herman, “‘Our Patriotic Duty’: Insights from Professional History, 1890—1920”[我们的爱国义务：1890—1920 的专业历史回顾], 表 1.1：公立高中学生学外语。其中提到在 1900 年，“至少 60 万名小学生所受教育的其中一些课程使用德语。”见 The Fu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的外语教育前景], ed. Terry A. Osborn (Westport, CT: Bergin and Garvey, 2002), 12. 另参看“Timeline: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Controversy”[大事年表：双语教育之争], 见 School: The 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Education [学校：美国公立教育的经历], 2001,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http://www.pbs.org/kcet/publicschool/roots_in_history/bilingual_timeline2.html.
3. Jamie B. Draper and June H. Hicks, Foreign Language Enrollments in Public Secondary Schools, Fall 2000 [2000 年秋季公立中学外语注册人数],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Grant no. PO17A000017-01], May 2002, [5], table 1, http://www.actfl.org/files/public/Enroll2000.pdf. 在 1915 年，有 73% 的高中生学习一门外语，到 2000 年时，这个比率下降到 43.8%。在 1915 年，西班牙语只占高中总注册人数的 2.7%，到 2000 年时，这一比率上升到 30.2%。同上，第 1 及第 5 页。
4. 参看注释 2，第 3 页。
5. 爱荷华州享有这项有争议的“殊荣”，它是第一个禁止在公共场所，如教堂中、火车上，甚至打电话时说德语的州。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1 页。
6.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2 页。
7.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7 页。
8. 注册人数在 1948 年降至最低（21.7%），此后缓慢而稳步回升。参看注释 3, [5], 表 1。
9. “这项禁令不包括‘古语或死语’— 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Elizabeth Mertz, Language and Mind: A Whorfian Folk Theory in United States Language Law [语言与思想：美国语言法律中的沃尔夫民间理论], Sociolinguistics Working Paper no. 93 (Austin, TX: Southwest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Laboratory, July 1982), http://ccat.sas.upenn.edu/~haroldfs/540/theory/mertz1.html.
10.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2 页。
11. An Act Related to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the State of Nebraska [关于内布拉斯加州外语教学的法案], 9 April 1919, quoted in Meyer v. State of Nebraska, 262 US 390 (1923), decided 4 June 1923,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dissenting.

12. 即使在当时，法院裁定依据的是第 14 修正案（即:任何州都不准……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不是第 1 修正案（言论自由，等等）。讽刺的是，美国教育部 2000 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内布拉斯加州七、八年级学生注册外语课的人数为零，而全国平均数为 14.69%。然而，这同一项调查也表明，内布拉斯加州高中生注册外语课的百分比领先全国（达 78.49%）。参看注释 3, [6], 表 2。

13. 在 1920 年代，有多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双语教育对孩子有害。这些研究大部分都锁定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孩子，测试用语也是他们最薄弱的语言 — 英语。参看 Harold F. Schiffman, 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语言学文化和语言政策], (London: Routledge, 1996), 315.

14. 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校长 Ray Clifford 博士 2002 年 1 月 16 日在首都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关于语言与国家安全国家通报会上的发言 ,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15. James Campbell,“The Fixes 'No Child' Needs”[“没有孩子”需要的补救措施], Baltimore Sun, 6 December 2006, http://articles.baltimoresun.com/2009-12-06/news/0912070036_1_minority-students-state-takeover-yearly-progress.

16. “Impediments to U.S. Push on Languages”[美国推动外语学习的障碍], Inside Higher Ed, 26 January 2007,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07/01/26/languages.《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了教育政策中心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在全国 15,000 个学区中，有 71% 的学区缩短了……其它学科（包括外语）的授课时间，为的是有更多时间教数学和阅读。”参看注释 15 文章。

17. Nancy C. Rhodes and Ingrid Pufah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U.S. Schools: Results of a National Survey [美国学校的外语教学：一项全国调查的结果],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November 2009),“Executive Summary”, 6, http://www.cal.org/flsurvey. 18. 参看注释 2 中 Herman 文章，第 18 页。

19. Leon E. Panetta,“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f 'Scandalous' in the 20th Century, What Will It Be in the 21st Century?”[外语教育：如果在 20 世纪就令人反感，那么在 21 世纪又会如何 ?], Stanfo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Paper, n.d., 5, https://www.stanford.edu/dept/lc/language/about/conferencepapers/panettapaper.pdf.

20. 参看注释 3, [6], 表 2。

21. Nelly Furman, David Goldberg, and Natalia Lusin,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in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Fall 2006 [2006 年秋季美国高校非英语语言课注册人数],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3 November 2007), 13, tables 1a and 1b, http://www.mla.org/pdf/06enrollmentsurvey_final.pdf. 这些数字代表所有现代语言，也包括拉丁文和“古希腊文”。

22. 同上。

23. MLA 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Structures for a Changed World [外语和高等教育：变化的世界需要新结构],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ay 2007), 5, http://www.mla.org/foreign_languages_an.

24. Furman, Goldberg, and Lusin, Enrollments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非英语语言课注册人数], 2. 而且全国两年制大专中有 9.1% 没有开设外语课。同上。

25. 参看注释 19，第 5 页，和 注释 21，第 4 页。

26. “Interagency Language Roundtable (ILR) Proficiency Levels”[ILR（跨机构语言圆桌会议）语言熟练水平], http://www.icls.com/FLD/ILR.pdf.

27.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Classroom Hours to Achieve Proficiency Levels by Language Difficulty”[按语言难度列出的达到熟练程度需要的课时数],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Washington, DC, http://www.icls.com/FLD/ILRlevels.htm. 一般来说，ILR 语言熟练水平借用《国防部外语能力测试》来测量语言能力。

28. Margaret E. Malone et al.,“Attaining Higher Levels of Proficiency: Challenges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达到更高熟练程度：对美国外语教育的挑战],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2005), http://www.cal.org/resources/digest/attain.html.

29. 根据对国防语言学院（DLI）指挥官的一次访谈，“在 DLI 完成 6 个月西班牙语课程的毕业生，其口语能力通常高于四年制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毕业生。”参看 Tim Kilbride,“Language Emerges as Ele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语言成为国家安全的要素], American Forces Press Service, 31 March 2009,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53726.

30. Katherine McIntire Peters, “At a Loss for Words”[无言以对], Government Executive, 15 June 2005, http://www.govexec.com/features/0605-15/0605-15s3.htm.

31. 2006 年和 2010 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均指出：“我们将注重在一般任务部队军官入伍前训练期间提高这些技能。”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 79; 2010, 54.

32. 见注释 24，第 5 页。除了表中列出的前 15 种语言外，现代语言学会还记述了美国高校开设的其他 204 种小语种语言。

33. 军官训练学校可根据空军的需要，增加或减少专业种类。

34. 参看“In-College Scholarships”[在校奖学金], US Air Force ROTC, http://www.afrotc.com/scholarships/in-college/foreign-language-majors/.

35. “Foreign Language Incentive Pay For Precommissioning Programs”[授衔前军官计划外语奖金], 37 USC, chap. 5, sec. 316a.

36. “Air Force Officials Developing Cross-Culturally Competent Officer”[空军领导培养具有跨文化能力的军官], Air Force News Service, 11 December 2009, http://www.af.mil/news/story.asp?id=123181940.

37. AFROTC 2005 年 8 月简报会，主题：保持联系 — 把语言训练和文化 / 区域教育纳入军官队伍发展计划；幻灯演示：部队代培大学的外语课程。这是整个国防部的问题，也是空军的问题。国防部副部长 Michael Dominguez 指出：1,321 所高校接纳后备军官训练团分队（所有军种），其中 1,148 所高校设有外语课程。然而，他也说明：这绝大多数学校几乎都只教西班亚语、法语和德语，有不足 40% 教汉语或阿拉伯语，不足 10% 教波斯语。尽管我们承认这已高于空军后备军官训练团所在高校 2005 年报导的外语注册百分比，但空军需要的那些语种的比率仍然很低。Senate,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Michael L. Dominguez, Principal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Personnel and Readines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the Federal Workforce,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Lost in Translation: A Review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Develop a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言不达意：评估联邦政府制定外语战略的努力], 110th Cong., 1st sess., 25 January 2007, 8, 9, http://hsgac.senate.gov/public/index.cfm?FuseAction=Files.View&FileStore_id=7ce18437-63be-44ea-8f56-87ebbbdc186d.

38. 明尼苏达大学的语言能力高级研究中心（CARLA）是了解哪些地方设有哪些外语课程的极好来源，也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良好出发点。University of Minnesota, http://carla.umn.edu/. 要了解学校和外语课程设置的详细情况，也可参阅列出的 15 所国家外语资源中心。”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s” ,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http://nflrc.msu.edu/index-1.php.

39.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0 [201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Public Law 111-288, 111th Cong., 1st sess. (7 October 2009), sec. 529, pars. (a), (b) (4),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doc.cgi?dbname=111_cong_reports&docid=f:hr288.111.pdf.

40. Dr. Gilbert Merkx, “National Briefing o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国家语言与国家安全简报会],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16 January 2002),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41. 国防语言办公室副主任 Iris Bulls 提交的简报，主题：远程教育：培养 21 世纪的总体力量，2007 年 3 月 15 日。这一评论是根据对战斗指挥官外语要求的早期调查结果。

42. Gaylord George Candler, “Linguistic Diglossia and Parochialism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Missing Half of Guerreiro Ramos's Reducao Sociologica”[美国公共管理中的双语制和狭隘主义：Guerreiro Ramos 的 Reducao Sociologica 中缺少的一半],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Praxis, 28, no. 4 (2006): 553.

43. MLA 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外语和高等教育], 2.

44.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Report to the Teagle Foundation on the Undergraduate Major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呈交 Teagle 基金会的关于本科语言文学专业的报告],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February 2009), 3, 6, http://www.mla.org/pdf/2008_mla_whitepaper.pdf. 45. 参看注释 43，第 9 页。

46. House, Building Language Skills and Cultural Competencies in the Military: DOD's Challenge in Today's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培养部队的语言技能和文化能力：国防部在当今教育环境中的挑战], Report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110th Cong., 2d sess., November 2008, Committee Print 110-12, 36—37, http://armedservices.house.gov/pdfs/Reports/LanguageCultureReportNov08.pdf.

47. 参看“Department of European and Classic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欧洲和古典语言文化系], Texas A&M University, http://euro.tamu.edu/;“Mod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现代语言文化], 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 http://www.vmi.edu/show.aspx?tid=37083&id=100;“Undergraduate Programs”[大学本科专业设置], Norwich University, http://www.norwich.edu/academics/undergrad.html;“Majors and Minors”[专业和副修专业], Citadel University, http://www.citadel.edu/main/academics/majorsminors.html; and“Academic Majors”[学术专业], North Georgia College and State University, http://www.ngcsu.edu/LandingPages/Default.aspx?id=4373.

48. Stephanie van Reigersberg,“National Briefing o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国家语言与国家安全简报会],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16 January 2002),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即便如此，现代外语学会在 2008 年的一份报告观察到：“四年制外语专业学生毕业时的语言能力常常差得令人失望。” MLA Ad Hoc Committee on Foreign Languages, 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外语和高等教育], 7. 国防部的 Everette Jordan 对此做了进一步讨论，她认为：即使外语专业的学生也需要再花 3-5 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胜任工作的熟练程度。Everette Jordan,“National Briefing on Language and National Security”[国家语言与国家安全简报会],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Washington, DC, 16 January 2002), http://www.nflc.org/policy_and_strategy/language_and_national_security/nflc_briefing_january_2002/full_transcript.

49. 空军人力与人事中心 2005 年春季简报会，主题：情报职业；幻灯演示：把语言留到第二任职期学习。

50. 参看注释 21，第 18 页，表 4。

51. 美国手语班曾出现过昙花一现的上升现象，从 1990 年不到 0.1% 的总注册人数上升到 2006 年的 5%。参看注释 21，第 3 页。为了本文研究目的，我们必须排除这种语言，因为也许出了美国就用不上它。根据聋人资源图书馆的资料，现在还没有通用手语。参看 Karen Nakamura,“About American Sign Language”[关于美国手语], Deaf Resource Library, http://www.deaflibrary.org/asl.html.

52. 参看注释 21，第 21 页，表 7b。

53. 阿拉伯语的初级班和高级班比率是 7:1；汉语是 7:2。这些比率出人意料地高，但朝鲜语的比率更高，达到 3:1。同上。

54. 参看表 308。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颁发的现代外国语言文学学位，按学位程度和学生性别排列：所选年份 1949—1950 到 2007—2008,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9/tables/dt09_308.asp?referrer=list; 参看表 309。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颁发的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专业的学位，按学位程度排列：所选年份 1949—1950 到 2007—2008，同前。同年，大专院校还颁发了 2650 个外语硕士学位（其中 1,522 个是三大外语专业）和 773 个博士学位（其中 346 个是三大外语专业）。见表 308 和 309。

55. 参看表 310。有学位授予权的院校颁发的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和俄语学位，按学位程度排列：1969—1970 到 2007—2008,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0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9/tables/dt09_310.asp?referrer=list.

56. 2006 年有 466 所院校开设阿拉伯语课，而 2002 年只有 264 所；2006 年有 661 所院校开设汉语课，而 2002 年只有 543 所。参看注释 21，第 3 页。

57. Timothy Reagan,“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in American Public Schools”[美国公立学校开设小语种课程中的政治经济学], 参看 The Fu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外语教育的前景], 125. Reagan 不仅根据语言因素，而且也根据它们在公立学校开设的可能性，列出了外语的层级，如下：

1 级：大语种（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2 级：小语种中常见语种（阿拉伯语、汉语、日语、俄语）
3 级：小语种中少见语种（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挪威语等）
4 级：小语种中不 / 几乎不见语种（所有非洲语言、大多数亚洲和大洋洲语言）
5 级：非语种（美国手语、世界语）

参看本注释，第 130—132 页。

58. 同上，第 131 页。

59.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小语种语言],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Texas Tech University, http://www.depts.ttu.edu/classic_modern/undrgrad/lctl/lctl.php.

60. Mary Ellen O' Connell and Janet L. Norwood, ed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s: Keys to Securing America's Future [国际教育和外语：保障美国未来的关键],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 37. 这几位作者倾向于关注没有开设的语种课程，但不顾及军事中的任何实际应用。

61. 参看注释 21，第 16 页，表 2b。1980 年，五分之一的大专学校没有设置任何外语课程。参看注释 2，第 3 页。

62. 参看注释 44，第 32 页。空军也许能从小学和中学招到需要的外语人才，因为那里聘用了许多（大约 25%）这类毕业生。同一个调查还发现，外语专业学士学位毕业生中有 2.2% 在“食品加工和服务行业”工作。国防部的 Stephanie van Reigersberg 也许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语言专业人员不到政府部门或军队应聘任何职务的原因：钱。她说，“外语知识根本不值钱。如果政府把外语专业毕业生仅定为行政 9 级（GS-9），你如何说服那些……可能去国际银行系统工作的人到政府来工作？”参看注释 48。

63. “新发现”是个相对的词。我们可以把要求军官掌握外语能力的号召追溯到几乎 50 年前。USAF/AFPDP 总部 1962 年 11 月的一份报告“军官学外语”引述了 1961 年 8 月 24 日关于军官外语训练的一封信，其中宣布了这一目标：“所有空军军官应掌握至少一门外语。”见此报告第 21 页。

64. 从 2003 年起，陆军就通过自己的 09L 口译 / 笔译人员计划积极招聘讲母语（主要是阿拉伯语）的人。根据国防部的资深外语权威人士 Gail McGinn 所言，这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计划。”House, Statement of Mrs. Gail H. McGinn, 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lans and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nior Language Authority,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110th Cong., 2d sess., 10 September 2008, http://www.dod.gov/dodgc/olc/docs/testMcGinn080910.pdf.，http://www.dod.gov/dodgc/olc/docs/testMcGinn080910.pdf. 根据这份文件的最新态势报告，陆军计划把这个项目从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扩大到太平洋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Army Culture and Foreign Language Strategy (ACFLS)”[陆军的文化和外语战略], 2010 Army Posture Statement [2010 陆军态势报告], https://secureweb2.hqda.pentagon.mil/vdas_armyposturestatement/2010/information_papers/Army_Culture_and_Foreign_Language_Strategy_(ACFLS).asp.

65.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Language Map: A Map of Langu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现代语言学会语言地图：美国的语言地图],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ttp://www.mla.org/map_main.

66. 空军 ISR 局的年度“传感奥林匹克”外语竞赛对建立一个这样的项目将是极好的借鉴。若想了解其创新者最初的项目“轻松奥运会”，可参阅美国空军退役少将 Doyle E. Larson 的文章“ESC Commander Starts Comfy Olympics”[电子系统中心指挥官创办轻松奥运会], Spokesman Magazine, December 2004,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QUY/is_2004_Dec/ai_n15622859/?tag=content;col1. 欲知较近期的有关传感奥运会信息的介绍，参看 1st Lt Karoline Scott, “Sensor Olympics XXIX Honors AF ISR Agency's Enlisted Airmen”[第 29 届传感奥运会表彰空军 ISR 局的空军战士], Air Force ISR Agency Public Affairs, 10 November 2008, http://www.afisr.af.mil/news/story.asp?id=1231234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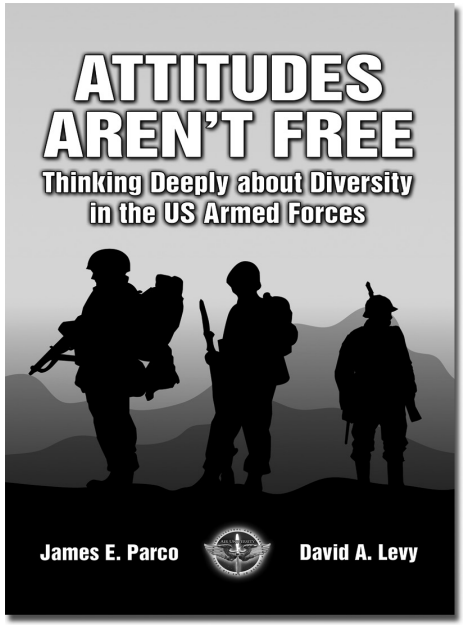
约翰·康威，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John Conway, USAF, Retired），阿拉巴马大学文学士、文科硕士，现在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研究所担任军事防务研究员。他曾作为情报官服务于总部空军情报局、北美空防司令部，以及国家安全局等部门。他曾任乔治亚州罗宾斯空军基地的空军预备役司令部总部的资深情报官，并担任多个联队与中队级情报职务，包括在越南共和国嘉莱省波来古市第二直接空中支援中心执行野战任务。他的最后一个现役职务是空军预备役司令部总部缉毒支援处处长。退役之后，康威上校担任罗宾斯空军基地的 U2 部系统工程与技术援助合同顾问。2001 年 9/11 事件后他在乔治亚州戈登堡基地担任戈登地区安全行动中心文职顾问。他经常为《空天力量杂志》及空军大学网络版新闻 The Wright Stuff 撰稿。

"不问，不说" 军队政策调查报告

Report of the General/Flag Officers' Study Group*

退役将官调研组：
Hugh Aitken（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准将）；Minter Alexander（美国空军退役中将）
Robert Gard（美国陆军退役中将）；Jack Shanahan（美国海军退役中将）

编按：美国空军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一部重要著作《Attitudes Aren't Free》（信念争鸣），所录论文分为四部分：宗教信仰、同性恋、种族和性别、社会政策。这部论文集对了解美军文化演进和现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选自该书第二部分“同性恋”。



序言

从美国各大军种退役的四位将军组成调研组，对“不问，不说”军队同性恋政策开展了深度评估，调查报告于 2008 年发表。他们在调研中查阅了各种重要的学术和社会科学相关文献，拜访了在领导方法、部队凝聚力和军事法规等领域有精深研究的专家，包括那些培养国家未来军事领导人的军校教官。调研组强调指出，军队的士气、严明的军纲军纪和部队凝聚力是保证军队效能的关键要素，对现行军队人事政策的任何改变，都不得对军队的这些要素产生不可接受的风险。（编注：其余部分略。）

背景说明

事关军队的一切政策制定均须以促进战备为目标，并以此为衡量标准。自 1993 年通过“不问，不说”（Don't ask，don't tell，缩写为 DADT）政策以来，军事、文化和政治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有鉴于此，DADT 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查尔斯·莫思克斯（Charles Moskos）教授于 2007 年 10 月表示：时机现已成熟，应“由一个跨党派委员会来全面审察和军队同性恋政策相关的问题，其中应包括向那些公开偏向军方并具有全国威望的知名人士咨询”。[1]

本调研组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性对话需要听取具备军队经验和洞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from *Attitudes Aren't Free* with permission by the authors, the Palm Center, and Air University Press.

察力的退役军人的意见，以就现行政策应否改革及如何改革向国会和公众提出合理的建议。

我们作为代表各军种的退役高级军官，以开放的胸襟投入这一过程。我们曾支持这一政策，并且感到，在此政策出台将近 15 周年之时，有必要从军事角度认真思考该政策现今是否继续有助于服务其当初制定时“维护军队效能”的目的。我们的观点是，对 DADT 的重新审察必须满足三个必要的基本条件：其一，对有利于保持军队士气和严明军纲军纪的军事政策持尊重态度；其二，对该政策与军队效能的当前关系有审察意愿；其三，对争议问题有能力坚持理性调研和查清事实。

在 1993 年起草 DADT 文件时，国防部最初将其作为一项过渡性措施。[2] 该政策是为实现总统竞选承诺而达成的政治妥协，军方与政界领导人都将 DADT 视为权宜之计。[3] 鉴于当时的情况，颁布 DADT 的确是妥当的解决办法，但该法令和政策至今已实施多年，几乎未做任何重大改动，仅这一事实就违背了该法案的初衷，说明军民在知情环境中重开讨论正当其时。可以说，经过这样一段漫长时期之后，现在对该法令和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进行评估，是适当而必要的。

2007 年 2 月 28 日，前众议员马丁·密汉（Martin Meehan，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和一个包括 109 名共同发起人的跨党派集团在众议院重启对《加强军队战备法》的讨论，旨在修订美国法典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以一项禁止性取向歧视的政策取代军中现行的禁止同性恋从军政策，从而提高军队战备水平。这项议案获通过的近期前景尚不明朗。但在这场对话中应听取军方高层领导人的观点。本调研组提交的报告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一小步。

本调研组的目标包括：(a) 审察国防部 DADT 政策和第 10 USC § 654 法令《关于军队同性恋的政策》，确定这两项政策法令能否随着时间推移继续服务军队的最高利益；(b) 对该国防部政策和国家法令随时间推移的效果提出客观和知情的军事判断；(c) 探讨军方和国会应否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本调研组无意起草新政策，也无意解决现行政策如果延续可能引起的问题。本调研组坚持的目标是查阅所有可得资料，听取和考虑专家意见，就该国防部政策和该项法令的总体现状及其对军人、军队领导和效能的当前影响提出建议。

本调研项目由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帕尔姆研究中心（Palm Center）资助。帕尔姆中心学风严谨，研究成果发表于包括陆军战争学院主要学刊《Parameters》在内的各种知名军事期刊，并被世界各大新闻媒体广为引用。帕尔姆中心作为从事有争议性社会科学研究的智库，曾得出批评军方政策的结论，同时也受到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的批评。为保证该项研究公正无偏，在本调研组的坚持下，帕尔姆中心同意，作为参与的一项条件，调研组的结论完全由调研组负责，由帕尔姆中心的研究和工作人员不加改动地公布。

调研组把重点放在关于军队同性恋政策的两个关键领域：(1) 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认定的“不可接受的风险”的标准。(2) 国防部为执行该法令而制定的“不说，不问”政策以及一系列指令的实施，特别是国防部第 1332.14 号指令。2007 年 8 月和 9 月在华盛顿陆海军俱乐部的会议上，调研组听取了多方面专家和相关人士的证词与意见，包

括 1993 年政策的设计者、军人问题和军人心理学者、军队指挥官、现行政策下被迫退役的军人、研究外国军队及军队包容问题的专家、外国军队指挥官，还有宪法和其它法律专家。调研组审慎寻求代表各方观点的专家意见，包括现行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鼓吹者和批评者。

调研组查阅了 1993 年国会听证会的材料，并会见了该项法令和政策的设计者。调研组借助律师和法律学者的帮助详细研究了该项法令的语言。最后，调研组审察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的相关政策，并同具有在伊拉克等地执法经验的军队指挥官讨论了该项法令、政策与《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的相互关系。

调研组查阅了有关这一主题的重要学术及社会科学文献，其中包括关于军人意见与民众态度的现有最新定量资料（民意调查数据）、有关部队凝聚力和军人心理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对外国军队的比较研究。调研组听取了研究军中性取向少数群体及 DADT 历史的专家意见，并与各军种院校培训国家未来军事领导人的教官进行了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

调研组感到遗憾的是，没有一位反对同性恋者从军的专家愿意同我们当面会见或交谈。对于这些专家中的每一位，我们都提出，他们可以书面形式或面谈形式做出证言，由我们安排并资助前来华盛顿的交通费用，或使用视频或电话会议设施。调研组还请求反对同性恋者从军的专家提供可能愿意参加研究的其他专家姓名。由于这些专家们没有一位愿意亲自参加，也不愿意提供其他姓名，调研组只能对他们公开发表的著作和他们愿意提供的书面评论详加查阅和认真研究。

“不问，不说”的历史

是否允许男女同性恋者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问题，曾在美国历史上浮沉多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队规章均未明确给出同性恋者这一概念。那些被发现有同性恋行为者，或者被惩戒，或者被开除，并无统一的处理方式，所依据的也只是禁止某些性行为的规章，或者引证针对某些不体面社会行为或交往群体的政策。到二战末期，所有军种都禁止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行动，尽管禁令的执行一直参差不齐。

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法庭案件对排斥同性恋政策的执行缺乏连贯性提出了挑战。卡特政府为回应这些法律挑战，并出于政治考虑，发起了全国防部范围禁止同性恋者从军的禁令。在卡特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国防部颁布第 1332.14 号指令，实际上取消了各军种或各部司令官先前享有的任意决定权。[4] 新政策将原政策视同性恋者为“不适宜在军中服役”的语言，修改为“同性恋与军队不相容”。其所给理由如下：

> 军队必须保持军纲、军纪和士气，培养军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保证军阶系统和指挥关系的完整性，要求军人奔赴世界各地并在狭窄且几乎没有私密可言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执行任务，需要完成征兵和保留军人在役，保持军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防止有人违反保安要求，而同性恋军人的存在将负面影响军队的所有这些能力。[5]

到 1980 年代末期，排斥同性恋的政策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在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海军陆战队训练中心，几名嫌疑为女同性恋的军人被开除，这一事件为同性恋禁令的批评者火上浇油。新起的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维权团体，与民权组织、法律援助

团体和国会议员们联合发起活动，引起公众关注该项政策的后果。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媒体报道了军方派遣同性恋者奔赴战场、却在返国时将他们开除军籍的指称。该项政策遭遇持续不断的法律挑战，在公众舆论法庭上，特别是在那些经常抗议学校内设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学校园内，受到日益高涨的反对。这些反对舆论汇合形成势头，在九十年代早期引起了立法者和执政竞选人的注意。[6]

1991 年 10 月，时任州长并竞选总统的比尔·克林顿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讲演时，被问及他对禁止同性恋者从军问题的立场。他回答说，他反对该项禁令，如能当上总统，他将撤消这项禁令。克林顿以“人尽其才”（meritocracy）一词来解释自己的立场，称国家不可排斥任何公民以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即使这些公民不为其他一些公民所喜欢。与此相对，那些反对撤销同性恋者从军禁令的人们，包括军方、宗教团体及其他保守社团的许多人士，将这个问题与“国家安全”和“军队战备”挂钩，他们争辩说：改变政策将会破坏一支强大军队赖以维系的严明军纪、士气和部队凝聚力，陷战士生命于无谓的危险之中。[7]

克林顿于 1992 年 11 月成功当选之后，其在军队同性恋问题上所做的竞选承诺一直是媒体讨论的热点，达数月之久。军方及美国社会其他阶层激烈反对，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恩参议员（Sam Nunn）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Colin Powell）都坚持认为军队绝不允许同性恋行为，他们指出：《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禁止诸如鸡奸等通常与同性恋相关的某些性行为，该军事法典只能经由国会法令来更改。当选总统克林顿争辩说，一个人的身份 — 而非其行为 — 不应成为该人从军的障碍。他继续重申他将彻底撤销该项禁令，以允许美国男女同性恋者及双性恋者不必掩饰身份而为国从军。[8]

1993 年 1 月，克林顿总统宣誓就职几天以后，即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会议员们达成妥协，暂停执行排斥同性恋的政策的某些规定，用半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在这段暂停执行期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征兵者不再提问应征者是否同性恋这个问题，而这曾是入伍的一项先决条件。但是军队对同性恋的调查继续进行，任何入伍者一旦被发现是同性恋,将被转为“预备役待命”身份，薪金和福利都会停止。[9]

克林顿随即指示其国防部长阿斯宾（Les Aspin）组织班子研究更改该项政策的最佳方案，要求既能终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又能维持军队战备所必要的军纲和军纪标准。改动此政策的任何选择方案都要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纳入考虑。

阿斯宾部长在当年春季指示开展了两项重大研究。一项是由阿斯宾任命的若干将官组成的名为“军方工作组”的小组进行，受命于 1993 年 7 月提交报告。另一项研究委托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进行，该公司是二次大战后由军方人士创办的民间智库。这两家组织递交了结论相反的报告。军方工作组建议:采取的政策应保留“同性恋与军队不相容”这一结论；兰德公司则认为在决定谁可以参军的问题上，一个人的性取向应被视为“没有关联”（Not germane）。[10]

在军方专家们准备报告期间，国会在纳恩参议员主导下，另行召集有关此问题的听证会。国会两院举行的这些听证会持续了数月，邀请了多方人士前来作证，包括国家安全专家、法律学者、社会学家、国会议员，

以及现役和退役军方人士。参议院还举行了现场听证会，与军舰和潜艇上服役的水兵讨论这个问题。[11]

1993 年 7 月 19 日，克林顿入主的白宫发布了“不问，不说，不究”（Don't ask, don't tell, don't pursue）的政策。克林顿在麦克奈尔堡陆军基地的讲演中，把暂停要求应征人员回答是否同性恋者问题的临时做法永久化。国防部长阿斯宾在签署的一份备忘录中做出指示：“不向应征入伍申请人提出、也不要求他们回答涉及暴露性取向的问题”。

该项政策要求把有同性恋行为的军人开除军籍，同性恋行为被定义为“一名军人声明自己有倾向或意愿从事”同性恋行动。这里的“行动”定义为同一性别的两名军人之间为“满足性欲”而发生“身体接触”，或者“理性的人会将此理解为表现出从事同性恋行动的倾向或意愿”。该项政策解释说，“一名军人公开声明自己是同性恋者”，将被理解为表明“可推论出他或她有意从事犯禁行为”。因此，这样的声明再加上犯禁行为本身，将导致开除军籍。[12]

国会经过辩论后，就克林顿政策的若干版本举行投票，终于在该年 9 月通过了一个做了多处改动使语言更严厉的版本。特别是，参议院通过的新版本中没有出现“不究”的字眼，也没有响应克林顿政策中提出的“性取向系个人隐私问题，同性恋倾向若没有表现出同性恋行动、则不构成参军或继续服役的障碍”的表述，却将同性恋者称为对军队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并允许国防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恢复“问”的做法。参议院版本要求将发现从事或企图从事同性恋行动的军人开除军籍，此处同性恋行动的定义包括公开声明自己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13] 众议院于 1993 年 11 月以 301 票对 134 票通过了相同的议案，由克林顿总统签字后成为法律（1994 财年国防授权法）。接下来的几个月，国防部编写出执行规章，对以前的指令加以更新。该项法令和新规章于 1994 年 2 月起实施。

调查结论

调查结论一：该项法令锁定军队立场，不予灵活余地，没有委托国防部按形势变化调整政策。

按照 DADT 法令的文字表述方式，国防部被限制不可以适应军队的需要或战备为由而调整其政策。调研组发现，军队各部指挥官在日常执行中其实普遍讲究实际灵活处置，致使一些人错误地假定 DADT 政策行之有效。事实上，该政策没有做到行之有效；是那些经常无视或违背该项政策的军队领导人以灵活手法，使整个系统生效。国防部需要有一定的自由度来制定和修改政策，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现行法令的措辞没有认可军方的灵活性，也没有授权国防部调整其政策。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对同性恋限制的依据包含在该法令开头列举的国会 15 项调查结论中，其中最后一项调查结论为该项法令给出逻辑依据：“军队中若存在表现出有从事同性恋行动的倾向或意愿的人员，将对维持战斗能力所必须的高标准士气、军纲和军纪及部队凝聚力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以“不可接受的风险”作为标准，是国会于 1993 年在听取可靠军方领导人证词的基础上制定的，那些领导人对国会的建议又是根据当时或更早期军队人员对同性恋的态度。但我们接触的证人向我们确认，军队人员对同性恋的态度自 1993 年以来已经发生变化。调研组得知，当该项法令于 1993 年通过时服役

的军人，只有约 20% 如今仍在服役。国防部即使想根据军人态度的改变而调整政策，也做不到，因为受该项法律具体条文的限制。调研组相信，国会应当把这项权力归还给国防部，使国防部得以制定符合军事需要的人事政策。

调查结论二：军事法规给予指挥官充分的手段来惩戒不当行为。

在军队环境中，有许多种类的行为被视为不当。《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和国防部的规章已为指挥官提供了大量的和充分的手段，来惩戒不适当的公开亲昵、与敌国异性发生性关系、通奸，以及其它有损于维持良好军纲、军纪、士气和部队凝聚力的任何行为。此外，《婚姻保护法》禁止联邦政府出于任何目的认可同性婚姻，即使任何一州已予认可。

调查结论三：DADT 迫使某些指挥官在违法与保持部队凝聚力之间做出抉择。

调研组担忧地得知，DADT 使某些指挥官在日常工作中处于两难境地，因为他们必须在遵行该项法令的必要性和维护部队完整性的重要性之间做出权衡。

调研组听取了一位刚从伊拉克驻防归来的异性恋军官的陈述。他告诉调研组说：他部下一位最优秀的士官可能是女同性恋者，如果他当时收到了证明她是同性恋的可靠证据，他就有可能被迫在遵行法令和维持部队完整性之间做出抉择。对这位军官而言，保持部队凝聚力已具体表现在能否保留住一位合格和优秀的女同性恋军人。当被问及他会做何种决定时，他说他可能会选择违法。军事法律专家作证说，“该项法令规定，一旦说出就必须追究。”然而一位前士官证实：“不止一次我本应报告一些事情但没有报告，我帮助同伴保留住军职。”他承认：“我这样做是自己触犯了法令。”

与此相关，法律和军事专家证实，尽管 DADT 要求指挥官一旦得知部下的同性恋身份，就必须采取措施，但是“指挥官并没有因为未采取追究措施而受到警告。”因此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许多报告的案例仅仅根据谣传或未经看到的行为，指挥官在决定是否调查某人的性取向方面，留有相当充分的处置权。这一因素会导致不均衡甚至任意执法。一位士官告诉我们：“在一个勤务地点习惯了‘开放’的环境后，如果转到另一个更严格保守的环境，那就麻烦了。”对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来说，执法的不可预见性可能为他们的工作带来心理负担。

调查结论四：DADT 阻止某些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获得心理和医疗诊治及宗教咨询。

调研组惊讶地得知，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与医生、牧师 、咨询顾问及其他专业人士的谈话缺乏应有的保密，而异性恋军人却可向他们自由吐露秘密并得到保密。[14] 该项政策也给专业人员造成了道德困境，他们必须在遵守联邦法律义务与职业道德义务之间做出抉择。

尽管一般认为与军中神职人员的谈话应该得到保密，但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军人与牧师的私密谈话被后者报告指挥官而遭调查甚至开除军籍的事件时有发生。沃尔夫教授（Tobias Barrington Wolff）发表的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发现：在 2000 年，“国防部实际上指令同性恋士兵若对该项政策有疑问时，可以找牧师谈话，言外之意是尊重他们的隐私权。但这一指令并未提供多少保障。当牧师把同性恋士兵在求助谈话中的内容报告之后，军方继续启动开除军籍程序。”他又说，“某

些军队指挥官指示医生和心理医师，如有任何士兵在治疗过程中谈及是同性恋者，则要求他们必须举报。”[15] 海岸警卫队前士官总长巴顿（Vincent Patton）证实说，牧师团的保密是一个严重问题。他指出，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因缺少家庭关照，也许更需要牧师帮助，但是向牧师倾吐真话却可能导致开除军籍。

在医生和心理医师这方面，保密不善基本上也是众所周知，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向医务人员透露性取向就要自担风险。有一个名叫罗达·戴维斯（Rhonda Davis）的前海军士官，因是同性恋者而被开除军籍。她告诉我们说，“作为一名上士，我需要领导别人，既为领导，战士们就会前来求我提供建议，给以指导。我部下有不少同性恋士兵，看到其中有些人因为这项政策而忍受许多痛苦。有一个男同性恋士兵染上了性病，来问我该怎么办。我当然劝他去看医生。但是他提醒我，他若这样做就可能被海军开除。另一位是女同性恋者，与女朋友的关系出了问题，便扬言要自杀。我劝她去看心理医师或牧师，但随后意识到这个主意不好，因为谈出她的女朋友就是违反 DADT 政策。不论我对士兵们说什么，结果都不对，我觉得自己像个伪君子。”

虚假的指控也会威胁到异性恋者军人的前途或福利，可能生成一种惧怕和猜疑的氛围。“在 2001 年发生的一起轰动事件中，一名空军男军人被一个文职人员强奸，于是去求助于部队心理医师。该医师断言这位士兵一定是同性恋者，否则他就不会听任自己被强奸，并威胁士兵若在诊断过程中说出自己是同性恋者，就要向他的指挥官报告。”[16]

2007 年 2 月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份报告提请注意全体军人及其家庭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需求。该报告指出，由于缺乏心理医护资源或就医方面设有障碍，许多军人及其家庭不去看心理医生。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报告，在曾被派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区的所有军人中，有 30% 以上符合某种精神失常的标准，但这些需要心理健康关注的军人中只有不到一半人寻求帮助。据美国陆军西点军校行为科学与领导系主任汤玛斯·科尔蒂兹上校（Thomas Kolditz）说，“DADT 使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更不愿寻求治疗，实际上是加剧了［现存的］问题。”不仅军人被阻而不去寻求医疗帮助，医务人员也被束缚无法从事他们的工作。

DADT 阻止一些军人接触宗教、医疗和心理服务，是对他们的健康构成风险。并且，剥夺他们的隐私保密权引发关乎职业道德和宪法保护的严重问题。因此，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在寻求此类专业咨询时的隐私保密权应予恢复。

调查结论五：DADT 使军队丧失了一些人才。

军方为达到布什总统所设的在其后五年内增招 95,000 名新兵的目标，需要每年加征 18,000 余名新兵。据最近刚从主管人事和战备的国防部副部长职位退休的詹妮·劳伦斯博士（Dr. Jan Laurence）说，人员短缺已极其严重，“我们正设法将空缺岗位转为文职，因为我们需要人。”她强调说：“我们火急需要增员。”鉴于劳伦斯博士的专业背景，调研组特别重视她的结论。

军方为应对人员短缺，在过去三年所征召的兵员中，有犯罪前科者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 2004 财年的 824 名增加到 2006 财年的 1605 名。这份资料显示，自 2003 年

至 2006 年间，军方依据“道德豁免”计划，征召入伍的有犯罪前科者达 4,230 名，使本来不合格的人员得以进入军队。此外，依据此道德豁免计划，同期内征召了 43,977 名有严重不良行为记录者（如打人）和 58,561 名非法滥用药品者入伍。

与此同时，据政府问责署的一份报告称，近 800 名具有国防部认为“使命关键”技能的人员依照 DADT 被解职。该数据包括 268 名情报人员、57 名作战工程人员、331 名医务人员，以及 322 名语言专家，其中至少 58 名阿拉伯语专家。[17] 我们在将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解除军籍的同时，却在“道德豁免”计划下征召不合格人员入伍，这样做不利于军队战备。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若不是 DADT 于 1994 年实施，每年约有 4,000 名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本可以留在军中，这个数字中，每年平均有 1,000 名男女军人直接由于该项政策而被辞退，另外 3,000 名如果在能够公开身份不需畏惧解职的环境中服役的话，本来也可能留在军中。

与此对照的是，最近一项 Zogby 民意调查应答者中有 2% 假定为异性恋者的军人说，若是允许同性恋者公开在军中服役，他们就不会入伍。这相当于该项政策实施以来 14 年间每年可能损失大约 4,000 名新兵。

如果从表面上来看上述统计数字，废除 DADT 对征兵和人才保留并没有多大意义，它所表述的只是每年有 4,000 名异性恋者不愿参军，而每年有 4,000 名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参军及留在军中。

对这些统计数字，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加拿大和英国军队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员曾表示他们不愿与同性恋者一起工作。但是当这两国取消限制同性恋入伍的禁令后，据招兵人员报告，并没有出现大批退伍或征兵难度加大的现象，甚至招兵和留人状况还略有改善。据包括英国国防部分析在内的若干项研究，取消禁令后英国军队中仅有极少数人员退职，尽管三分之二的英国军人先前曾经在调研中表示不愿与同性恋者一起工作。[18] 美国有关参军和留伍倾向的研究可谓浩瀚，却竟然没有人将取消同性恋入伍禁令作为一项变量来研究。然而 Zogby 民意调查的确将此因素列为参军和留伍的许多动机之一，这项调查发现，在 10 个可能的动机中，按重要程度排列，废除 DADT 占第 10 位。

即使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如果确实有 4,000 名异性恋者不愿参军，而 4,000 名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参军，则可两相抵消。然而调研组仍想强调指出，军方多次正式声明需要建设和维护一支多元化军队、是以展示自由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建设和维护一支多元化军队是打赢反恐战争的一个中心要素，因为美国军队的多元化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样板向专制统治下的人民展示：多元和包容能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19]

调查结论六：DADT 迫使某些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谎报自己的身份。

调研组担忧地发现，DADT 鼓励了某些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的不诚实。虽然其中一些人缄默不谈自己的性取向而保持服役，更多的人却被迫谎报身份。据对 DADT 做过广泛研究的宪法专家沃尔夫教授称，“在正常交往中‘浑然不知’自己的性取向简直是不可能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需将自己表

现为异性恋者。”[20] 想象一下，一个已婚异性恋女军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有丈夫，这现实吗？虽然理论上这是可能的，在现实中这种掩饰很难维持，因为彼此关爱的军人之间经常发生无意的取笑和真诚的关心。

数名跟我们谈话的士官证实说，虽然他们从未被正式问及有关性取向的问题，但在非正式场合常常会涉及约会的话题，在这种环境下，为逃避嫌疑他们觉得只有撒谎。一位在空军服役 20 年、曾赴阿富汗的士官说，每当别人问起时，“我就撒谎。”他又反复强调：“我不喜欢撒谎。”

该项政策使一些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陷入困境，伤害了荣誉和信任必不可缺的正直品格。

调查结论七：许多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公开身份服役。

尽管 DADT 致使不少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谎称其身份，也有许多此类军人却以公开身份服役。据估计现有 65,000 名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在服现役或预备役，另估计有 100 万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退伍军人。[21] Zogby 在 2006 年对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军人做过一项民意调查，调查表明，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军人（23 %）声称他们肯定知道自己部队里有人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在那些声称肯定知道自己与男女同性恋者一起服役的人当中，有 59% 的人说自己是直接从那个人口中得知其性取向。在知道有战友是同性恋者的军人中，有一半以上（55%）声称：自己所在部队中的人都知道同伴中有同性恋。有一个研究美国军队的著名学术专家对我们说，“有一点我已省悟：同性恋者需要隐瞒身份才能生存，但我没有看到有多少同性恋者把自己完完全全地包裹起来。”

一位士官向我们坦白说：“当然我不会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我是女同性恋’。可别人不是傻瓜，他们总会注意到我既无男朋友、也无丈夫、又无孩子的事实。迟早，当大家成双成群在士官俱乐部欢聚时，我的秘密就会泄露。战友们放松身心，所聊话题不外乎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我却常常谈起那会儿我正在约会的某位姑娘。她最后说，“我之所以对我的海军战友坦诚相待，是因为我觉得别人尊重我的工作态度、我的正直、我的个性。我是个好人，是个工作狂，他们会看到这一点的。”

调查结论八：DADT 使一些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难以履行职责。

那些执意遵守该项政策并谎称自己身份的军人，有时会成为同伴怀疑和嘲弄的对象，这会影响个人及部队的表现。一位士官对我们说：

> 我在西班牙驻防期间有两个同性恋朋友，其中一个，叫他 E 吧，象我一样，公开表明是同性恋。另一个，叫他 T 吧，死板地遵守“不问，不说”政策。T 告诉我他是同性恋，却对其他同伴们撒谎，说他有女朋友。可是人人都恨他。我问同伴们为什么要跟 T 过不去，而没人来打扰 E 和我。他们说问题不在于 T 是不是同性恋，而在于他撒谎。在他们看来，撒谎是懦夫行为，他对他们撒谎就等于侮辱了他们的人格。这个事例说明，DADT 是一柄双刃剑，如果你遵从，就得不到同伴信任；如果你不遵从，就可能天天提心吊胆，怕断送自己的前程。

这样的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军人宁可与男女同性恋者共事，也不愿与不诚实的同伴为伍。这就将年青的战士们，不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者，置于无法共处的窘境。

那些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军人，还须面对其它风险。一位海军退伍军人告诉我们：“我入伍的时候，‘不问，不说’政策出台只有一年多时间……但我仍向大多数舰友坦诚说出我的性取向。”接着她又解释了自己的担心：

> 甲板那头办公室里那位军官曾请我出去约会，后来却发现我是女同性恋，他可能断送我的前途。我有个部下经常迟到，我忍不住会对他发火，他知道我是女同性恋后，也可能断送我的前途。我所共事的这些人，谁都能够随时随地断送我的前途。我虽与他们融洽相处，内心深处总存着警觉，不定谁哪天就会翻脸把我告发。我人在海军服役，前程却好像被别人捏着，这负担压在心头真不是滋味。还好，许多人知道我是同性恋后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一名称职的水兵。

调研组发现，该政策可能在所有相关的人之间造成一种顾虑和猜疑的氛围。

调查结论九：军队对同性恋的态度正在转变。

关于军队同性恋的现行法令和国防部 DADT 政策是根据军人的态度制定的。1993 年，赞同“男女同性恋者公开”从军服役的公众支持率为 40%。[22] 随着时代的变化，民众和军队的观念已经转变，表现出对同性恋从军的更大宽容。至少有 5 家不同的调查机构最近举行了全国性民意调查，询问公众是否允许同性恋公开从军。所有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中有 58—79% 认为应当允许同性恋在军中公开服役。

由《福克斯新闻》聘请的一家保守调查组织得出的结论是：64% 的公众，包括 55% 的共和党人，认为应当允许同性恋在军中公开服役。其它民意调查结果也证实：多数共和党人现在相信，同性恋应当获准在军中公开服役。[23] 大多数教会信徒也同意应允许同性恋公开从军。

盖洛普调查发现：年轻成人中有 91% 表示应当允许同性恋在军中公开服役。当然，正如莫思克斯在给调研组的一封邮件中指出的：“公众舆论不是关键，关键是大兵怎么看。”“大兵”态度的转变何时发生虽不可知，但以军人和公众舆论目前的指向而言，很难想象 DADT 会永久推行下去。

调查结论十：证据显示允许同性恋在军中公开服役不至于对士气、军纲、军纪和部队凝聚力构成任何重大风险。

支撑 DADT 的理由包含在该项法令内作为逻辑依据的国会 15 项调查结论中，其结论是：“军队中若存在表现出有从事同性恋行动的倾向或意愿的人员，将对维持战斗能力所必须的高标准士气、军纲和军纪及部队凝聚力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虽然这个结论可能真实反映了 1993 年的状态，但有证据显示现今已非如此。在 1993 年，“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一结论基于当时服役的军人和军方领导人的看法，以及外国军队的经验。但是，调研组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这项结论今天仍然站得住脚。[24]

西点军校行为科学与领导系主任科尔蒂兹上校是陆军中研究领导方式与部队凝聚力的顶尖专家之一，他作为野战炮兵军官服役 18 年，包括两年营指挥官和 7 年西点军校教授。在 1995—1997 年间，他在陆军 G-1 人事部任职，参与有关 DADT 的陆军政策的管

理。继阿伯丁武器试验场发生丑闻之后，他作为四名博士级研究员之一协助陆军部长完成了“高级评审委员会对性骚扰事件的调查”报告。他还出版了有关领导方式与部队凝聚力的许多著作和文章，声名卓著，其中包括为陆军战略研究所撰写的专著《他们为什么而战》(Why They Fight)，和一部在 2008 年 6 月出版的书《领导方式的最高境界：生死托付》(In Extremis Leadership: Leading as if Your Life Depended on It)。

科尔蒂兹上校告诉我们说，“凝聚力对带兵者来说非常重要，尤其在作战中，陆军作战准则中关于带兵方法的文件 FM 6-22 要求陆军领导人‘建设有强大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队伍。’在有关凝聚力的一些原则问题的研究中，有一项是比较任务凝聚力（个人在集体中发挥各自能力共同完成任务）和社交凝聚力(个人在集体中与成员相处)的相对贡献。”科尔蒂兹强调：当前的重点是训练战士的文化交叉技能，这符合要求官兵包容多元化的呼吁，有助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使命取得成功。他特别指出：

> 西点军校和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共同举办了一项研究生培养计划，称为“艾森豪威尔领导才能培养计划”，对象是陆军上尉，我在此计划中讲授一门跨文化领导才能及多元化培养课程，最近又将此课程适当修改作为讲座在耶鲁管理学院开讲。这门课程的一个核心启发元素是：跨文化领导才能不一定非要在外国文化环境中才能培养，在本土环境中也能养成，关键在于注意培养自己的多元化包容和交往技能。多元化涵盖种族、性别、社会等级、年龄、宗教信仰、身体能力差异、性取向等许多方面。我在阐述这个概念时举例说，如果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宾州兰开斯特郡难以同基督教门诺派背景的居民相处，大概也不容易在巴格达与逊尼派穆斯林背景的警察局长共事。

他进一步说：“我可以很方便地换一个性取向方面的例子来说明相处问题。”科尔蒂兹强调说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异性恋者无法与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建立信任。

兰德公司一位研究部队凝聚力的著名学者表示：“我不知道有任何证据”显示同性恋者会损害团结。一名刚从伊拉克战场回国的异性恋军官指出：部队中如有人因为是同性恋而被开除，其所造成的摩擦要比战友们知道身边有人是同性恋严重得多。已退伍的海岸警卫队前士官总长巴顿也证明说：在部队里，战士们曾对他说过“我们本来很团结，但在这个人［男同性恋］被踢出军队后发生了变化。”

鉴于外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在这个问题上差异较大，调研组没有花太多时间查阅外国军队的经验。话虽如此，英国国防部公布的两份正式研究报告值得注意。这两份报告跟踪了英国废除同性恋当兵禁令之后的发展，发现有些部队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但总体而言，军队改变政策之后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波动。调研组听取了以色利和英国方面研究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军队及民间顶尖学术专家的证词，他们都确认：在允许同性恋和双性恋军人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之后，并没有对部队的士气、军纲、军纪或凝聚力造成危害。事实上，英国最近已经开始积极征募同性恋和双性恋者加入皇家海军。[25]

虽然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军中大部分人赞同继续保持 DADT 法，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表示和同性恋者交往及相处感到别扭。这个结果和 1993 年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克拉克将军（Wesley Clark）为此指出:“十年以来，

这个问题的温度已经变化。在九十年代初，人们谈起这个问题就容易上火，九十年代末则平和多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98—99 年和 92—93 年相比，[来当兵的] 年轻人对这个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情绪激动。”[26] 在 2005 年，西点军校一名学员获得本系高年级最佳论文奖，这篇论文论证 DADT 不符合军队所强调的公平与平等待遇政策。[27] 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公开宣布：他虽然原先支持 DADT，现在不再相信这项政策符合军队利益。他在《纽约时报》2007 年 1 月发表评论文章说：“我现在相信，同性恋者在美国军队中公开服役不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28]

最后，新近有人对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返国的 545 名军人进行调研，这份数据分析报告表明：知道身边战友中有同性恋与部队战备完好率或凝聚力之间没有关联。[29]

建议

建议 1：国会应废除第 10 USC § 654 法令，将这项法律下的人事政策权力返交给国防部。

建议 2：国防部应取消“不说”政策，同时保持《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中的现行权力以及军人规章，以杜绝有害于军纲军纪和凝聚力的不良行为。是否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应被视为个人或私人事务。

建议 3：从国防部指令中删除所有关于“双性恋”、“同性恋”、“同性恋行为”及“性倾向”的提法，代之以在性取向上为中性含义的统一说法，例如可以说：禁止出于满足性欲在公共场合发生不当身体接触，等等。

建议 4：立刻建立和强化保密措施，防止把军人与牧师、医生及心理专家之间的所有讨论泄漏出去。♣

注释:

1. 笔者与 Charles Moskos 教授的通信，2007 年 10 月 6 日。
2. “我不会说我们今天奉行的政策会永远实施下去”；“我不会说这会一直保持下去”，国防部长 Les Aspin 和国防部法律总顾问 Jamie Gorelick 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军队同性恋行为所做的表示，1993 年 12 月 22 日。
3. John Holum 在与本调研组的对话中确认这一点，他说：“不问，不说”当时并没有准备“作为一项长期政策”。
4. 美国国防部在 1982 年 1 月 28 颁布指令 DODD 1332.14《开除军人行政规定》(Enlisted Administrative Separations)，其中 1:H 规定：“同性恋与军队不相容。军队环境中如果有人发生同性恋行为，或者言语中表露出有意发生同性恋行为的性倾向，将严重影响军人完成军事使命。军队必须保持军纲、军纪和士气，培养军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保证军阶系统和指挥关系的完整性，要求军人奔赴世界各地并在狭窄且几乎没有私密可言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执行任务，需要完成征兵和保留军人在役，保持军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防止有人违反保安要求，而同性恋军人的存在将负面影响军队的所有这些能力。”
5.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Sexual Orientation and U.S. Military Personnel Policy: Options and Assessments [性取向和美军人事政策：选择和评估],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3).
6. Randy Shilts, Conduct Unbecoming: Gays and Lesbians in the U.S. Military [不当行为：美军中的同性恋],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7. Curtis Wilkie, “Harvard Tosses Warmup Queries to Clinton on Eve of New Hampshire Debate” [哈佛在新罕布尔州大选辩论会前夕向克林顿抛出热身问题], Boston Globe, 31 October 1991.

8. Policy Concerning Homosexuality in the Armed Forces,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US Senate [军队中的同性恋政策：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 103rd Cong., 2nd ses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9. Thomas Friedman,“Compromise Near on Military's Ban on Homosexuals”[军队同性恋禁令即将妥协出炉], New York Times, 29 January 1993.

10.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Summary Report of the Military Working Group”[军队工作组总结报告], July 1993; 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Sexual Orientation and U.S. Military Personnel Policy: Options and Assessments [性取向和美军人事政策：选择和评估],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3).

11. 见注释 8。

1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Policy on Homosexual Conduct in the Armed Forces,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Chairman, Joint Chiefs of Staff”[关于军队中同性恋行为的政策：呈交给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备忘录],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 29, 19 July 1993.

13. 10 USC § 654, Policy Concerning Homosexuality in the Armed Forces [美国法典第 10 USC § 654 号：关于军队同性恋的政策].

14. 在 2003 年 10 月，美国心理学会董事会成立关于性取向和军队问题的特别行动小组，以期关注以下问题：(a) 军队心理健康系统对军人信息的保密；(b) 对军人开展联邦法律和军队心理健康服务的教育；(c) 培训军队心理专家；(d) 向军队心理健康专家咨询；(e) 国防部实施 1993 年关于武装部队中同性恋政策的情况，尤其是“不问，不说”政策的情况。

15. Tobias Barrington Wolff,“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的体现和问责], Iowa Law Review 89 (2004): 7.

16. 同上。

17. Bryan Bender,“Gays' Ouster Seen Leaving Gap In Military”[同性恋军人被开除在部队中造成裂口], Boston Globe, 24 February 2005: 1; 和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Financial Costs and Loss of Critical Skills Due to DOD's Homosexual Conduct Policy Cannot Be Completely Estimated [因国防部禁止同性恋政策所造成的财务成本和关键人才损失无法完全估算], GAO 05-299 (Washington, DC: GAO, February 2005).

18. Ministry of Defence, Tri-Service Review of the Armed Forces Policy on Homosexuality and Code of Social Conduct [三军对武装部队同性恋政策和社会行为准则的审查报告], December 2002; and Ministry of Defence, A Review on the Armed Forces Policy on Homosexuality, 20 October 2000.

19. Remi Hajjar,“A New Angle on the US Military's Cultural Awareness (CA) Campaign: Connecting In-Ranks' Diversity to CA”[美军文化认知运动的新天使：将军队多元化引入军队文化认知], (paper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s of the Inter University Seminar 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Chicago, IL, 26—28 October 2008).

20. Amici 简报，第 9 页。

21. Gary Gates,“Gay Men and Lesbians in the U.S. Military: Estimates from Census 2000”[美军中的同性恋，2000 年人口普查估计], Urban Institute, 28 September 2004.

22. David Burrelli and Charles Dale, Homosexuals and U.S. Military Policy: Current Issues [同性恋与美军政策：当前的问题],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2006): 6, citing a July 1993 NBC/Wall Street Journal poll.

23. Dana Blanton,“Majority Opposes Same-Sex Marriage”[大多数人反对同性结婚], Fox News, 26 August 2003.

24. Aaron Belkin,“Don't Ask, Dont Tell: Is the Gay Ban Based on Military Necessity”[不问，不说：同性恋禁令是否基于军队需要], Parameters, Summer 2003, 108—19; GAO, Homosexuals in the Militar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军队中的同性恋：外国的政策和做法], GAO/NSIAD-93-215 (Washington, DC: GAO, June 1993);“What Is Known about Unit Cohesion and Military Performance?”[部队凝聚力和军队作战表现], in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Sexual Orientation and US Military Personnel Policy: Options and Assessment [性取向和美军人事政策：选择和评估],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3).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是应国防部长 Les Aspin 要求编写的，从 1993 年 1 月 29 日后启动，在同年 7 月 19 日前完成。

25. Sarah Lyall,“Gay Britons Serve in Military with Little Fuss, As Predicted Discord Does Not Occur”[英国同性恋入伍波澜不惊，臆想的波动没有发生], New York Times, 21 May 2007, A: 1, Foreign Desk.

26. NBC Meet the Press, transcript [NBC 电视节目“面对媒体”字幕记录], 15 June 2003.

27. Cadet Alexander H. Raggio,“Don't Ask, Don't Tell, Don't Be: 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he Gay Ban in the US Military”[不问，不说，不做：对美军同性恋禁令的原则分析], (honors thesis, Department of English,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April 2005).

28. John M. Shalikashvili,“Second Thoughts on Gays in the Military”[对军队同性恋问题的再思考], op-ed, New York Times, 2 January 2007.

29. Zogby International, 2006.

退役将官为军队请愿书

2009 年 3 月 30 日

呈交：奥巴马总统和国会议员
主题：支持 1993 年通过的《关于军队同性恋的政策》（美国法典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

尊敬的总统先生和国会议员：

国会在 1993 年通过一项法律（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认定同性恋与军队不相容。这项议案在参众两院获得确保否决无效的跨党派多数赞成票通过，并且联邦法院多次认定此法合宪。我们坚定认为，国会通过的这项旨在维护良好军纲军纪和士气之军队独特环境的法律值得继续支持。

第 111 届国会有可能在 2009 年早期通过立法来废除这项法律（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我们以曾经担任军队领导人的经历，深深担忧废除此法之后对军队士气、军纪、部队凝聚力和整体战备的冲击。我们相信，让我们的现役军人承受这种负担，将损害征兵和留伍，冲击部队各级领导带兵，负面影响父母让儿女当兵的意愿，并最终破坏一支全志愿兵队伍。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我们敦促您支持 1993 年关于军队同性恋的法律（第 10 USC § 654 号法令），反对旨在废除此法或使之失效的任何立法、司法或行政努力。

以下签字的所有将官敬呈

（编注：此请愿书译自《Attitudes Aren’t Free》一书第 233 页。至 2010 年 2 月 4 日止，参加签名的美军退役将军达 1,163 人。）

挽救军人家庭

Saving Military Families*

吉恩·托马斯·戈穆尔卡，美国海军退役上校（Captain Gene Thomas Gomulka, U.S. Navy, Retired）

美军许多指挥官有感于“家庭战备”（Family readiness）对军队战备（Mission readiness）的重大影响，深深忧虑军人家庭离婚率居高不下以及现役和退伍军人自杀率攀升等问题。2008 年的证据表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淡化了退伍军人自杀身亡和自杀未遂的人数。有些军人配偶团体和退伍军人组织相信，美国国防部计算的离婚率严重低估了武装部队中的婚姻问题，在那些多次奔赴战区作战的官兵中，婚姻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代表美国陆军牧师总长监管宗教疏导活动的布鲁斯托姆（Glen Bloomstrom）牧师提交报告说，陆军于 2005 年 2 月对官兵及其配偶或恋人进行一项非正式调查，发现他们将婚姻 / 恋爱关系破裂列为军事部署期间最担心的事项，甚至高于死亡或负伤。一名海军牧师在派驻海军陆战队某作战营期间进行的研究也支持上述调查结果。这名牧师从伊拉克归来后，随同该部队一位士官驾车探访因作战负伤截肢的战友。拜访归途中，士官告诉牧师说，他宁可承受截肢之痛，也不愿面对妻离之苦，当时他的妻子正和他办离婚，并争夺儿子的监护权。此时此刻牧师认识到：他担任心理疏导的这支部队所蒙受的“伤亡”远非官方报告的人数所能包括。

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官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肩负着最重大的作战责任。历经数年多次征战任务和长期部署之后，军人家庭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因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官兵的离婚人数在 2008 年财政年度达到 16 年来的新高，就毫不令人意外。和上一年相比，2008 年陆军士官兵的离婚案件多出将近 1000 件。

辅导军人处理婚姻问题的随军牧师都熟知部署驻外和军队生活的心理压力会对婚姻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有位牧师认识军人罗伯和他的妻子黛比，俩人新婚后，罗伯随即赴伊拉克战地服役 12 个月，却未料到黛比怀孕，女儿出生时丈夫将无法守在身边。虽然罗伯在前线服役期间基本工资免税，这对夫妻还是发生了财务问题，这为身处战场的罗伯更增压力。从伊拉克归来后，罗伯判若两人，而黛比也非罗伯上前线时脑海中那个年轻、青涩的女子了。罗伯再无心重返前线，纵使尚未服完规定的兵役期即意味着失业，他也决定不再留营。这对夫妻的关系在罗伯离开军队后每况日下，终至分手。罗伯从此借酒浇愁，越喝越多，却始终无法驱散孤独和失落，在离婚后不足三月，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许多军人的离婚和自杀是在离开军队后发生，实际上军人离婚和自杀率远高于目前的统计数字。退伍军人事务部伤员护理处主管心理卫生的副处长卡茨（Ira R. Katz）博士表示：“预防自杀协调员发现，在本部所属医院照料的退伍军人中，每月约有 1000 件企图自杀案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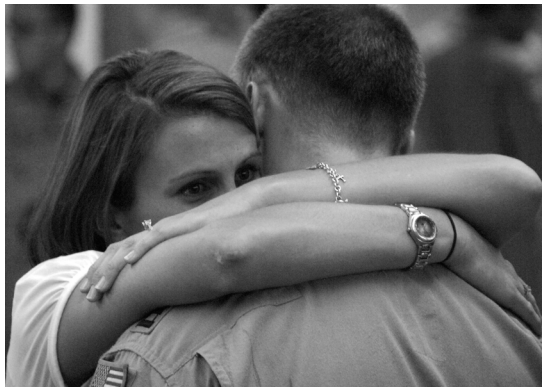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采集的资料和美国佐治亚大学流行病学及生物统

* This article is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Military Review*, the Professional Journal of the US Army, Combined Arms Center,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I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January-February 2010 issue of *Military Review*.

计学系代理主任拉斯伯恩（Steve Rathburn）博士的分析，从战场归来的退伍军人中，年龄介于 20-24 岁的这个组别在 2005 年自杀的人数“较同年龄民众高出 2-4 倍。”[2] 美陆军副参谋长基亚雷利（Peter Chiarelli）上将在阅读了关于陆军士兵自杀的调查后说：“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不变的因素，这就是婚姻关系出了问题”。根据这份报告，美陆军自杀率在 2008 年达到了三十年来最高纪录，其中 70% 以上的自杀案例都和婚姻相关。[3] 从陆军在 2009 年头 4 个月就发生创纪录的 64 起企图自杀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显然并未减弱。[4] 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中心主任、极受尊重的精神医学专家殷塞尔（Thomas Insel）指出：“在这场战争中，自杀和精神迷乱造成的“伤亡”可使作战死亡人数相形见绌。”[5]

军人婚姻破裂的后果

五角大楼的统计并不是计算实际离婚的人数，而是将各军种财政年度开始日的已婚官兵总数和年度结束日的已婚官兵总数相比，把差值估算为当年的离婚数字。此统计方法存在许多根本缺陷，例如，由于军人通常比一般民众容易再婚，某军人在 1 月离婚接着在 9 月再婚，就不会计入离婚统计数据中。



还有，如果两名军人结为夫妻而后婚姻破裂，就按两个离婚案件算，除非他们各自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再婚或者退伍。再者，在同一年度内，武装部队中始终有进有出，在年初被计入的那些人如果在同年中退伍，就不会被计入。

军人离婚问题被低估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军人在退伍 1-2 年后才遭遇离婚。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组织执行主席雷霍夫（Paul Rieckhoff）认为：五角大楼的离婚统计数据太低，是因他们没有把“退伍后发生的离婚、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军人的离婚，以及表面完好但已陷入困境的婚姻”计算在内。[6]

为何军人在婚姻出现问题后经常要等到离开军队后才离婚？原因很多。许多夫妻希望尽量保持只有已婚军人和军属才能享有的福利，军人一旦不再续服现役，福利就会中断；住惯了军属单元房的军人可能不愿住回集体宿舍中狭小的单人隔间，或是眼看基本住房津贴大幅削减；在医疗费用极高的现在，配偶也许希望尽量享有医疗福利，即使这意味着他们要和已不再相爱的军人保持合法婚姻关系。

有些州要求在离婚裁定核准前，当事人必须依法分居一段时间，而有些军属无法在其配偶服现役期间就完成这种合法分居期。这样的婚姻经常以现役军人完成兵役义务并退伍后随即离婚而告终，但是这类离婚也未反映在国防部的离婚统计数据中。

涉军婚姻在一方退伍后才正式离婚的再一个原因，是涉及到《军人民事救济法》（Service-members Civil Relief Act）。该法允许军人有权在诸如离婚等民事诉讼中要求暂缓，长期部署在外的军人便经常援引这项法律规

定，结果一些夫妻只能在军人完成长期部署归来后，才能完成离婚手续，有些离婚就是和服役期结束同时发生。

斯黛西·班涅曼（Stacy Bannerman）是军人配偶，同时也是退伍女军人和战争退伍军人家属周末庇护所的创办人和主席。她最近在《AlterNet》（爱特网）网站发表文章，名为“破碎的军人婚姻：另类战争伤亡”。她在文中写道：“军人婚姻失败的风险日益增加……2009 年有 13,000 多件军人婚姻以破裂告终……而主因就是军人需要驻外作战。”[7] 她并援引《武装部队与社会》期刊的一篇研究报告：参战退伍男性军人中至少经历一次失败婚姻的人数比男性平民多出 62%。参战退伍男军人的离婚率已经如此之高，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女军人的离婚率更高出同军种男军人将近三倍。

军人离婚率高的原因

德州理工大学心理学家卢德（David Rudd）受美国国防部委托主导一项旨在减少退伍军人自杀率的为期三年的研究。相信他肯定知道，要研究和探讨的不仅仅是退伍军人的自杀症状，还要包含自杀的主要起因，尤其是关注亮起红灯的婚姻。如果想减少现役和退伍军人的高离婚和自杀率，他应该探讨以下三项主要起因：

- 许多男性和女性军人结婚年纪太轻
- 财务问题造成压力，并且导致婚姻关系复杂化
- 多次长期部署（尤其是部署到战斗地区）造成战争创伤心理综合症等医疗和精神问题[8]

随军牧师穆诺兹（Frank Munoz）目前派驻加州米拉马航空站海军陆战队第 11 航空大队，他从担任牧师工作的初期就意识到，如果想减少婚姻问题和离婚，就必须说服许多陆战队员提高结婚的平均年龄。牧师的这项认知，在兰德公司 2007 年的一项名为“压力下的家庭”的研究中得到印证。该研究的结论是：“如能实施旨在减少或延迟军人结婚的计划或政策，有可能降低婚姻破碎的几率。”[9] 美国民众的平均结婚年龄，男性为 27.7 岁，女性为 26.0 岁，但许多男女军人结婚时年纪都比较轻，年纪稍长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未准备好处理婚姻和军队生活所带来的挑战。

军中牧师、辅导人员和从事社会工作的其他人员都必须重视防患于未然。预防不幸的婚姻，或者调整亮起红灯的婚姻进程，都有助于减少离婚可能性。正如某位人类行为作家所说：“预防不幸的、注定破碎的婚姻 — 无论从金钱还是从人类苦难来衡量 — 都要比试图清理婚姻破碎后产生的毒性容易得多。”[10]

为鼓励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军人推迟结婚，一种有效的方式是使用“军人伴侣关系自我检查问答表”。这些问答表设置各种提问，帮助军人看到和评估可能导致伴侣关系破裂的种种潜在问题和预防能力。在新泽西州梅角海岸警卫队基地训练中心担任首席牧师的巴瑞特（Miles Barrett）把婚姻和军队生活问答表与帮助酗酒者有效戒酒相比较。他说，在为一名呈现各种酗酒症兆的海军陆战队员做心理疏导时，他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的问题出在你有酒瘾，”而是帮助这名战士理解酗酒的各种症状，引导他自行承认：“牧师，我想我的确患上了酒瘾。”

同样的，巴瑞特牧师不会直接对新兵说："你太年轻，不可以结婚，该等一等，"而是推荐一份婚姻和军队生活伴侣关系问答表，就双方交流、家庭理财、矛盾化解、子女生育和婚姻 / 伴侣关系中的其他种种重要问题提出详细的提问，让新兵与其未来的配偶阅读和解答。许多年轻的新兵与其未来的生活伴侣填写了这份问答表之后，自行领悟而表示："或许我们再等一阵更好。"也有些人决定继续自己的结婚计划，但同时认识到："如果想存钱成家，就必须制定家庭理财计划并严格遵守。"年轻新兵是婚后不久就离婚的高发群体，首席牧师巴瑞特通过减少新兵的结婚比例，以及帮助那些决定结婚的军人做好应对婚姻和军队生活挑战的准备，有效降低了军队的高离婚率，并减少了家庭暴力和自杀率，因为所有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源于婚姻 / 伴侣关系出现问题。

造成现役和退伍军人离婚率高的第二个原因是财务问题。家庭预算不周和理财不善导致家庭经济周转失灵，给婚姻 / 伴侣关系带来沉重的压力。有些夫妻不愿用现金购物来节制消费，反而习惯于使用信用卡，为的是延迟付款，却没有偿还信用卡债务的计划。许多夫妻只支付信用卡账单上的最低偿还额，而非全部借款，因而欠下利率极高的卡费，陡然增加家庭支出。未雨绸缪定期储蓄的夫妻很少，一些年轻已婚夫妻毫无节制将钱花在娱乐和昂贵的电子"玩具"上。已婚并有孩子的士官兵，尤其是从二等兵（E-1）到中士（E-5）的阶层，如果花钱不加节制和不思储蓄，就可能陷入收支难抵的境地。

导致现役和退伍军人婚姻失谐、离婚，甚至自杀的第三个原因是孤独感。军人在派往前线期间容易感到孤独，引发部署结束回国后的身体和心理问题。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虽然承认：将婚姻失败归咎于军人多次部署在外和军队生活的独特要求"缺乏充分证据"，但指出："最充分的证据……来自对军人配偶的访谈和调查。"[11] 如果兰德研究人员调研了那些在退伍 1-2 年内离婚的退伍军人的资料的话，那么这份研究报告原本可收集到非常丰富的"证据"，将婚姻失败与多次部署联系起来。

当身为陆军连长的奥尔森（Paul Olson）从伊拉克战场归来后，他的妻子艾琳在接受陆军新闻处斯泰特（Ashley Stetter）的采访中，谈及她如何克服两人长期分居的问题。她说那段时间中她经常挂念着丈夫人在哪里，在做些什么，是否想念她和腹中的孩子。因为目睹了其他军人妻子发生的诸多问题，她表示："我看到许多婚姻破裂，就是由于不堪部队长期外驻对军人和家庭造成的压力。陆军的生活艰苦，你必须全身心支持对方，共同努力营造生活，才能保持婚姻长久。"[12]

拥有心理辅导证书的海军退役牧师汤普森（David Thompson）现在参与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的"黄丝带续温馨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员和后备役人员及其家庭提供帮助，重点放在帮助他们在完成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超期部署回国后，重新融入平民和家庭生活。他在目睹了许多婚姻因 12 个月或更长的部署期而破碎后，坚信多次的和长期的部署会伤害甚至瓦解婚姻和家庭。他指出："如果夫妻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有强大的社会支援网络，以及承受压力的弹性，就更可能平安度过'部署风暴'；但如果他们缺少这些支持和技能，或者不知道如何利用，就可能在驻外结束回家后，成为高风险婚姻的牺牲品。"

由谢利托（Larry Shelito）少将和莫里斯（John Morris）牧师构思的黄丝带计划，通过下列方式帮助已婚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正确应付军队部署带来的挑战：

- 请全家参加军人离家前家庭预备课程 — 部署期开始前 60 天。
- 请家属参加军人回家前家庭准备课程 — 部署期完成、军人回家前 30-60 天。
- 请全家参加部署结束后的恢复生活训练活动。

各种军人婚姻支持计划

在 2001 年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部队加快了行动节奏，所有军种都推出了帮助军人和家属克服部署期压力的部署前辅导活动，以及帮助军人顺利过渡及恢复常规家庭生活的部署后辅导活动。

这些支持计划要想取得效果，就需要帮助军人和家属说出自己的感受。在“黄丝带续温馨”计划中使用的《维系军人婚姻指南》列出能够激发夫妻开展讨论的各种主题。此计划在帮助军人和家属克服部署归来后的婚姻问题上极具成效，已作为模式在全美军推广。

虽然军中有牧师及持证心理辅导员，通过他们开展巩固婚姻 / 伴侣关系的活动和技巧培训，但军队中许多人并不积极利用这些服务。例如，在驻有 100 多个军事单位并容纳 19,000 余名员工的海军某主要基地，曾安排一次丰富婚姻生活的休闲活动，这次公家付费的周末旅游仅有两对夫妻参加。由军中牧师举行的各种休闲活动也只能吸引很小比例的已婚和单身军人。许多人只是在个人问题已很严重或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时，才会利用咨询服务。

主动推销策略

为了鼓励单身军人和夫妻及早利用咨询服务与支持计划，首席牧师和军属支持计划负责人或可考虑运用类似于商品销售的行销策略。比如，购物商场和食品店经常请顾客试用香水或品尝食品，顾客如果满意，就可能决定购买。又比如，电影商经常通过因特网、电影院或影碟播放新片预告，吸引观众到电影院观赏全片或租借 / 购买 DVD 影碟在家观赏。此种销售技巧要求向到场的所有人进行培训介绍，讲解要活泼，能通过提供生动的“样品”或“新片预告”展现维系婚姻 / 伴侣关系活动或计划的好处，吸引到场者报名参加。到场者看到这些“新片预告”后，有些原来不感兴趣的人也会报名。这样的主动介绍方式，不仅鼓励更多人尽早参加军中牧师、军属支持部门和“军队一条龙资源“所提供的辅导计划和服务，也能让那些已经面临婚姻 / 伴侣关系危机的人及时获得专业疏导，避免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无可挽回。

这种介绍会的关键，是鼓励到场者在离开会场之前就报名参加计划，颇像“分时租房”房地产卖家所使用的销售方式。计划主办单位应在随后一周内给报名者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如果介绍会上的“样品”具有吸引力，报名程序快速而简单，主办人及时和感兴趣的军人跟进联系，那么我们相信参加这些辅导计划的人数应可增加 50%。这诸种计划的目的都在于帮助那些年纪轻、不成熟、缺少家庭理财经验的人正确应对和克服部队部署对个人关系、尤其是对已婚军人及其家属带来的影响。

作为个人,如果希望巩固婚姻/伴侣关系,应积极利用军中牧师和军属支持辅导员所提供的服务。作为组织,我们应重新评估各种旨在改善军人家庭生活的项目和计划,确保这些计划能有效提高家庭“战备完好率”和军队战备完好率,并应加强宣传,通过这些计划更加有效地减少因婚姻/伴侣关系危机和长期及多次部署而造成的各种问题。♣

注释:

1. Aaron Glantz,“The Truth about Veteran Suicides”[退伍军人自杀的真相],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9 May 2008.
2. Armen Keteyian,“Suicide Epidemic among Veterans”[退伍军人自杀成风], CBS News, 15 May 2009.
3. 同上。
4. Blake Farmer,“Record High Army Suicides Prompt Action”[陆军自杀率刷新纪录引发军队采取行动], National Public Radio, 15 May 2009.
5. Avram Goldstein,“Post-War Suicides May Exceed Combat Deaths”[战后自杀人数可能超过战场死亡人数], Bloomberg Press, 5 May 2008.
6. Paul Rieckhoff,“Military Divorce Numbers on the Rise”[军人离婚率升高], <military.com> (9 December 2008).
7. Stacy Bannerman,“Broken Military Marriages: Another Casualty of War”[破碎的军人婚姻:另类战争伤亡], 23 January 2009, at AlterNet, <alternet.org/sex/122198/broken_military_marriages:_another_casualty_of_war/>.
8. RAND Corporation,“One in Five Iraq and Afghanistan Veterans Suffer from PTSD or Major Depression”[伊阿战场退伍军人每五人中有一人患有战争创伤心理综合症或严重压抑症], news release, 17 April 2008. 此报告说:“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归来的 30 万军人中,有将近 20% 称患有战争创伤心理综合症或严重压抑症。”
9. Benjamin R. Karney and John S. Crown, Families under Stress [压力下的家庭],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7), xxxii.
10. Francine Russo,“Can the Government Prevent Divorce?”[政府能阻止离婚吗?], The Atlantic Monthly, October 1997.
11. 同上,第 xix 页。
12. Ashley Stetter,“Army Programs Help Keep Military Marriages Strong”[陆军实施巩固军人婚姻的计划], Army News Service, 31 January 2007.

吉恩·托马斯·戈穆尔卡(Gene Thomas Gomulka),美国海军退役上校,在军中担任军人家庭生活顾问 30 余年。他从意大利罗马 St. Thomas Aquinas 大学获得神学学士和博士学位,著有《维系军人婚姻指南》一书。作为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牧师作家之一,他荣获海军部长设立的“马汉”奖中的文学成就和杰出领导奖项。

陆军乐队上前线

Deployed Army Bands

约翰·S·弗雷泽，陆军特级准尉（John S. Fraser）

在美军发动“伊拉克自由行动”和“持久自由行动”之后，陆军乐队于2003年和2004分别奔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支持前线将士作战。目前，陆军有四个乐队部署在伊拉克：三个师级，一个军级。其中，来自华盛顿州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的第56军乐队，即I军团乐队，担任美驻伊部队的军乐队；来自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基地的第3步兵师乐队担任美军北区师乐队；来自德国维斯巴登基地的第一装甲师乐队担任美军中区师乐队；来自明尼苏达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的第34步兵师乐队担任美军南区师乐队。第34步兵师乐队将被堪萨斯州赖利堡基地的第1步兵师乐队接任。

在2004年，第25步兵师乐队的分队向美军驻阿富汗部队提供临时乐队支援。在2005年，第10山地师乐队的分队执行了同样的任务。自2006年以来，陆军乐队一直常驻阿富汗支持“持久自由行动”。2006年首先进驻的是第10山地师乐队，部署12个月后回国休整，由第82空降师乐队接替，再于2008年交接给第101空降师军乐队。第82空降师乐队在2009年重返前线，换下第101空降师乐队，并坚守到现在。

陆军乐队的使命

陆军乐队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的核心使命，是在我军开展全频谱军事行动的整个过程中提供音乐服务，鼓舞我军将士英勇作战夺取胜利，提升美国民众对军队的支持，推进美国在国内外的国家利益。

师级和军级领导人及军乐队队长必须从战略而非战役或战术层面思考军乐队的运用。军乐队部署到前方战区为前线将士演出，可以鼓舞士气，对当地国家和人民及其未来也可以施加独特的影响，对美国民众和政府以及其与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未来交往亦能产生积极的推动。我们已经丧失了运用陆军乐队产生这些效果的无数机会。陆军乐队部署前方的目的说到底只有一个：以音乐来支援司令官实现战略目标。

军乐队的职能

派驻前方的陆军乐队提供多种类型的支援，包括战略交往、部队支援、家庭支持、公共外交、社区关系、音乐教育、成员招募，等等。

战略交往。前方军乐队积极开展战略交往，外出演出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有现代滚石、经典摇滚、摇摆爵士、乡村与西部音乐、萨尔萨、军乐、古典、传统美国本土音乐、爱国乐曲、礼仪奏乐，等等。

部队支援。前方军乐队不仅在陆军建军节期间演奏，还为海军陆战队、海军、空军建军节的庆祝活动助兴。军乐队并经常前往陆军各分支部队，参加这些部队的纪念日活动，还支援盟军部队的欢庆活动，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ANZAC）成立日和英国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rmy Sustainment*.

荣军纪念日等。各战区指挥部和军事单位在美国所有传统节日都会组织活动，军乐队的支持必不可少。军乐队成员甚至为战场上举行的归化美国公民入籍仪式演奏，另外，我们也以音乐支援悼念阵亡将士的活动。

家庭支持。运用当今的先进技术，前方陆军乐队积极参与对军人家庭的支持。例如，制作演奏录像和录音，传到国内基地在重大活动期间播放，以及通过网络从伊拉克直播军乐队的圣诞节音乐会，等等。

公共外交。前方军乐队以专业水平的演奏来支持美国及英国大使馆及其各地办事处的活动。军乐队不仅直接支援大使馆的外交使命，还通过演奏提升国务院驻外工作人员的士气。军乐队支持国务院使命的演奏活动，有些高度曝光，高调迎送显要人物；有些悄然无声，默默在幕后进行。

社区关系。在部署期间，军乐队成员积极参加各种社区活动，以争取东道国的民心，同时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些活动有助于为双方民众和政府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未来交往打下值得回忆的积极的基础。我们对当地社区的主动接触，既有精深的专业支持，例如为当地艺术学校开办高级音乐班，也有简单的随意帮助，例如教一组男女小学生操作录音设备。

音乐教育。军乐队所做的一切都与教育相关。他们不仅参与东道国青年和成年人的音乐教育，也教育自己的部队了解乐队对打赢战争的贡献。军乐队所有成员都应该教育带兵者知道如何利用军乐队的独特能力，军乐队不仅能直接参与作战使命的实施，也可通过鼓舞士气的演奏，以音乐振作军心，间接促成使命的实现。

成员招募。在战区招募乐队成员听起来难以理解，像是特殊场合的特殊任务。其实，但凡在陆军乐队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军乐队领导都知道，部队中有许多未逢际遇的音乐人才。虽然军乐队通常不积极在战区招募新成

第 1 装甲师乐队的战略支援包括为当地社区演出。

员，但常有战士向乐队领导主动表达对军乐队培养计划的兴趣，他们有可能在未来加入军乐队。这也许是因为军乐队在战区比在美国本土驻地环境中与部队有更多地直接接触和交往。

器材运输

军乐团外出演出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安排器材运输。在军用飞机的任务表上，军乐团的常规演出运输总是排在非优先层次上，惟一的例外大概就是军号手参加纪念仪式了。如果安排喷气运输机输送，限制一般较少；如果安排乘直升机或地面运输工具输送，则可能严格限制携带的器材。

每有演奏任务，军乐队队员自然希望带齐自己的道具。但是如乘坐直升机或甚至地面运输工具时，随行负荷必须小而轻，上限一般不得超过 1500 磅（680 公斤）。抗雷防伏击（MRAP）车出现之前，军乐队只能乘坐悍马军车，但这种车辆根本容不下放置五重奏铜管乐器的大号道具箱，困难可想而知。现在，随着各种改进型 MRAP 车和高装甲轻中型战术车的问世，用车队运送军乐队所面对的挑战有所减轻。

器材保养

另一个挑战是在部署期间如何保养音乐器材。军乐团派驻战区，不可能配备专门的乐器保养师，只能是各人保养自己的乐器，除非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士官来完成这项任务。军乐队不允许其队员对乐器进行超出自身训练范围之外的重大维护，因为非专业人员维护或调校乐器，可能对乐器的精密结构造成永久性损伤。

乐器维修是一门需要多年修炼的高超手艺。其维修训练机会和范围及程度不等，比如军队的乐器修理部可提供几天的简单培训，若想获得多至一年的专业维修训练，只有去寥寥可数的美国几所高等院校深造。大部分民间乐器修理技师都是以传统方式学艺，即拜师学艺。

陆军领导人在支持军乐队的运作中，必须保证乐队有充足的设备和资源来实施预防性维修计划，包括在组织和设备改进计划中纳入乐器维修工具，提供干净的工作环境，配备铜管乐器所需的深洗涤槽、充足的维修用品，以及乐队队长确定的其他设备和用品。

军乐队各级领导必须保证乐器得到适当的保管和维修以防过早老化。许多乐器对演奏环境有专业要求，如果在不适合的环境中演奏，例如在战区作战环境中演奏，容易造成过量磨损，导致无法修复的损坏。军乐队领导班子必须按照整修计划来规划乐器的定期维修和更换，但陆军乐队在执行整修计划方面有很大困难，因为所有音乐器材和辅助道具都是现成商业制品。

器材整修

“陆军生发战斗力程序”作为整修计划的指导程序，应顾及军乐队的实际需要而酌情修改，因为乐器的整修和调校必须在军乐队接到部署任务后的最短时间内完成。军乐队队员必须尽可能缩短没有乐器随身的时间，这取决于若干理由。

乐器不离身的首要理由是军乐队队员必须保持练习，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否则，乐手们很快会感到手生，丢失这些不练则忘的个人和集体演奏技能。这和体能训练要求一样，如果某些肌肉组织或技能得不

到使用的时间越久，恢复所需的时间也就越长。队员的演奏技能都是按照规定具体设计和训练出来的，并由军乐队队长评定。个人技术必须恢复达标后，才可以开始集体演练。

军乐队队员在部署期间必须随身携带乐器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前线部队对军乐队的需求不会减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军乐队部署到前线之后，演出任务反而增多，各司令部和其他单位更频繁地要求军乐队前来演奏。

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派往战区的军乐队的音乐器材和辅助设备必须得到尽快的整修和更新。军乐队应做好前瞻，在上一轮部署期间就提前规划好乐器的整修时间，这样，到了下一轮部署时，就能保证所有音乐器材都如期到位，满足任务能力要求。

作战准则

有关如何运用陆军乐队的作战准则有时被人误解。陆军乐队队长是熟悉军乐队所有事务的专家，包括军乐队的运用。根据陆军作战准则，军乐队的运作是人力资源的一项核心职能，主管领导为军部或师部负责人事的 G-1 参谋长。无论在大本营驻地还是在前线部署环境中，接纳军乐队的司令部必须指定 G-1 参谋长或前线的 C-1 联合参谋长主管军乐队的运作。该 G-1/C-1 参谋长与乐队队长一道，在司令部参谋长的指导下，处理军乐队的所有事务，包括军乐队的运用。

前线部队切勿随意调用军乐队来执行他们未经训练的任务。只有在战术形势紧迫的情况下，陆军乐队才可参与常驻基地、护送车队、或边远前方哨所的共同防卫任务。军乐队队员拥有独特的个人和集体技能，不可被忽视、被乱用，或被浪费。陆军乐队能为作战部队带来其他单位无法具备的独特能力和贡献，应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部队领导人应积极主导军乐队的运作，支持军乐队队长和军乐队发挥作用。♣

约翰・S・弗雷泽（John S. Fraser），陆军 W-5 特级准尉，在华盛顿州路易斯—麦科德联合基地担任 I 军团乐队 / 第 56 陆军乐队队长。他从纽约州立大学获人文理科学士学位，并先后修完陆军乐队组 / 队长教程、陆军乐队士兵乐队队长教程、准尉乐队队长教程、准尉高级教程、准尉参谋教程、和准尉高级参谋教程。

不标榜自我

Avoiding the vertical pronoun

第 82 训练联队司令官达里尔·博克，空军准将（Brig. Gen. Darryl W. Burke, USAF）

自 2001 年 9/11 事件以来，美国空军只有三名军人获得最高荣誉空军十字勋章，扎卡利·瑞纳中士（Zachary Rhyner）是三人之一，也是三人中唯一活着获得这项荣誉的战士。

瑞纳中士作为战斗控制员嵌入地面特种作战部队，参加了阿富汗 2008 年 4 月的舍克谷（Shok Valley）之战。在这场战斗中，我方部队陷入敌人的 360 度伏击包围圈，他在激战中不顾个人安危，呼叫“危险靠近”达 50 多次，指引飞机实施空中打击，拯救了众多战友的生命，许多空射炸弹几乎就在他头顶炸开。他潜伏在悬崖的边缘，控制八架空军战斗机和四架陆军攻击直升机轮番发射压制火力，使负伤战友得以撤出火线。

瑞纳中士在战斗中的表现堪称英勇，他的事迹被包括空军参谋长施瓦茨上将在内的许多人传颂和引用，展示空军对联合作战的贡献。但是我却想列举他在战场之外的表现，来展示另一种军人素质在他身上的体现。

荣获空军十字勋章是巨大荣誉，自然引来众多访谈。瑞纳中士面对新闻媒体的表现，再次显示出自己的性格，与他在舍克谷之战的表现一脉相承。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在瑞纳中士的谈话中，那就是“我们”。

“我们一定得把伤员救出来……”

“我想那些跟我们对抗的叛乱分子们该收手了。”

“当时我想到的就是，敌人还在向我们开火，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必须把他们压住。”

甚至出名的新闻采访大腕葛兰·贝克也无法让瑞纳中士开口谈他自己。

贝克先生在一次福克斯新闻访谈节目中说：“你把这一切说得好像是平平淡淡的又一天……不过，这可不是小事，至今只有 192 人获得空军十字勋章。你对这事是怎么想的？毕竟，能获得这种殊荣的人只是凤毛麟角。”

让我们看看瑞纳中士是怎样回答的。

“我想，任何一位战斗控制员在这种形势下都会这样做。这应归功于培养我们成为战斗控制员所受到的训练和所熟悉的程序。”

名誉的光环照耀着瑞纳中士，他有资格当仁不让，有充分机会显示“我如何如何”。瑞纳中士却选择把所有荣誉归功于“我们”。

他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课。

“强调我如何如何”在当前时代大行其道，但是这种自我标榜的作风在我们空军没有立足之地。我们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就受到严格教育，知道个人志向和愿望必须服从军队、空军和国家的需要。我们决不可因升职和晋阶而忘乎所以，也不可被奖励和荣誉冲昏头脑。

我们知道,“我们”比“我”更强大。“我”能办成的事情微不足道，而“我们”能成就的事业无可限量。

瑞纳中士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到位。我们不仅可以从他在战场的英勇和无私中学到很多，还可以从他在摄影机前的谦恭和不标榜自我中学到更多。♣

舍克谷之战

http://www.armytimes.com/news/2008/12/army_battlenarrative_121508w/

2008 年 4 月 6 日，美军第三特种作战部队第 3336 特遣队连同阿富汗第 201 突击营深入舍克谷（Shok Valley），开展了一场极其险恶和冒险的空降突袭战，目的是捣毁伊斯兰 Gulbuddin 恐怖组织的这个著名老巢，抓捕或歼灭恐怖组织的重要首脑。

这天凌晨，支努干 CH-47 和武装直升机 UH-60 从贾拉拉巴德空军基地起飞，载运突击队员飞临这片海拔 10000 多英尺的山区。空降场选在山谷中，敌人则藏于山顶各部位，从几百米的上方居高临下，严阵以待。

山谷中乱石嶙峋，直升机无法降落，战士们背负着近 30 公斤重的装备，从飞机上凌空跳入溪水横流气温炎热的乱石丛中，然后散开，向延绵近 2 公里的山头攀爬而上，扑向各自的目标。

200 多名敌人已有准备，迅速进入伏击位置，用狙击步枪、肩射火箭弹、机枪和 AK-47 等武器，把我军和阿富汗突击队员困陷在山谷的干河床上，交火不久，我方二人中弹身亡，多名战士负伤。

收到呼叫的 F-15 战斗机和阿帕奇直升机立刻逼近，在十分危险的近距离内展开猛烈轰炸和扫射，保护我们的队员拚死抢救伤员。这场战斗持续了近 7 个小时，伤员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们的战士在谷底绝地反击，争夺火力封锁位置。

多名队员严重负伤，被困在 60 英尺高的悬崖边，奄奄一息，而敌人的狙击子弹和机枪火力毫不留情地扫泻而来。特种部队的战士冒着弹雨，攀爬而上，拚死救援自己的战友。我军狙击手也将子弹倾泻向敌人，并引导飞机轰炸敌人的阵地。与此同时，我军从阿富汗东部集结了更多部队，迅速用直升机运到战区，实施增援。

面对敌人猛烈而精准的火力打击，我们的战士不离不弃死去的和负伤的战友，坚守阵地，拒绝认输。靠意志，靠机智，靠英勇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决心，伤痕累累的战士们顽强作战，誓死扭转战场局面。“黑鹰”医护救援机组人员两次闯入枪林弹雨，救出负伤战友。空军的地面战斗控制员不顾个人安危，引导空军支援飞机准确轰炸敌人坚守的民房和阵地。

这场战斗以美军和阿军联手捣毁敌人老巢并全身撤出而告结束，我方死亡 2 人，负伤 15 人，消灭敌人 150-200 人。特种部队一名获银星勋章的战士说：“这场战斗让叛乱分子们明确知道，天下没有我们不敢深入的地方，天下没有你们的安身之处，我们不会放过你们。”

美国的阿富汗战略和此战略对美国空军的影响

The US Strategy in Afghanista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Air Force

戴尔·L·海登博士，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Dale Hayden, PhD, USAF, Retired）

经过美国参议院 2010 年 7 月的听证会和任命确认后，彼得雷乌斯上将受命在阿富汗推行一项“求胜”战略。他的这项努力，说得轻一些，是面临严重挑战。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正在退潮。CNN 电视台在 2006 年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公众当时对战争的支持比例为 50%，反对比例为 48%。CNN 电视台最近的民意测验结果是，37% 支持，62% 反对。[1] 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曾经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民主党参选人都被选民视为与奥巴马总统的阿富汗战略同路（虽然其中也有同党派因素）。立志夺回众议院多数并觊觎参议院多数的共和党人，则不敢贸然抨击总统对这个地区的政策，唯恐被视为“不坚定”支持军队。在这种背景下，求胜的日期表中时间不多。

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利益从来就有限，主要在于消灭基地组织等恐怖集团的大本营，从而防止美国公民和国家利益遭受恐怖袭击。彼得雷乌斯将军最近宣称：“我们开到这里的目的，是不让阿富汗再次成为跨国极端组织的庇护所，不允许类似基地组织从坎大哈地区策划 9/11 恐怖袭击的事件重演。”[2] 美国希望阿富汗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民主型政府，有能力阻止这个国家变成未来恐怖分子的家园。最起码，只要阿富汗不再成为其邻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威胁，也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就可以收手。但是，美国又不可造成遗弃卡尔扎伊政府的印象，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希望再看到电视新闻频道日夜滚动播放类似 1975 年西贡失陷的镜头。

但不管怎么说，阿富汗的国家主权安全是阿富汗政府及其人民的责任，彼得雷乌斯将军已经表明了这些期待。他通过最近的一些陈述试图重新调整辩论的方向，比如他说：“我们面对的，不是那种铁板一块的塔利班敌人，事实上，这个敌人更像是一个辛迪加联合体，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部队、阿富汗国民军和阿富汗民众所面对的敌人。”[3] 言下之意，美国可以同“辛迪加”谈判，甚至可以将其分拆，或者从中找到一些和解因素。和敌人谈判并可能最终让敌人加入阿富汗政府是一种有重大不同内涵的思路，但这种思路与卡尔扎伊政府已经公开讨论的方式 — 交往和和解 — 并无重大区别。无论我们采取何种战略，结果都必定是美军地面部队撤出阿富汗。地面部队撤出这个地区，也就是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后，我们的政治和军事选择范围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荣誉主席及资深理事研究员雷斯利·盖尔博（Leslie Gelb）提出建议：美国“需要与阿富汗的邻国共同建立一种围堵政策，阻止塔利班蔓延到这些邻国，包括俄国、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当然还有伊朗。这些国家有着紧密的共同利益，这就是防止塔利班影响扩散和遏制毒品交易。”[4] 顺便温习一下地理知识，阿富汗是内陆国，这种地理特征迫使美国必须依赖天空、太空和网空

能力才能实施这一目标。鉴于这些区域都在美国空军认可的作战领域以内，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利益将主要依靠美国空军来保卫。

在保卫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空军将面对越来越沉重的基地问题，我们将继续需要在阿富汗保留安全的空军基地，但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都是安全的威胁。巴基斯坦、伊拉克、甚至北约盟国土耳其等国的政府，都不会允许美国从其领土起飞发动对该地区目标的空中打击，即使从卡塔尔空军基地起飞后越境实施打击也问题重重，因为政府的这种决定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空军为在这个地区开展行动，必须投入充分的兵力防卫在阿富汗的空军基地。这意味着未来将由美国空军来支持阿富汗军队。自从 1996 年美军在沙特的霍巴塔兵营遭受汽车炸弹袭击之后，美国空军加强了自主防卫空军基地的责任。基地问题的压力，也将导致我们更多地使用遥驾飞机（RPA），RPA 只需简易短跑道，并且不易引起基地外围的注意。但是，从阿富汗境内开展空中作战行动终究会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而推动技术创新，促使 RPA 进一步加大航程。即使到了未来的这个阶段，仍难找到易于实施的解决方案，比如，印度或伊朗大概不会同意（从航母起飞的）飞机飞越它们的领空去打击敌人。

当“持久自由行动”开始时，基地组织主要盘踞在阿富汗；而今天，基地组织已将活动范围转移到巴基斯坦，在其崇山峻岭中构筑出良好的营地。巴基斯坦是同盟伙伴，又是拥核国。能把基地组织从巴基斯坦清除出去固然是好事，但能下这个决心和做这个决定的只能是巴基斯坦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只有在基地组织对巴基斯坦政府构成直接威胁时，这个政府才会采取剿除行动。美国不可能公开向这个地区派遣地面部队，以免遭致国际谴责，或者因侵入一个同盟伙伴国主权领土而引起反弹。在巴基斯坦山区作战不是美军的强项，将耗费人力和资金，而美国公众对此已经厌烦。何况，美国出于长期利益考虑，需要巴基斯坦政府保持稳定，而美国地面部队对巴基斯坦主权的任何侵犯都可能引发伊斯兰堡政权的血腥更迭。还有，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虽然巴基斯坦以核武器直接对抗美军部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可能使用雇佣方，如恐怖组织或者北朝鲜等国，来代替他们和美国对抗。这样，在我们从阿富汗撤出地面部队之后，应该对这个地区采用哪种可行的长期战略？而此战略对美国空军又意味着什么？

在我军大部队撤出这个地区以后，美国对基地组织必须转而采取类似于盖尔博先生对阿富汗提出的围堵战略。围堵，辅之以监视侦察，将需要美国空军投入资源，尽管它体现为国家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将同时需要美国情报部门和特种部队的参与。运用太空、地面和天空侦察能力，我们的作战指挥官就能把叛乱分子的威胁围堵在可控范围以内，同时密切注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动向。围堵战略或许带着冷战的痕迹，但凭借这个政策我们在过去 50 年中成功地对付了一个极其强劲的对手。曾有许多人担忧侵略和占领伊拉克的后果，认为围堵伊拉克才是可行的政策。美国 Notre Dame 大学 Joan B. Kroc 国际和平研究所政策研究部主任乔治·洛伯兹（George Lopezis）和该研究所研究员及第四届自由论坛主席大卫·科莱特（David Cortright）认为：通过制裁来围堵伊拉克已经在摧毁伊拉克的战争机器上发挥了效果，军事入侵原无必要。[5] 不管怎么说，对阿富

汗和巴基斯坦而言，围堵可能是我们的唯一政策选择。

不久，我们将站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袭 10 周年的时间点上回望历史。其实，如果以 1990 年 12 月的“沙漠风暴行动”为起点到 2001 年 9/11 事件发生时为止，美国空军开展飞行作战也已经有了 10 多年。若从现在再前瞻 10 年，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美国空军将再一次承载国家的作战重任。但是到 2021 年，美国空军的资产将不及现在，F-22 和 F-35 不可能一对一替换掉 F-16 和 F-15，B-1 可能从库存中完全除名，B-2 大概也是如此，我们将只剩下一些 B-52，可能再加上一款新型远程打击机种，例如一种有人驾驶的轰炸机，来承载这些负担。我们的空军将疲惫不堪，除非加速借助新技术来应对二十一世纪中期出现的各种挑战。我们面对的挑战是，要么沦落为“危机军种”，要么借助历史的变革机遇奋起。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的决策，就很可能成为驱动美国空军前进的推力，空军由此将最终找到合理的战力配比和正确的战略，确保在后冷战时代续写辉煌。♣

注释:

1. CNN/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 Poll [CNN：民意调查公司调查数据], http://www.pollingreport.com/afghan.htm, 19 Aug 2006.
2. Gen. David Petraeus Cites Progress In Afghanistan, Hedges On July 2011 Troop Withdrawal [彼得雷乌斯将军介绍阿富汗进展，回避 2011 年 7 月撤军问题],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0/08/15/david-petraeus-insists-th_n_682537.html, 16 Aug 2010.
3. Osama probably hiding in mountainous regions of Pak: Petraeus [彼得雷乌斯将军认为宾拉登可能藏匿在巴基斯坦大山中], http://www.thehindu.com/news/international/article573850.ece, 16 Aug 2010.
4. Leslie H. Gelb, The Way Out of Afghanistan [阿富汗问题的出路],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22740/way_out_of_afghanistan.html, 1 Aug 2010.
5. George A. Lopez, Containing Iraq: Sanctions Worked [围堵伊拉克：制裁有效],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59924/george-a-lopez-and-david-cortright/containing-iraq-sanctions-worked, Jul/Aug 2008.

戴尔·L·海登博士，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Dale Hayden, PhD, USAF, Retired），现在阿拉巴马州 Maxwell 空军基地空军研究所任研究部主任。海登博士具有美国外交政策、太空与导弹作战等方面的广博背景。

海登博士完满结束了他在美国空军绩效丰硕的服务生涯，于 2008 年 9 月 1 日退役。在服役早期曾担任空军部长参谋组成员及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他的太空与导弹作战经验包括在“沙漠风暴”和“供给安慰”作战行动中提供战区太空支援和导弹预警，并指挥导弹作战。海登博士还担任过哈佛大学特约研究员、空中力量研究所所长，及空军指挥参谋学院院长。

澄清曲解和误解 —
效基作战理论没有错，错在用之不当

Maligned and misunderstood — It's not the EBO concept that's wrong, but how it's been applied

杰弗里·B·赫基，美国空军退役中校（Lt Col Jeffrey B. Hukill, USAF, Retired）

编按：效基作战（EBO）理论发轫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成熟于此后数场战争之间，并写入各军种的作战准则及联合作战准则。此理论风行多年，被美国各军种看重。然而，时任联合部队司令部指挥官的詹姆斯·马蒂斯上将（海军陆战队背景，现任中央司令部司令）在 2008 年 8 月发布备忘录指示："立刻生效：联合部队司令部在训练、作战准则编写和联合专业军事教育中不再使用、支持或宣传涉及 EBO 的术语……我们必须认识到，'基于效果'一词存在根本的缺陷，引发太多的解释，违反战争的本质，以致混乱加剧，[战局]可预测性被夸大，远远超出这种方法所能达成的效果。"于是辩论顿起。此后，马蒂斯将军进一步在《联合部队季刊》2008 年第 4 期发表文章"USJFCOM Commander's Guidance for Effects-based Operations"（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关于效基作战的指导）。赫基中校这篇挑战马蒂斯将军观点的文章最初发表在美国《武装力量杂志》2009 年 3 月版。读者在阅读时，最好能对照阅读马蒂斯将军的原文并顾及其发表背景。

效基作战（EBO）方法出了什么问题？联合部队司令部（JFCOM）司令詹姆斯·马蒂斯（Gen James Mattis）上将在[2008 年]8 月 14 日向 JFCOM 各部发函，表达对 EBO 的看法，将之描述为一个有缺陷、不现实、繁琐而且机械的程序。这一观点令 EBO 的许多支持者震惊，因为指示函中描述的概念与 EBO 的原始理念大相径庭。从本源看，EBO 的原则并不抑制战场主动性，也不要求像马蒂斯所说的那种不现实的完美情报。EBO 概念似乎是在应用途中迷失了方向，马蒂斯所描述的 EBO 的当前应用与这个概念的初衷脱了钩。

EBO = 效基作战
JFCOM = 联合部队司令部
ONA = 作战净评估
SoSA = 系统集成分析法

本文的目的不是反驳马蒂斯的观点，而是探究马蒂斯所述的 EBO 目前状况与 EBO 概念之间的差别。为说明 EBO 的原始概念，本文从各军种和联合作战准则中摘取相关论述。作战准则是最佳来源，因为它精确代表了效基作战理论中许多本源思想，而且具有权威性。最后，本文提出复原 EBO 思想的途径。

找出概念分歧

这封关于 EBO 的八月指示函引起了人们对 EBO 方法的当前应用的种种担忧。这些担忧主要指向一些提法，例如 EBO 理论假定的可预测程度无法达到；国家领导、社会民众和政治制度等复杂系统的反应不可能正确预期；EBO 理论轻视了战争中人的因素，鼓励那种压制主动性和提倡微观管理的领导风格。这三项断论概括了足以负面影响规划和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rmed Force Journal*.

执行任何类型的联合作战行动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众多 EBO 拥护者和实践者来说，这些断论与效基作战方法的本意正好对立。

问题出在对 EBO 本源概念的改动：要么这些概念被转换成了可能有错的程序而导致这些结论；要么是对本源概念的普遍误解导致了对概念的误用。然而，应用不善不一定就是概念不好，但无论为何，结果都一样。于是在许多人眼里，EBO 概念在认知上或者实际应用上过于规范和过于精雕细琢。

EBO 的本源概念从未要求彻底了解敌人；从未提出无论是在封闭的还是复杂的系统内都要完全预测敌人的反应；从未轻视战争中人的因素；从未界定指挥官领导风格；也从未倡导可导致微观管理或无法向下级明确而及时传达命令的思想。领导问题无非就是 — 领导问题。微观管理和命令不明的问题肯定在 EBO 之前就已存在。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必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对 EBO 的当前理解复位到这个作战概念的原始意图。

回到作战准则

那么，EBO 基本概念及其本源思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只有理解了 EBO 概念，才能发现这些概念和 JFCOM 司令在指示函中谈到的应用问题之间的分歧；而一旦明白了这种分歧，就有可能把联合部队对 EBO 的看法作必要的纠正。围绕 EBO 这一主题已经出现大量文章，故而导致了多种定义和众多解释。与其再增添一种个人见解，不如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到指导联合部队、各军种部队及多国部队在各类军事行动中开展作战的实际原则文件上，即作战准则上。

作战准则应该指导部队正确理解最佳实践和作战原则，所以是最权威的原始文件。本文讨论 EBO 基础概念，当以各军种和联合作战准则作为最好的依据。准则文件萃取了 EBO 的许多原始意图，并形成对此概念的统一语言和统一理解。本文不概括作战准则的要义，而是直接从各军种作战准则和联合作战准则中摘录原文来说明效基作战概念。为方便阅读，本文把从作战准则中摘录的片断安排到相关的 EBO 概念之下，这里决无鼓吹某军种作战准则比另一军种更优越的意思，而是希望让读者研读到不加过滤的效基作战概念。作战准则也许不是人人喜欢的读物，但还是敬请读者花一点时间阅读本文的摘录。要围绕 EBO 概念问题展开辩论，最佳途径是了解作战准则原文如何说。

EBO 基本概念

1. 作战行动从一开局就要胸有终局，并把所有行动与追求的终局挂钩。

> “EBO 应把重点放在目的和终局上。所有行动在设计上都应为着产生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效果，减少可能妨碍目的实现的非预期效果。”— 空军作战准则 AFDD 2《作战行动和组织》

> “效基作战关注的是创造效果，而不是平台、武器或方法。效基作战方法的第一步是列出期望的结果 — 终局、目的和附属的预期结果 — 然后再确定达到这些目的所需的资源，而不是首先确定特定能力或资源，然后再决定靠这些能力和资源能实现哪些成果。”— AFDD 2

> “围绕成功所需的条件及如何建立这些条件来思考，有助于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深化理解军事战略及战役目标的意义，了解支持这些目标的预期和非预期效果，

确定能产生这些效果的最佳行动顺序，并制定更精确的评估措施。效基作战方法仍保持在作战艺术和设计的范畴内，它通过描述为达成军事目的和实现预期终局所应建立的各项条件，帮助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明确任务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联合部队指挥官（JFC）和参谋班子在作战规划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制定和调整取得成功（预期效果）所需的条件。要一直朝着实现这些效果的方向观察作战进展，将之作为评估程序的一部分，观察过程从作战规划阶段中开始，一直贯穿整个执行过程。”—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联合作战行动》

2. 整合所有力量工具，以实现预期终局。

“一系列努力通常应集中在如何把军事行动的效果与国家的其他力量工具整合，以支持更大范围的努力。”— 野战手册 FM 3-0《作战行动》

“EBO 切入战争的所有领域、规则和层面。跨领域思维牵涉到将所有其他力量工具 — 外交、信息、经济 — 与军事工具的整合，目的是采取全面动员方式实现预期终局。”— AFDD 2

3. 制定战略时考虑所有军事能力。

“效基作战方法是综合考虑作战行动的方法。它从全局角度运用作战能力，不使作战能力直接栓在任何具体战争战略或作战行动类型上。”— AFDD 2

“效基作战行动关注的是行为，而不仅仅是物理变化。传统战法的首要目的是摧毁敌军，通常靠打消耗战，即将敌人兵力损耗到无法坚持为止；或者将敌人彻底歼灭，即将其彻底推翻或征服。这些方式能达到目的，仍然是战略中有价值的成分，但效基作战方法强调的是还有其它替代选择；战争的终极目的不是推翻敌人政权，而是迫使他们按我们的意愿行事。”— AFDD 2

4. 了解你想影响其行为的系统，从而创造成功的条件。

“联合部队指挥官为最初的系统分析提供指导，即说明期望达到的军事战略与战役目的，以及期望或不期望的效果，作为其作战规划指导和意图的一部分。这种指导帮助参谋班子把其努力集中于作战环境中的具体系统，并为联合部队中各军种部队确定潜在任务。”— JP 3-0

“采用系统思考方式有助于了解叛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条作战线的行动之间的关系。这一元素立足于系统科学观，从这个观察角度可以了解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连通性、复杂性和整体性。”— FM 3-24/ 海军陆战队作战准则 3-33.5《平叛作战》

5. 尽可能确定重心、决定点和终战标准。

“制订作战计划时运用效果，能帮助指挥官及参谋确定达到目标必须完成的任务，通过明确重心、作战线、决定点和终战标准之间的关系，更有效地使用战役设计中的其它元素。”— JP 5-0《联合作战规划》

6. 要懂得战争是复杂的适变系统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由于敌人的创造性，以及冲突的迷雾与摩擦等因素，效果的近因也许难以确定。

“指挥官和策划人员必须认识到：捉摸不定的第三方行动、友军行动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下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冲突的迷雾与摩擦等各种因素，都会推动构成不确定的作战环境。”— JP 5-0

“在互动的复杂形势中，效果的近因可能难以预测。”— JP 5-0

“战斗行动中期望的战术级效果通常和军事系统相关，但战役级和战略级效果常常和作战环境中的其他系统相关，在这些系统中，即使直接效果也可能更难产生、预测或测量，尤其当它们与道德和认知问题（例如宗教和“对手的心思”）相关时；这些系统中的间接效果则常常难以预料。”— JP 5-0

“如果拥有充分的情报来可靠地预测直接效果，也就能间接实现指挥官的某些目的。有些军事目的能通过影响作战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其它系统而达到。但是，如果我们对作战环境的了解中有缺口，就常常可能出现意外的或不希望得到的间接效果。”— JP 5-0

“虽然预测性感知能帮助预测许多结果，并减轻意外的负面效果的影响，但在这个充满了复杂系统的世界上，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完美的科学。”— AFDD 2

7. 运用使命型命令来完成使命或任务。

“无论效果在制定联合作战规划和评估中起什么作用，联合部队指挥官都向军种和职能部队司令部下达五段式野战命令。这些命令向下级单位委派任务，详细说明要达到的效果。对陆军部队来说，这一点没有改变。使命型指挥和使命型命令都关注要达到什么效果，但不是指示如何达到这些效果。尽管有不同的术语和程序，在联合作战规划中运用效果只是为了强调使命型指挥的实质：信任、主动性和灵活性。”—FM 3-0

“即使是执行相对较小的计划行动，也会在整个部队产生二级和三级效果；这些效果影响到作战行动的整体协同。尽管如此，在使命型指挥下，指挥官承受失去某些协同的风险，作为夺取、保持和利用主动权的代价。”— FM 3-0

“它也根据使命型命令来分配使命或任务，同时让合适的最下级来决定有关武器和平台的最佳搭配问题。”— AFDD 2

8. 把行动的计划、执行和评估一体化。

“在作战规划期间对效果的使用反映在联合作战规划程序（JOPP）的每一步中，作为阐明目的与任务之间关系的途径，也帮助联合部队指挥官和参谋确定达到目的的条件。指挥官和参谋班子可以运用指挥官的意图、对作战环境的系统观察、对预期和非预期效果的了解等，来协调和促进与多国和其他机构伙伴的统一行动。”— JP 5-0

“效基作战方法意在把计划、执行和评估一体化。”— AFDD 2

读了作战准则的这些论述之后，就能清楚地看到，EBO 概念从没有要求产生马蒂斯指示函中描述的那些结果。

那么，效基作战方法的价值何在？换言之，它有什么新意？效基作战方法是新加到联合作战规划、执行和评估这个拼图游戏中的一块图片。简言之，这个概念的目的是鼓励指挥官和规划人员付诸行动之前通盘考虑问题，用系统方式把终局和行动挂钩，统筹安排全部可用的能力来达成目的以支持预期的终局，知道所选择的行动是否以及如何帮助达到目的。

对效果的讨论就象是用于观察和了解目的的另一个透镜，通过此透镜，指挥官和参谋班子考虑适合每种情况的行动。它有助于打开思路，综合利用现有的各种动能打击和非动能打击资源。效基作战方法不是想改变

或改写作战基本概念，而是鼓励指挥官和参谋班子扩大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认识，并利用它们来达到理想的终局。读过以上的作战准则摘录之后，这些思想应该清晰呈现出来。目前的挑战是要消除联合部队对效基作战方法的误解和误用。

弥合缺口

有多种途径可弥合作战准则中的 EBO 本源概念与马蒂斯指示函中描述的 EBO 目前应用之间的缺口。首先，各军种在讨论效基作战方法时，必须以本军种和联合作战准则为依据。过去 15 年里编写出的有关效基作战方法的大量文件对形成这个思想具有关键作用，但我们仍必须以作战准则来引导对效基作战概念的应用。

EBO 概念虽在过去 15 年中发展起来，但只在近年编写的作战准则中获得完备的诠释。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开始，许多人发现效基概念的价值，遂发表个人对这些思想的见解，因此导致了对 EBO 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多种定义和理解。为来自不同军种和联合部队的听众讲授效基作战概念向来不易，因为没有统一的术语定义，更遑论这个概念的细节。由于没有共识，各家组织对如何实施这些概念就形成了各自的见解，不同的做法导致许多混乱和误解，理解的差异削弱了 EBO 的影响和效果，是为不幸。

终于，2004 年的空军作战准则和 2006 年的联合作战准则对效基作战概念作了较明确的解释。尽管任何作战准则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这些文件应是指导这场辩论的权威依据。作战准则中的效基作战概念与联合规划程序还需要继续发展，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对 EBO 的概念性误解和误传已在不同军种的思维中扎根。

关于 EBO 的误传主要有两个，一是说 EBO 要求彻底了解敌人，二是说 EBO 要求准确预测结果。这些看法实际上在 JFCOM 开始涉足 EBO 时就已成形。JFCOM 把并不属于 EBO 原始模型组成部分的某些概念捆绑到效基作战方法中，捆绑进去的这些概念中首先 — 也最显著的 — 是“作战净评估”（ONA），其特征在于承诺给出近乎完美的“预测性”作战态势感知。捆绑进去的另一个概念来自系统集成分析（System-of-systems，缩写为 SoSA）法，即全世界在许多“软科学”应用（比如经济市场分析）中使用的复杂适变系统理论的简化版。SoSA 也承诺给出“预测性”结果，同时企图把活性的、适变的（以及不可预测的）系统之间的冲突简化为容易理解的元素和公式。SoSA 没有能够把它企图模仿的各系统的结构复杂性和互动复杂性区别开来。

空军强烈反对在 EBO 里掺合 ONA 或 SoSA 的成份，但这种反对主要发生在作战准则编写和学术界这些僻静领域。不过空军在过去四年中反对 JFCOM“售出”的东西的努力仍取得一些成效，这些军种在已发布的有关 EBO 的三份预作战准则文件中增添了一些免责陈述，这三份文件是《效基联合作战方式指挥官手册》及其增补文件《补编 I》（理论）和《补编 II》（作战净评估）。这些免责陈述缓和了 JFCOM 的 EBO 倡导者所承诺的较极端的要求，但是没有形成联合部队的共识。JFCOM 的书面资料也没有超出预作战准则手册和工作文件的论述。引人注目的是，在一系列手册和小册子里，JFCOM 继续把 ONA 和 SoSA 捆绑到 EBO 中，把自己的 EBO 版本“推销”给战场上的各作战指挥部。对敌人的系统了解和精确评估是效基作战方法的重要

概念。在引入 ONA 和 SoSA 概念时，如能排除彻底了解敌人和确保准确预测结果这两项要求,则有助于推动效基作战理论继续完善。

其次，一旦有关效基作战方法的辩论回到以作战准则为依据的思维轨道上，下一步就是把这些思想纳入普通教育和训练框架。目标应该是各军种之内和各军种之间的普通训练和教育。无论你是在修陆军、海军或空军的训练课程，或是就读于某军事学院，你获得的有关效基作战方法的资料应该大体相同。一个不允许课程之间有差异的苛刻框架既不现实也不可取。然而，差异应该只发生在适合军种或使命特殊情况的地方，而不能缺少作战准则的指导。

第三，本位主义式的偏狭争论会造成不和，应予制止。支持或反对效基作战方法的大量争论，充斥着各军种的偏狭议程，它们有损联合行动的效力，加大作战使命的失败风险。我们可以辩论如何适当组合兵力才能达到目的，但若以效基作战方法为借口而过于依赖某种具体兵力结构则不合适。读了前面的作战准则摘录之后，这一点应该不言自明。联合作战准则或军种作战准则凡涉及效基作战方法的地方，从未强调过空中部队优先于地面机动部队。正如作战准则所言，效基作战方法是中性战略。

所有军种都需要搁置偏狭的争论。最好的方式是认真消化所有军种的主要作战概念，然后纳入军种和联合作战准则。

最后一点，如果 JFCOM 能就这封指示函澄清自己的意图，会有所助益。这封信在所有军种激起了大量讨论，反对者和拥护者都能从信中找到抨击对方的弹药。效基作战方法的反对者正利用此信来证明效基作战是一个危险的概念，故而应该摈弃。拥护者则认为该指示函不仅误导，而且偏狭，也有悖于联合军事行动的观点。还有人则视它为机遇，借此可以彻底消除多年来对这个概念形成的误解，从而使效基作战思想能继续进化，并有效地纳入整个联合作战过程。该指示函的不同章节支持着每一种不同的立场，因此引起混乱。此信的目的，究竟是鼓励各军种和联合部队从整个作战过程中剔除所有效基作战思路呢，还是只想从中除去导致误解和误传 EBO 的错误概念？澄清这个问题将有助于各军种和联合部队继续发展所有这些概念。

效基作战概念值得军队学术界、联合及联盟作战实验者、作战方法制作者，以及前线将士等进一步认真思考。联合部队不应该因为效基作战概念的初衷在作战过程中被扭曲或被误用而放弃这个作战概念。希望马蒂斯将军在指示函中要求 JFCOM 不再使用、支持或宣传涉及 EBO、ONA 和 SoSA 的术语和概念时，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只要 JFCOM 不再支持被歪曲的 EBO 概念，就有助于终止对 EBO 原始意图的误解和误识,并改进其应用。如果这位 JFCOM 司令官的指示函有利于复原 EBO 的真实观念，这将是效基作战思想不断进化过程中的重大一步。♣

杰弗里·赫基，美国空军退役中校（Lt Col Jeffrey B. Hukill, USAF, Ret.），Norwich 大学理学士，Gonzaga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Auburn 大学理科硕士，现任位于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研究所研究部项目主任。他的研究重点包括空地作战一体化、空军准则与效基作战。此前他曾任李梅空军准则编写教育中心高级军事防务分析员，从事有关空天力量若干问题的教学与写作。在其 22 年的空军生涯中，他担任过作战、指挥及教育职务，包括战略训练场地安装指挥官、空军指挥参谋学院战争理论与空天力量研究系主任和远程教育系主任，以及 B-52G 电子作战官 。著述见于《武装力量杂志》、《联合部队季刊》、《防务分析》及空军大学出版社多种刊物。

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理论研究

Constructs of Information System-Based Network Warfare

李大光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国防大学教授（Dr. Li Daguang, Senior Colonel & Professor, PL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恩格斯曾经提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1] 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军事领域变革，网络技术作为信息技术的重要内容，正在推进战争向信息化战争形态转变。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作为信息化战争中重要的作战样式，对赢得信息化战争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概念阐释

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预言："电脑网络的建立与普及将彻底地改变人类生存及生活的模式，而控制与掌握网络的人就是主宰。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2] 在信息时代，计算机信息网络向全球的各个角落辐射，其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在成为当今和未来信息社会的联系纽带。重要的信息网络系统成为维系国家和军队的命脉和战略资源，一旦这些计算机网络系统被攻陷，整个国家的安全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此在信息化战争中，谁在网络空间的角逐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占据二十一世纪战争的战略主动权。

所谓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是指高度依赖于信息、信息系统和信息化武器装备，在信息网络空间展开的、对敌方的战争体系或作战体系实施网络摧毁和破坏、同时保护己方体系的攻防作战行动。它是一种以信息主导、体系对抗、网电一体为主要特征的全新作战样式。网络作战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计算机网络信息处理层的破坏和保护，来降低敌方网络信息系统的使用效能，保护己方网络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进而夺取和保持网络空间的控制权。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瞬时性和异地性等特征，赋予网络作战隐蔽无形、攻防兼备、全向渗透的优势；而网络作战简单易施、隐蔽性强等特点又使得它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非常高的军事效益。因此，网络作战所达成的作战效果是传统军事手段难以比拟的。

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的作战机理，是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对其他各相关系统进行有效控制，将计算机网络的信息优势转化为时空优势、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从而产生和释放更大的作战效能。其内在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计算机信息网络 — 以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主导；力量 — 网络作战部队、网络作战武器装备；战场 — 计算机网络空间；方式 — 网络化、一体化和精确化作战；目的 — 营造夺取战争胜利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的综合优势。这种基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全新的战争画卷：作战空间和领域从传统的陆、海、空，向电磁领域向网络空间延伸，使未来战场空间呈现出由区域向全域、由地面向空天、由有形战场向无形战场全方位和全维域扩展的趋势。全空间和领域之间形成了网络化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体系关系，任何局部行动或对抗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触发信息主导下的整体对抗。如今，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网络系统已经成为现代化军队的神经中枢，传感器网、指挥控制网、武器平台网等网络，将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中心和重要依托。一旦计算机网络遭到攻击并被摧毁，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就会大幅度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国家军事机器就会处于瘫痪状态，国家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正因为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这种重要性，决定了计算机网络系统必将成为信息战争双方攻击的重点目标，全新的以计算机网络为主要对象的计算机网络攻防战也随之出现并不断发展。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拥有计算机网络优势的发达国家军队，以电脑病毒及黑客对其作战对手的网络及通讯系统实施攻击，完全主宰了网络空间，取得信息化战场优势，在极短的时间内瘫痪了对手的防空指挥系统，有力地支援其他战场作战。

随着社会形态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军事对抗的重心与焦点正由有形的地理空间向无形的计算机网络空间拓展，网络成为继陆、海、空、天、电之后的“第六维战场”。在这神秘的“第六维战场”里，虽然看不到刀光剑影的拼杀，听不见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只有微弱的键盘击打声，但它却将各种作战信息即刻传输到散布于战场空间的任何作战单元，发挥出足以使敌方蒙受灭顶之灾的能量。这一点在科索沃战争中已初现端倪，巴尔干半岛的一些计算机专家有的单枪匹马，有的则联合俄罗斯等国的“黑客”，通过互联网对北约的军用计算机网络发动了进攻，对北约尤其是美国的军用计算机网络系统构成严重威胁，美国白宫的网站和“尼米兹”航母的指挥控制系统曾一度无法正常运行，迫使整个北约组织紧急采取了三项措施，局面才有所改变。[3]

二、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作为一种作战样式，是敌对双方利用高技术手段来控制、割裂和破坏对方计算机网络系统和部件，达到摧毁和瘫痪对方战争机器的一种全新的信息作战样式，因此必须要有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 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指导思想

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不同于传统的火力杀伤作战，应对网络作战威胁必须首先从战略层面上树立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思想。与之相应，实施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必须要树立“网络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思想。这种“网络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思想的基本内涵就是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是进攻的，强调在网络总体防御的态势下，寓攻于防，攻防结合，以积极的攻势作战达成防御目的，使网络作战在开局上是防御，但在具体的网络作战过程中又不局限于防御。坚持“网络积极防御”作战指导思想主要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是树立“网络积极防御”作战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在网络作战中，“进攻未必就是最好的防御”，积极防御的网络作战指导思想，体现着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体现着坚持自卫与后发制人的辩证统一，体现着打赢网络战争和遏制网络战争的辩证统一，当然也体现着我们网络技术水平较低与未来和平发展的辩证统一。

第二，在网络防御技术和能力上的差距与不足，是我们树立“网络积极防御”作战指导思想的现实要求。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但中国的信息网络技术还显得非常单薄，计算机及网络的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最根本的平台核心,中国自己却无法把握，如 IT 技术至今仍处于“组装式生存状态”，操作系统的安全性、CPU 的安全性和加密技术的安全性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而这些基础性的安全问题，我们均处于被动受控的情况下。由于国外电脑硬件、软件中可能隐藏着“特洛伊木马”，一旦发生重大情况，那些隐藏在电脑芯片和操作软件中的“特洛伊木马”就有可能在某种秘密指令下激活，或使民用电脑全部无法启动，或使我国政府、军事电脑网络、电信系统瘫痪，造成灾难性的经济、社会和军事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网络积极防御”作战指导思想，防患于未然，做好防御准备，防止网络系统遭到瘫痪性的打击。

第三，网络攻击特点决定我们应该树立“网络积极防御”作战指导思想。当前网络战中普遍存在的“重攻轻防”思想，可能也主要是基于网络进攻易于防御的特点而产生的，但其偏颇之处也在于过分夸大了主动网络攻击的可操作性。传统作战中的经典论断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然而此论断可能不完全适用网络作战，例如，当己方第一波次网络攻击完毕或在己方发起第一波次网络攻击的同时，对方可以凭借稍强的防御能力启动应急方案施以精确反击；此时，如果己方自身的网络防御能力跟不上，则必会遭受对方的网络反击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网络防御太难就忽视防御，更不能因为网络防御的建设成本较高就将网络作战主要寄望于进攻。只有积极防御下的进攻才可能真正握有主动。因此，越是在网络防御很难的情况下，越要加大对网络防御的研究，建设和保持一支符合足够原则的网络战反击力量，保证在遭受对方首波网络攻击时仍能实时进行网络反击，这正是积极防御网络作战指导思想的内在要求。

2. 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的基本原则

在争夺激烈的计算机网络战场上，计算机每比特的字节的作用往往比弹药更大，工业时代“打钢铁”的传统战法将被“打硅片”的方式取代。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与传统的战争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作战的基本原则也与传统的有所不同。

一是全域部署、整体对抗。计算机网络作战包括陆、海、空、天、电所有领域，贯穿于战役战斗的全过程，涉及军队、国家和地方的各种参战力量，涵盖信息获取、传递、处理等多个环节。因此，实施计算机网络作战必须全域部署，即在计算机网络作战中，要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系统的监控、监测和监视功能，在所有作战领域的空间进行全面部署，并对配置在各领域的计算机网络作战力量实施有效的协调和控制，并根据计算机网络作战不同阶段情况的变化，有重点地组织信息防护，集中使用建制和配属的计算机网络战武器于主要方向和重要时节，重点打击敌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要害部位。

整体对抗就是将计算机网络作战纳入战略、战役和战斗的整体作战计划之中，围绕战略、战役和战斗的总体目标，统一计划和协调各种作战活动，综合使用各种力量，形成整体合力与敌在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展对抗。因此，各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要从作战全局上统一筹划计算机网络作战行动；将各种计算机网络作战要素和力量有机组合，使之形成合力；把各种计算机网络作战的战法和手段有机组合，使之互相作用；把不同领域的计算机网络作战行动有机组合，使之

互相协调，从而形成对敌计算机网络作战的整体合力，才有可能夺取和保持计算机网络作战的主动权。为此，一要建立统一的计算机作战指挥协调机构；二要制订统一的计算机作战计划;三要周密组织计算机作战协同。

二是软硬一体、技战并重。“软杀伤”手段是指以干扰、压制、致盲、欺骗、削弱敌计算机网络系统功能为直接目的的作战手段，主要包括电子干扰、计算机病毒攻击、网络渗透、碳纤维弹攻击、虚拟作战、心理攻击等手段。“硬毁伤”手段是指以摧毁、破坏敌计算机网络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杀伤敌计算机网络作战人员等为直接打击目的的作战手段。主要包括常规火力打击、兵力破袭、电磁脉冲攻击、定向能武器攻击等。虽然运用“软杀伤”手段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较强的欺骗性和较大的干扰破坏力，并且既可以是一种单独的计算机网络作战行动，也是实施“硬毁伤”的重要保障，但“软杀伤”手段不能对敌计算机网络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等硬件设施及网络作战人员直接造成杀伤破坏效果，只能暂时使敌计算机网络系统和信息化武器丧失或降低能力。运用“硬毁伤”手段可长久地影响对方的信息作战能力，削弱敌整体作战能力，有利于组织“软杀伤”作战行动。同时,“硬毁伤”手段也只有在“软杀伤”手段的配合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将“软杀伤”手段与“硬毁伤”手段综合、协调运用，方能从根本上削弱以至摧毁敌网络综合作战能力。

技术与战术并重是由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的规律决定的。关于技术对作战的重要影响，恩格斯曾说：“技术每天都无情地把一切东西、甚至是刚刚开始使用的东西当作无用的东西加以抛弃。……我们在作战的技术基础这样不断革命化的条件下，将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考虑这种无法估计的因素。”[4] 在网络对抗领域中，将技术转变成战法，以技术推动战术同样更加重要，可以说整个网络对抗都是建立在一定技术基础之上的。但在注重技术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战术，巧妙的战术不仅可以弥补技术差距，还能降低敌方的技术优势。所以，指挥者在指挥计算机网络对抗时，要二者并举，即在强调技术的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战术的作用。

三是攻防结合、以防为主。计算机网络进攻和防御是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行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单纯的进攻或防御都不能达成网络作战的目的。有效的进攻可以从根本上削弱甚至摧毁敌方的计算机网络作战能力，制止敌方计算机网络技术手段、装备和系统效能的发挥，从而相对增强我方计算机网络系统和信息系统的防护能力。通过防御，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敌对我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毁伤程度，使我方计算机网络进攻能力得以保持。因此，计算机网络作战必须贯彻攻防结合的原则。

以防为主是基于“网络积极防御”作战指导思想的作战原则。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要战略对手具有较高的网络作战技术和手段。记得在 2001 年 4 月的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黑客也对中国发起了一场网络大战。尽管中国黑客高手奋起还击，但是由于中美在技术等方面的差距，我们在这次网络大战中损失惨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网、西安信息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等众多网站遭到攻击，一些大型门户网站也相继被“黑”，数据或被盗窃或被删除，引发了泄密、数据错误等问题，有的甚至是整个系统陷于瘫痪。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美国等强大作战对手相比，我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及其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而且这种状

况在短期内还得不到根本改善，因而还不具备在全时域、全空域与对手较量的能力。网络进攻作战只能在重点方向、重要时节，选择关键性的目标进行。这些都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确立“攻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思想。为此，一要同时做好网络进攻和防御两手准备；二要严密组织网络信息防御；三要选择技术精、作风硬的专业骨干，集中性能好的网络战武器，在主要方向和关键时节对敌实施突发性网络攻击。

四是分散部署，协调使用。自古以来，集中兵力一直被兵家视为取胜的法宝。从集中兵力的实质来看，集中兵力就是为了集中火力。因为过去的火力不够准确,威力不够大，才使得通过集中兵力的方式集中火力。由于网络把分散在世界各地、部署于陆、海、空、天的所有武器系统和指挥体系都联接在一起，便具备了将所有分系统综合集成为大系统的能力。无论坦克、飞机、舰艇和卫星怎样分散部署，无论这些武器身在何处，只要想用它来打仗,随时调用都能够做到“指哪打哪”，实施精确打击。因此，在网络作战条件下，各种力量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节点可以分散部署。这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网络化战场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网络化战场中，作战平台远程化使得协调使用火力更容易，这种火力协调使用更有突然性。在网络系统内的各种作战平台，既包括陆、海、空、天、电的武器系统，也包括远、中、近的武器系统，所有这些都可对目标实施协调使用，集中打击。这样，依靠网络力量无形中就增加了火力的打击威力。一方面是由于武器的射程日益增大,比如，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达 1300 公里，使得它可以打击 1300 公里远的目标；另一方面，由于计算机网络系统与武器以及武器系统之间互相联结构成“系统集成”，使得火力协同变得容易，这使得当敌人遭打击时，很难辨别攻击是来自陆上、海上还是空中。而由于网络的四通八达，利用网络使指挥官可以根据战况变化更容易实施超越指挥。同时，由于在网络中的信息共享，不同兵种、不同级别的部队相互间的协同作战也更加容易。此外，在网络化战场中，由于火力协调作用替代了传统的兵力集中，打击对象不再是通过消灭敌有生力量来消灭火力，而是通过破坏其“系统集成”和破坏其网络结构来削弱对方的火力。“协调使用”增强了单兵对战场全方位实时情报资源和火力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利用程度，使单兵战场控制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

五是军民结合、平战一致。由于网络对抗大量涉及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最具有军民通用的特性。因此,在组织信息网络作战时，要充分发挥人民战争优势，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充分利用和协调一切可以利用的网络作战资源，将军用网络系统和民用网络系统有机融合，高度集成，土洋结合，多种手段并用，力争夺取和保持网络作战的主动权。贯彻“军民结合”的原则，首先，要把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特别是作战地区的民用通信、邮电、能源等网络信息设施和已开发的民用网络技术成果直接用于网络作战，并动员和利用地方雄厚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人才参战，以弥补部队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人才之不足。其次，要充分利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军事网络系统都与因特网互联的特点，使我国相当数量的网上用户成为我军网络作战的“网络战士”，对敌发动一场网络上“人民战争”。此外，还要广泛利用国家的各种网络传播媒体和社会舆论，大量散布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信息，牵制和离间敌人的

行动。总之，要运用各种力量，采取多种简便易行、军民通用的战法，通过多种途径，多方位、多领域、全时空对敌展开网络人民战争,使敌陷入“人民战争的信息海洋之中”。

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主要的作战都是在战时，但大量的准备工作是在平时，因此实施网络作战必须坚持平战一致。在网络作战中，平时敌方实施的计算机病毒及其它侵入，可能潜伏数年不被发现。因此敌方往往在战前就预先侵入，故防御一方必须不间断地开展网络防御建设，认真检查和评估所依靠网络设施的漏洞和易受攻击之处，预测潜在敌人可能采取的破坏行动，有针对性地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行动。而作为进攻者，侵入一个网络往往仅是时间问题，所以平时就提前研制侵入方法，进入网络并潜伏其中，那么战时就能从容对敌实施攻击。因此，必须坚持平战一致原则。

三、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攻防理论

基于信息系统网络作战与传统作战方式一样，也包含进攻和防御两个基本方面。但无论是网络进攻方面的理论还是网络防御方面的理论，都与传统的作战理论有所不同。

1．基于信息系统网络进攻作战理论

网络进攻是指通过侵入敌方计算机网络系统，窃取、修改或破坏敌方信息，散布对敌方不利的信息，或破坏敌方网络系统的硬件和软件，从而降低或破坏敌方网络系统的作战效能。它是利用敌方网络系统自身存在的漏洞或薄弱环节，通过网络的指令或者是专用的软件进入敌方的网络系统进行破坏，或者是使用强电磁武器摧毁它的硬件设备，通俗的说法叫“破网”。实施破网攻击的前提是破解敌方网络系统的“安全阀门”，并发现网络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然后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攻击。在网络时代，军用网络系统已经成为高技术战争的神经中枢，一旦网络系统遭到攻击，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就会降低甚至丧失。因此，是否具有网络战能力，尤其是网络进攻能力，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

网络攻击模式。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攻击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体系结构破坏模式，即通过发送电脑病毒、逻辑炸弹等方法破坏敌方网络系统的体系结构，造成敌方指挥控制系统的结构性瘫痪。二是信息误导模式，即向敌方网络系统传输假情报，改变敌方军事网络系统功能，可对敌方决策与指挥控制产生信息误导和流程误导。三是综合破坏模式，即综合利用体系破坏和信息误导，并与其他信息作战样式紧密结合，对敌方军事网络系统特别是指挥控制网络系统造成多重杀伤功效。

网络进攻战法。网络作战具有与传统作战不同的作战方法，具体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一是网络虚拟战。网络虚拟战是运用计算机成像、电子显示、语音识别和合成、传感等技术为基础的新兴综合应用技术，在网络战场以虚拟现实的形式实施的网络作战。二是网络破袭战。网络破袭战主要是通过摧毁敌方网络系统的物理设备达到瘫痪敌方军事网络系统的目的，一般它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用以摧毁、破坏敌方电子网络系统，可分为火力破击和电子破击。三是网络病毒战。网络病毒战是把具有大规模破坏作用的计算机恶性病毒，利用一定的传播途径，传入敌方雷达、导弹、卫星和自动化指挥控制中心的计算机信息情报搜集系统中，在关键时刻使病毒发作,并不断地传播、感染、扩散，侵害敌系统软件，使其整个系统瘫痪。

网络攻击方式。网络作战攻击方式是指利用敌方网络系统的安全缺陷，窃取、修改、伪造或破坏信息，以及降低和破坏敌方网络使用效能而采取的各种攻击方式。由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网络协议和结构以及网络管理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安全漏洞，使得网络攻击方式有多种多样。一般常见的网络攻击方式主要包括：节点破坏、拒绝服务攻击、入侵攻击、物理实体攻击、网络欺骗攻击、邮件攻击和信道干扰等。

2．基于信息系统网络防御作战理论

基于信息系统网络防御作战是以积极防御的作战思想为指导，为保护和增强己方实时、准确、可靠的收集、处理及利用信息的能力，而采取的一系列连续性的军事行动。它是通过对已方的网络系统采用各种防护措施，防止敌方的网络入侵和其它形式的破坏活动,保护已方网络系统的正常工作和使用。网络攻击的隐蔽性、破坏性和攻击方式的多样性,使网络防御成为网络用户的头等大事。特别是随着国家对计算机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大而导致计算机大面积联网，网络遭到攻击的危险也随之增大。因此，在“无网不在”的信息社会，只有扎实地搞好积极防御，才能确保在网络作战中赢得主动。

网络防御模式。网络作战防御是在联合作战的信息防御作战中，为保护己方计算机网络系统免遭干扰和破坏而采取的所有网络防护行动。通常以防止敌方网络渗透、病毒侵害、预置陷阱为主要内容，采取技术与战术相结合的措施，运用电磁遮蔽、物理隔离和综合防护等模式进行防范，以确保己方网络系统安全。具体的防御模式有三种：一是电磁遮蔽，就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技术和战术手段，减小己方电磁辐射的强度，改变辐射的规律，使敌人无法侦测己方计算机设备辐射的电磁信号，从而保护己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二是物理隔离，就是采取各种技术手段，防止计算机病毒侵入己方网络系统。三是综合防护，就是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黑客攻击和新概念武器等的防护，尽量减少己方网络系统在敌方攻击中的损失。

网络防御战法。在实施网络对抗过程中，除了要综合采取各种攻击技术与战法对敌实施有效网络攻击之外，也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技术与战法对己方的网络实施防护，达到攻守平衡，这样才能确保国家和军队的网络系统安全。目前，网络防御的基本战法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是隐真示假，就是采取藏匿规避等方法，避敌侦察干扰。二是疏散配置，就是分散、不规则地配置网络各要素，削弱敌火力毁伤能力，从而达到以局部损失换取整体网络安全的目的。三是管理防护，就是通过加大对计算机网络系统的管理，达到保护计算机实体及其网络系统安全的目的。四是硬件保安，即严把硬件安全关，防止“病从口入”，如尽可能利用本国生产研制的计算机“软”、“硬”件，严把网络设备进口关。

网络防御方式。网络在拥有先进性的同时，也伴随着可侵入、可破坏、可干扰和可击穿等脆弱性。必须积极防御，努力寻求计算机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一是组成电磁频谱屏蔽层。由于无线电波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作为网络重要信息传输媒介时，具有易截获、易暴露、易泄漏等不利的方面。所以，网络防护必须要设法对电磁频谱进行有效保护。二是形成计算机网络安全保护网。计算机网络安全保护网是为网络建立和采取的技术和管理的安全保护，保护计算机硬件、软件和数据不因偶然和敌方攻击等原因而遭到

破坏、更改和泄露，从而保证网络连续正常运行。三是构建计算机网络“防火墙”。即为确保计算机网络安全而采取的保护措施、网络安全体系设计、安全软件开发与应用等行动。

四: 结语

制网权已成为信息化战争对抗双方争夺的新焦点。在信息时代，计算机信息网络已开始向全球的各个角落辐射，其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正在成为当今和未来信息社会的联系纽带。重要的信息网络系统成为维系国家的命脉和战略资源，一旦这些网络系统被攻陷，整个国家的安全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在军事领域，未来信息化战争将是建立在信息网格基础上的网络化战争，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网络已经成为现代军队的神经中枢，传感器网、指挥控制网、武器平台网等网络，将成为信息化战争的中心和重要依托。未来战争，谁在网络空间的角逐中占据优势，谁就能占据二十一世纪战争的战略主动权。一个备受关注的作战新概念 —“制网权”，便伴随着一个旨在谋求对整个信息领域最高控制权的宏伟军事蓝图登上人类战争的舞台。♣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1 卷，第 17 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2. 常名：网络化战场与制网络权，解放军报，1996 年 9 月 24 日。
3. 李大光：制网权成为信息时代战争的新焦点，解放军报，2010 年 5 月 27 日。
4.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2 卷，第 488 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 李大光著：《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解放军出版社，2010 年 7 月版。
[2] 王力等编著：《病毒武器与网络战争》，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年 1 月版。
[3]《解放军报》，2000—2010 年相关文章。

李大光 (Dr. Li，Daguang)，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教授，博士，大校军衔，从事军事科技装备与国家安全的教学科研工作。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太空战》、《论制天权》、《21 世纪军事发展大趋势》、《国际机制与区域安全》《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作战》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千余篇，数百万字。

反击时刻已到：将网络防御转向“作战化”

It’s Time to Fight Back: “Operationalizing” Network Defense

尼古拉・亚当・弗雷泽（Mr. Nicolas Adam Fraser）
罗伯特・J・考夫曼三世，美国空军退役中校（Lt Col Robert J. Kaufman III, USAF, Retired）
马克・R・赖德尔，美国空军退役中校（Lt Col Mark R. Rydell, USAF, Retired）*

空军决定在太空司令部属下组建第 24 航空队，藉此机会，空军可以全面评估目前的网络战做法，确保网络战行动能紧紧围绕空军的既定使命：“在天空、太空和网空中飞行、战斗、直到胜利”[1] 这种全面评估需要涉及空军内外众多部门，需要探讨大量内容，包括政策、拨款优先、人员，以及跨军种协调，等等。本文无意讨论有关网空作战的各种复杂问题，而是重点检视网空作战中最显见的部分 — 网络防御。

从 1992 年以来，空军一直监视着自己的网络，及时处理恶意攻击事件。随着空军指挥和控制其网络的能力逐渐成熟，一些作战原则已在无意中把网络防御（NetD）和网络运作（NetOps）混在一起。本文提出一些新的作战方式，以把网络战，尤其是把网络战中的 NetD 和 NetOps 清楚区分开来。建议的第一种方式是网空寻的，其重点在于主动侦测、确定、跟踪、并锁定敌人。开展网空寻的，我们就能确保使命关键系统甚至整个网络路径不致被敌人侵入。第二种方式是网空交战，它包含各种响应行动，每个行动都精心设计，打击经过确认的企图入侵者。目前的 NetD 做法加上网空寻的，可以导向网空交战。最后，我们必须将网空寻的和交战行动与作战司令部及国家其他机构的行动密切协同。通过网空寻的和网空交战这两种作战方式，我们就能看到网络维护和网络防御之间的明显不同。有了这种显著区分，并运用本文建议的方式，我们就能更加有效地开展 NetD 行动。

NetD = 网络防御
NetOps = 网络运作

目前作战方式需要改变

空军对 NetOps 和 NetD 一直采用不同的定义。NetOps “为国防部和空军重要通信和信息处理提供有效果和效率的、安全并可靠的信息网络服务”，NetD “利用……基于网络的能力来保卫网络中储存或传送的我方信息，免遭敌人摧毁、干扰、损坏或侵占。NetD 可以被视为是计划、指示和实施旨在防止未经授权活动的那些行动，以保卫空军的信息系统和网络；如果未经授权活动已经发生，则计划、指示和实施旨在抢救和复原信息的那些响应行动”。[2] 联合作战界没有给出一个和空军的 NetOps 对应的术语，这个事实说明联合作战界把 NetOps 作为 NetD 的一个附属功能，或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维护功能，没有必要在联合作战准则中讨论。[3] 鉴于联合作战准则和空军作战准则之间的这种差别，本文拟简化 NetD 和 NetOps 的定义，以便读者能立即辨识两者的不同责任和优先：

- 网络战行动 / NetD：旨在对敌产生预期的战术、战役和战略效果的行动。这些行动需要预先计划和情报支援，可被动响应，也可主动实施；最重要的是，NetD 行动

* 三位作者都在位于德州 Lackland 空军基地的第 688 信息战联队工作。弗雷泽先生担任网络接入工程部主任，考夫曼退役中校担任第 318 信息战大队副队长，赖德尔退役中校是 Booz, Allen, and Hamilton 顾问公司成员。三位作者都曾派驻空军计算机应急响应小队。

把侦测敌人的过程不仅作为发现威胁、而且作为发现交战机会的过程。

- NetOps：维护人员为提供可靠和安全的网络服务而运作网络的行动。在现实中，敌方扰乱我方运作的破坏结果，不亚于硬件失灵，因为 NetOps 的目的就是维持设备运作和性能完整。正如我们能更换硬件一样，我们也能重建被侵入的电脑。

我们认为，空军实际上并不是在开展上述定义的 NetD。为论证这个看法，我们在本文中审视两个核心原则，这两个原则是空军当前开展 NetD 作战的核心指导，空军因此总是被动应对，降低了有效保卫网络的能力。

当前原则 1：以发现敌情为主要任务

这项原则作为我军构建大多数传统 NetD 的基础，消耗着空军大量 NetD 资源。空军依赖实时监测并强调加固网络外围，以发现敌情。在这里，动机起着重要作用：空军希望发现入侵者或攻击者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其采取打击行动，而是为了找出和修补安全漏洞。这种情景类似一名沿飞行路线巡逻的警卫人员对一个可疑事件所做的反应。他在看到篱笆有一个入侵者出入的破洞之后，便用手电筒照着这个窟窿并开始修补，而不是追踪并抓住入侵者。目前空军并不区分高明的和简单的入侵者，而对所有网络扰乱事件一视同仁，一样处理，以这种方式来保护和重建网络安全。空军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确保完成预期的使命，没有做到保持 NetOps 正常运作而不受敌人攻击的干扰。

侦测敌情固然重要，但不是保护网络的唯一途径。迅速和定期改变网络的配置同样能提供保护，而且并不需要发现敌情就能获得安全效果。[4]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要把这种侦测敌情的努力停下来，因为正如前文中所提出的，侦测敌情对 NetD 具有关键意义。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侦测的动机必须修改。并且，我们觉得：即使是最好的外围防御和修补管理方法，也无法威慑或阻止高明的对手。[5] 虽然现行方法有一定作用，但是我们必须辅之以另一套做法，重点在有效打击敌人，保证使命成功。

当前原则 2：只要被侵入的电脑经修复后不再被攻陷，NetD 行动就算成功

这项原则将 NetD 行动降格为只在空军内起维护作用，只关注网络安全，却忽视了如何确定敌人的攻击对我军目前和未来使命的影响。此外，我们极少使用被敌人侵入的电脑去和敌人交战。NetD 作战员不仅应查找原因、分析、修补被侵入的电脑，还必须在我们自己的网络中同敌人对抗，构想并实施能挫损敌人阴谋同时确保优先作战任务的防御战略。

这项原则甚至比上一项原则更把 NetD 等同为 NetOps。每发生入侵，我们就开列“一个事件”，那么什么时候了结呢？不是在一项行动结束时，而是在我们认为这台电脑不再被攻陷并让其重新加入网络时。这算是成功吗？不。我们应该用作战有效性来衡量成功，所以必须采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次的量值，确定是否实现了 NetD 的目的，例如是否镇住敌人不敢再策划或发动对美国利益的攻击。[6]

新的作战方式

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成立专门的作战单位（规模待定），切实负责对付以空军和国防部网络为目标的敌对行动。虽然第 24 航空队（包括第 688 信息战联队和第 67 网络战联队）目前负责执行空军的网络使

命，但是此航空队中现在没有任何单位负责本文以下建议的任务。我们所建议的新作战方式要求改组目前的部门，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建立新的单位。

拟议组建的第一个部门把注意力对内，找出威胁空军和国防部的敌人；第二个部门把注意力对外，在空军和国防部网络上与敌人交战。虽然两个单位将密切配合（通过已经成熟的不间断网络监控），但互相有别，各自根据指挥官的需要负责作战计划中的不同使命和任务，随使命完成而终止。在战略层面上，领导部门需要颁发适当的 NetD 政策，允许作战单位开展包括主动寻的和与敌交战在内的先发制人作战。下一步在战役层面，我们必须制定作战计划，针对特定的敌人做出详细作战方案，使网络卫士协同作战，在网空中取得集中优势兵力、突发和及时打击敌人的效果。最后在战术层面，我们必须训练和认证 NetD 武器操作员，通过他们打击和挫败敌人侵入空军网络的企图。有了这样的组织和计划，空军就能开展 NetD 作战，在网空中寻找、交战和打败敌人。

网空寻的

显然，敌人、尤其是那些技术先进不甘罢休的敌人，千方百计潜入空军的网络寻找攻击机会，诱使我们的用户开启恶意附件或点击通往恶意网页的链接，从而轻而易举地突破外围防御。敌人轻松进入空军和国防部网络后，就等于建立了“滩头阵地”，然后就可更轻松地在我们的网络内导航和机动，伺机接触高价值信息和系统。网空寻的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办法，通过使用并非永久驻存于空军网络的先进 NetD“武器”和典型的外围安全工具来发现入侵者。我们在开展作战时，应有具体目的，主动寻找敌人，然后影响、阻止或挫损敌人。我们的作战行动必须一打到底，一旦发现敌人必彻底除之，直到证实这个敌人不再隐藏在我们的网络中之后，任务才算结束。这些作战行动还要求我们认真制定和实施合适的作战计划，因为敌人是在数据浩瀚的网空中藏匿并伺机发动攻击。

网空交战

防御作战只能拖延、中断、威慑或拒绝敌人的攻击。假设我们无法完全制止敌人，那么就需要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阻碍或利用敌人的努力（“利用”的意思是对敌人的决策能力施加第二和第三层影响效应）。网空交战要求谨慎决策，需要运用国防部的网络作为接触敌人的通道 — 实现防御目标的通道。[7] 在发现我方电脑或网络被侵入后，NetD 卫士不再是简单地重建系统，而是使用情报和其他 NetD 武器去发现入侵者。接着，我们的卫士根据对涉嫌作案者的判定程度和已定作战计划，使用被侵入的电脑或网络作为发射点开展对敌战术行动。[8] 例如，NetD 卫士可以故意将错误信息传给敌人或在已泄露的数据中做假使其真假难辨。无论使用什么技术，我方人员要千方百计迷惑敌人，加大敌人入侵的成本，或者影响敌人的行动。为此，我们必须同更大范围的作战司令部或国家层次的战略开展协调，精心策划好这些“响应行动”。[9] 此外，我们的操作人员必须控制好这类行动，避免与日常的网络传感器监视作战行动发生冲突。

如上所述，网空交战涉及各种行动，而不只是简单的网络攻击。交战有多种可能，比如我们可能找不到敌人，可能防守不住自己的网络。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特定技术选择，一切为着达到我方的网络防御目标。就像是在美式

橄榄球对抗中，进攻队员试图冲过达阵区，但是防守方设法阻截。守方球队不仅运用纵深防守挡住对手（排出强大的防守阵容、布置线卫和自由卫），而且使用不同的花招迷惑进攻方的四分卫。例如，一名线卫可能会冲抱四分卫，另外两名队员后退补位，或防守协调员可能组织全线突袭。不管采用哪种策略，优秀的教练知道己方不可能一直挡住对手进攻不让其得分，要做的是如何迷惑对方球员，尤其是迷惑四分卫，以加大对方进攻的难度。

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出，国防部目前在防御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在进攻中制造混淆。我们缺少多种不同的防御策略，也没有就与敌交战做好各种计划，包括如何影响对方计划、如何执行，如何获得预期结果。我们的防御只是立足于网络外围，指望着不让敌人蒙混进来。

网空寻的和网空交战是 NetD 作战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我们在有针对性的作战计划中列入具体目的，可以将 NetD 转变成比网络攻击更强大的作战形式。[10] 美国陆军已经从更传统的防御作战中注意到这一点。[11] 再者，NetD 在网络战争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与 NetOps 更清楚地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现在尤其必要。最后，我们提出的这些新作战方式符合美国总统提出的要求，总统要求对网络攻击做出适当响应，而不仅仅局限于刑事起诉。[12]

简单的建议

在为大型军事行动，如 2003 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制定计划及做准备时，要求作战司令部把作战计划传送给每个军种的 NetD 主导单位，然后布置网络卫士采取措施，阻止敌人对国防部网络的攻击，防止这些攻击干扰我方作战计划的实施。作战司令部提出的要求只是应对常见威胁。在行动开始时，我们通常采取主动，诸如封锁敌意的互联网协议地址。

在这些传统作战方式中，我们将网络看作是支援元素，即：保证我方网络不受影响地运作，从而使我方的对称作战能力能顺利运行，这就像是说我们必须保持燃料车可靠运转，才能保证 F-16 起飞。在美国网络上和敌人交战也许令人难以想象，但是 NetD 作战就是要利用敌人的 NetOps，开展响应行动，包括在被窃信息中做假，增加敌人对我空军和国防部网络攻击的成本，或在冲突的各个阶段之前和其中影响敌人的思维。

我们就如何运用这种新作战方式提出下列建议，此建议是把 NetD 视为一种不对称战争形式。目前，每项作战计划都有一个附件解说 NetD 要求。未来的作战计划，除了提供防御性的网络保护以外，还应确定对开展传统作战至关重要的系统（例如后勤网络，指挥与控制节点等）。此外，我们应该列出高威胁敌人，然后规划和协调网空交战行动，并且我们应该围绕作战司令部认定的使命关键系统，策划和实施网空寻的行动。进一步，一旦发现敌人，我们应该实施交战行动，挫败敌人或者影响其行为。

我们需要强调两点。首先，在寻的行动中发现的敌人可能同作战计划中预期的敌人完全不同，这种可能性使我们极难把握住制网空权。第二，寻的行动和交战行动并不一定同特定的作战司令部作战计划相关。只要我们同其他作战行动做好协同，妥善规划，就能主动开展寻的行动。无论是通过传统侦

测做法或寻的行动，一旦发现我方网络遭袭，我们应考虑实施交战行动。

结语

第 67 网络战联队指出，“说到底，空军必须从以侦测为主的做法转向主动网络杀伤链做法，把预防，侦测、响应、交战四者整合为一体”。[13] 但是如果不组织且不向 NetD 部队下达任务，如果不把目前的被动做法（监视、侦测和响应）转变成如洛德中将（Lt Gen William T. Lord）最近所说的“找出威胁……发现并立即打败敌人”的方法，这种构想就无法取得成果。[14] 我们不能孤立地去做，而需要有目的地与情报和国家层次机构计划和协调。此外，设立美国网络司令部，应该有助于确保各军种接受作战司令部的管辖和指挥。网空寻的和网空交战的作战方式将能使 NetD 真正“作战化”，因为这种方式把重点集中在打击和挫损敌人。在未来，我们应该同样关注确保使命成功（亦即任凭敌人网络攻击，我自持续作战），在这个领域，我们无法把 NetD 和 NetOps 完全分离。如果没有计划和精确的情报，我们就不能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国防部每半年要拿出 1 亿美元来保卫军方网络。[15] 到时候，我们将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正在达到防御目标和威慑住敌人。就今天而言，我们还没有做到。但是通过将 NetD 作战化，通过把重点转向挫损敌人，我们就能扭转这个趋势，空军就能发动反击。♣

注释：

1. Air Force Program Action Directive 07-08, Phase On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Air Force Direction to Organize Air Force Cyberspace Forces [空军第 07-08 号计划行动指令：落实空军部长关于组建空军网空部队的指令的第一阶段计划], 19 December 2008, 8.
2. Air Force Instruction 33-115, vol. 1, Network Operations (NETOPS) [空军第 33-115 号指令第一卷：网络战], 24 May 2006, 3, http://www.af.mil/shared/media/epubs/AFI33-115V1.pdf (accessed 13 May 2010); and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2-5, Information Operations [空军作战准则 AFDD 2-5：信息作战], 11 January 2005, 20,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service_pubs/afdd2_5.pdf (accessed 13 May 2010).
3. Joint Publication 3-13, Information Operations [联合作战准则 JP 3-13：信息作战], 13 February 2006,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13.pdf (accessed 13 May 2010).
4. Spyros Antonatos et al., “Defending against Hitlist Worms Using Network Address Space Randomization”[使用网络地址空间随机化抵御黑名单蠕虫], Computer Networks 51, no. 12 (22 August 2007): 3471— 3490; and Dorene Kewley et al., “Dynamic Approaches to Thwart Adversary Intelligence Gathering”[挫败敌人情报搜集的动态方法], in Proceedings of the DARPA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Information Survivability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vol. 1 (2001), 176.
5. “Engaging the Adversary on Air Force Networks”[在空军网络上与敌交战], Information Assurance Technology Analysis Center Report, TAT 04-25, DO 232, 5 March 2007, 1.
6. Chairman,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distribution list, memorandum, subject: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for Cyberspace Operations (without enclosure) [备忘录，主题：网空作战的国家军事战略（无附件）], December 2006, 13, http://www.dod.gov/pubs/foi/ojcs/07-F-2105doc1.pdf (accessed 14 May 2010).
7. Sun Tzu, The Art of War [孙子兵法], trans. Samuel B. Griff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87.
8. “判定程度”在这里是指我们能判定敌人是谁的自信程度。

9. John P. Stenbit,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s, and intelligence, to secretaries of the military departments et al., memorandum, subject: Guidance for Computer Network Defense Response Actions [备忘录:主题:电脑网络防御响应行动的指导方针], 26 February 2003, https://powhatan.iiie.disa.mil/cnd/cnd-ra-matrixand-memo.pdf (accessed 14 May 2010).

10.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战争论],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84.

11. Field Manual 3-01.7, Air Defense Artillery Brigade Operations [野战手册 FM 3-01.7：防空炮兵旅作战], 31 October 2000, 6-36, http://www.theblackvault.com/documents/fm3_01x7.pdf (accessed 14 May 2010).

12.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Secure Cyberspace [确保网空安全的国家战略],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003), http://www.us-cert.gov/reading_room/cyberspace_strategy.pdf (accessed 14 May 2010) .

13. 26th Network Operations Group, "NetD Concept of Employment" [运用 NetD 概念], final draft, 14 December 2007, 2.

14. Chuck Paone, "General Calls for New Thinking on Cyberspace" [呼吁网空新思维], 12 May 2009, http://www.af.mil/news/story.asp?id=123148876 (accessed 8 April 2010).

15. William Jackson and Doug Beizer, "New DOD Cyber Command Will Focus on the Dot-Mil Domain" [新的国防部网络司令部将重点放在军事域名领域], Government Computer News, 15 June 2009, http://gcn.com/Articles/2009/06/15/Web-DOD-cyber-command.aspx?p=1 (accessed 8 April 2010).

At the heart of warfare lies doctrine. It represents the central beliefs for waging war in order to achieve victory. Doctrine is of the mind, a network of faith and knowledge reinforced by experience which lays the pattern for the utilization of men, equipment, and tactics. It is the building material for strategy. It is fundamental to sound judgment.

— Gen Curtis LeMay, Chief of Staff, US Air Force, 1961-65

用兵之道，核心在于运用作战准则，作战准则体现了如何打仗并取胜的核心信念，它是心灵的智慧、教义的集成和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总结，为人员、装备和战术的运用提供参照。它是构建军事战略的材料，是明智判断的依据。

— 柯蒂斯・艾默生・李梅将军（Gen Curtis Emerson LeMay）

零核错在哪里?

What's Wrong with Zero?

查尔斯·E·考斯坦舒博士，美国空军退役中校（Lt Col Charles E. Costanzo, PhD, USAF, Retired）

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 4 月布拉格演讲中，承诺美国将彻底消除其武库中的核武器，此举赢得多数公众的积极欢迎。虽然奥巴马总统出于谨慎，没有为这一目标列出具体的时间表，但是他带领美国踏上了把我国拥有的核武器逐步削减至零的道路。然而，总统的这一愿景没有获得俄、中、法、英这四个核大国的呼应。事实上，四国的做法和美国背离，它们都在实施或者计划实施核武器的现代化升级计划；其中有些计划可能不在于追求增加核武器的数量，但所有四国都力图提高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的质量，藉以强化长久可信威慑力量。对这些核现代化计划的审察清楚地表明，每一个国家都把核武器的用途视为加强国家安全的长期保障。

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虽然笼统地同意了奥巴马总统的目标，俄罗斯却迅速就达成无核世界协议开出若干条件，显示该国对奥巴马的建议其实只是敷衍。更何况，俄罗斯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旨在继续加强而非减弱核武器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作用。俄罗斯计划逐步淘汰陈旧的 SS-18、SS-19 和 SS-25 洲际弹道导弹（ICBM），换用能够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白杨 -M”改型导弹（RS-24）。俄罗斯为了打造长期可靠的海基核威慑，将把 D-IV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退役，代之以“北风之神”级核潜艇，每艘配备 16 枚新型“布拉瓦”导弹，各自携带 6 个弹头。[1] 简言之，如斯坦福大学副研究员 Pavel Podvig 所言，俄罗斯的长期趋势是战略核武器保持增长。[2]

中国的战略核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在向现代化发展。除了现有的 20 枚 DF-5 单弹头 ICBM 之外，新型导弹将加入服役，目前在役的一艘携带中程导弹的弹道导弹潜艇也将被新系统取代。[3] 中国的 ICBM 力量升级计划包括新研制的公路机动 / 固体燃料 DF-31 和 DF-31A，这些导弹具有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潜力。[4] 其唯一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不久将被淘汰，代之以配备 ICBM 的新型潜艇，这些导弹也具备分导式多弹头潜力。[5] 虽然中国秉持最低程度威慑战略，并可能延续小型战略核部队的政策，但其对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的现代化努力以及增加现代化弹道导弹潜艇的做法表明，中国决心继续长期保持核武器。

除了俄国和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之外，美国的两个关键盟国，法国和英国，也在继续进行或计划进行核力量升级。法国的核战略立足于海基和空基平台，令人关注的是，这两种平台都正在进行重大现代化升级。法国正在部署新型“凯旋”级弹道导弹潜艇，并计划于 2010 年在最新潜艇中装备携带新式弹头的更长程先进 M51 弹道导弹。法国 2010 年的计划中还包括对空基平台进行升级，将部署携带先进空射型 ASMP-A 核导弹的新一代“阵风”飞机。[6] 在几个“核现代化大国”中，只有英国的核力量前景不明，

*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英国政府在 2006 年宣布将以更新的平台取代目前的“前卫”级弹道导弹潜艇，随后政府在 2009 年决定推延此计划，等待内部评估结果。英国的潜射弹道导弹原来准备用美国建议的可靠替代弹头取代，但是因为这项计划没有获得奥巴马政府的拨款，故而英国政府的弹头更换计划尚无着落。[7]

总体而言，除美国之外，几个核大国都正在推进或计划推进核现代化计划，表明这些国家继续把核武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筹码。显然，如果不是国家决策者看重核武器的相关作用，这些国家就不会投入重大人力和资金来推进核武器的现代化。就是说，虽然奥巴马政府有意追求无核世界的愿景，其他核大国却选择分道扬镳,并打算长期如此。

那么零核何错？大错特错。一如俄中法英四国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所示，所有核大国，除了美国，目前都不相信无核世界是一个现实的目标。相反，这些国家正投入资源推行核武器现代化，这清楚表明它们已经下定了购置和部署改进型核武器及其先进投射系统的长期决心。决心达到这个程度，意味着即使到更远的未来，俄中法英之任何一国都不会接受美国政府追求的愿景。这些国家可能对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份量有不同的研判，但它们都不会准备把核武器从自己的武库中彻底清除出去。退一步说，即便这些核大国被说服接受美国的目标，其他已知的或者嫌疑的拥核国家仍将继续重视这些武器的用途。正如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核武器建造技术已经扩散，这种扩散不是出于无法避免的技术必要性，而是因为某些国家认识到核武器的用途。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须以国家安全为根本考虑，由此引导决策的制定，切不可唱高调，把国家安全所倚重的手段一扫而光。这不是说美国应该漠视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权或非国家极端组织获取核武器，而是说我们的国家应该更多地注重国家政策中的安全挑战，作出相应的具体对策；那种一砍到底的建议并无落实之可能，只会沦为空头承诺，却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虽然我们无法以确凿证据证明核武器在冷战时期遏制了美国或苏联，使任一方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可以合理推定，这些武器在防止超级大国战争方面发挥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几率或许有所降低，但是并非毫无可能。克劳斯维茨在其经典著作《战争论》中指出：面对极端暴力的可能发生，一个准备走向战争的国家必须在跨出第一步时，就谨慎思考好最后一步。核武器有异于常规武器，就在于它把战争后果清晰尖锐地展现出来，使相关国家在跨出第一步之前不得不犹豫再三，因为它们清楚知道这最后一步是什么。

我们不应追求那个虚幻缥缈的无核世界 — 它不会获得其他拥核国家的实际支持，却会减损美国的国家安全 — 而应该就核武器的未来用途开展辩论。这场辩论已经迫在眉睫，因为《核态势评估报告》在 2010 年 4 月公布，大家对美国武库中的核武器的目的、数量、以及其在三合一战略核力量中的分布都心存疑问。这场辩论中的核心应该是：抛开美国武库零核建议，把注意力放在核武器数量能降到多低？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应如何合理配比到相对低程度才能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需要？美国将在什么形势下使用核武器？美国是否应刻意保持战略模糊或者明确宣布促发核反应打击的前提？我们应该围绕这些问题辩论核武器的未来，而不是简单地在有和无之间做出选择。♣

注释:

1. Nikita Perfilyev, “START Process and Russian Strategic Force Modernization”[START 协议进程和俄国战略力量现代化],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Issue Brief, 15 June 2009, http://74.125.95.132/search?q=cache:dpaezaGZcPkJ: www.nti.org/e_research/e _start_process_russia.html+START+process+and+russian+strategic+force +modernization&cd=1&hl=en&ct=clnk&gl=us; and Robert S. Norris and Hans M. Kristensen, “Russian Nuclear Forces, 2010”[俄国 2010 核力量],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8 January 2010. http//thebulletin.metapress.com/content/4337066824700113/?p=27e422d96c6047b2a3f34619164c7ea3&pi=9.
2. Pavel Podvig, “Russia's New Arms Development”[俄国的新武器发展],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6 January 2009, http://www.thebulletin.org/web-edition/columnists/pavel-podvig/russias-new -arms-development.
3. Joseph Cirincione, “China's Nuclear Modernization”[中国的核武器现代化], Carnegie Proliferation Brief 2, no. 8 (undated),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ublications/index.cfm?fa=view&id=93.
4.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China Profile: Missile Overview”[中国简介：核导弹概况], August 2009, http://www .nti.org/e_research/profiles/China/Missile/index.html.
5. 见注释 3。
6. Kingston Reif, “Nuclear Weapons: The Modernization Myth”[核武器：现代化的神话],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8 December 2009, http://www.thebulletin.org/web-edition/features/nuclear-weapons-the -modernization-myth; and Bill Sweetman, “Instant Sunshine”[瞬间的阳光], Defens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009, 44.
7. 见注 6 中 Kingston Reif 文。

查尔斯・E・考斯坦舒博士（Dr. Charles E. Costanzo），现任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指挥参谋学院国家安全研究副教授。考斯坦舒博士是空军退役中校，曾出任“民兵 -3”型洲际弹道导弹作战职务及国防部长办公室参谋职务，并在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担任教职。他的专业研究领域涉及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恐怖主义和国土安全，当前研究集中于核武库降低水准下的持久威慑与稳定。 他现在为空军研究所合作编辑一部关于二十一世纪威慑的专著。

实现可信核威慑

Achieving a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塞缪尔·麦克尼尔，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Samuel L. McNiel, USAF）*

对一位古董车迷来说，将一辆 1957 年版的雪佛兰汽车保持良好运行大概不难做到，但用这样的汽车每天代步出行却已不大现实。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官凯文·奇尔顿将军（Gen Kevin Chilton）指出：B-61 核弹头是 1950 年代的设计，里面还装着真空管，如今仍然列装在美国核武库中。他把这种现象比喻为每天开着 57 年版的雪佛兰上路办事。[1]

威慑之可信，在于使对手相信：(1) 威慑武器名副其实，具有宣称的摧毁力；(2) 威慑国说到做到，具有使用此武器的意志。两者若缺一，则威慑失其威力。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美国核武器的可靠性以及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意志都在降低，以核武器作为终极保障的美国威慑力的可信度也相应下降。再者，支撑美国核威慑战略的工业基础，即核武器生产联合体，已经难以为继。本文认为，美国应该通过设计、试验、生产和部署一种新型核武器，来恢复其核威慑的可信度，并藉此来复兴核武器生产联合体，同时展示国家的政治决心。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核武器与武器生产联合体的背景，然后从威慑战略角度逐一检讨核武器的基本性质、美国对核武器生产联合体的忽视、核武库的不可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威慑可信度减弱的后果。本文的结论是，设计和部署一种新型武器将能够纠正这些缺陷，并且提供新的军事能力。

核武器与核武器生产联合体

核武器是由数千部件组成的极复杂结构，对核武器的构造需有基本了解，方有助于对核武器工业基础的讨论。[2] 核武器的核心是一个核爆包。美国现有的核武器全部由两级构成。第一级（或称初级）的工作原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原子弹相同，其中心有一个“核”，即一个由裂变材料（通常是铈）组成的空核，周围包裹着一层化学爆炸物。当炸药引爆时，所产生的冲击波压缩“核”，使其变得非常密集，从而产生核裂变连锁反应。在核爆炸摧毁“核”之前，一种“加速气体”（氘和氚的混合物）被注入这个“核”中，增加了处于裂变反应中的铈的破裂力度，产生更大的能量供第二级使用。第一级产生能量的受控部分随后点燃第二级的聚变燃料。热核武器所产生的能量大部分都来自第二级。[3] 一枚核弹头中有核爆包和其它辅助部件。[4]

一件核武器由一枚核弹头和一套辅助非核部件组成，能够产生具有军事用途当量的核能量。[5] 部件组成包括武器专用件，如引爆装置、电池以及再入飞行器和弹体等。[6] 美国军方现有核武库中共有九种型号的核武器，都是在上世纪生产的，最早为五十年代产品，最新为八十年代产品。[7]

美国的核武器生产联合体由八家基地构成，都为政府拥有，由承包商运营：

---

* 作者系太空和导弹运行官，提交本文时就读于国防大学的武装部队工业学院。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负责设计核爆炸组件；桑迪亚国家实验室……负责设计非核部件；Y-12 厂……生产铀组件和二级部件；堪萨斯城工厂……生产多种非核部件；萨凡纳河厂……处理储存武器中的氚以去除衰变产品；潘特克斯厂……组装和拆卸核武器；内华达实验基地原本负责进行核试验，现在从事不产生核当量的其它武器相关试验。[8]

核武器战略仍然不可缺少

可信的威慑没有可靠的核武器支撑就无从谈起。可信的威慑能够在三个方面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1) 保证美国军队拥有打击敌人的压倒性优势能力，以此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2) 免除盟国自行发展核武器的需求，有助于防止核武器扩散；(3) 劝服对手不要违反核武器控制条约而参与军备竞赛。根据美国战略态势国会委员会的说法："从根本上说，核武器的主要功能在过去几十年间并没有改变：威慑。美国拥核，目的是创造永不动核的条件。"[9]

核武器仍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的关键保障。正如奥巴马总统 2009 年 4 月的布拉格演讲所言："毫无疑问：只要这些［核］武器还存在，美国就将保持一个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武库，威慑任何对手，并为我们的盟友提供安全保障。"[10]《联合作战构想总纲》进一步扩展了这一主题，提出美军需再次将战略核威慑作为重点领域，美国若不能保持其核能力将会放任潜在对手。[11] 奇尔顿将军在谈到部署部队的角色时说，核使命继续是美国战略司令部的头等要务，并相信保持一个安全、可靠的核武库非常重要，直到核武器不再成为这个国家的武库的一部分为止。[12]

当今的核武库，除了用于防止外部对美国实施大规模核袭击这个经典威慑目标之外，还"应设计为具备在可以想象的最困难情况下提供强大威慑的能力：这就是在常规战争中应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对手。"[13] 如果没有以武力支持威胁的能力，威慑是不可信的。确保核能力可在任何形势下投入军事应用，不会使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更大；而是使美国的威慑更加可信。[14] 为了保持对较小核国家的有效威慑，特别是在常规冲突中与拥核武器的敌人交战时，美国的核武库应该为总统提供有最大把握摧毁对手核力量而不造成过多伤亡的手段 — 要满足这一要求，可能需要开发新的低当量武器。再者，如基尔·利伯和达里尔·普雷斯（Keir Lieber and Daryl Press）所述："不管什么样的核武库，都还应为美国领导人提供在这些高风险危机中使用核武器的承受能力和选择。面对敌人对盟国或美军的攻击，美国如果没有可靠和有效的手段，将很难遏制这种攻击。除非美国保持强大的反击能力，美国的对手可能会认为 — 或许不无道理 — 美国的海外战略立场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15]

威慑战略不仅对于保护美国免受攻击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确保盟友和伙伴免受袭击也必不可少。这一保障来源于"延伸威慑"概念，它解除了无核盟国和伙伴追求自主拥核的需要。[16] 如果美国不能满足他们的威慑需求，这些盟国中有许多国家可以在几年以内成功地启动研核项目并开始建立自主核武库，从而引发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核扩散浪潮。[17] 美国空军前副参谋长约翰·洛赫将军（Gen John Loh）清晰地阐述了"延伸威慑"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延伸威慑，为别

国提供核威慑保护伞……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拥有并保持可靠和强大的核力量，以及我们愿意使用它为盟国提供防御的意志与决心。如果我们的盟友不能依靠我们，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和运载手段，多数盟国只要几年时间就能做到。”[18]

可信的核威慑，除了有助于遏制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攻击和防止核扩散以外，还能够劝服中国和俄罗斯放弃与美国进行核竞赛。只要美国能够生产和部署足够的核武器与俄罗斯保持战略平衡，对方就没有动力去打破武器控制协议以谋求战略优势。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可能产生破坏稳定的后果，引发新的核军备竞赛，甚至诱使中国寻求获得与美国的核战略平衡。[19]

核武器生产联合体的萎缩

任何一种依赖核武器的战略都需要有一个工业基础，即能够满足该战略需求的核武器生产联合体的存在。由于美国二十年来忽略了核武器生产联合体，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导致这项工业基础极度萎缩，若不尽快抢救，我们可能会失去维持或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只能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才能恢复。梅拉妮·柯克帕特里克（Melanie Kirkpatrick）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核武器计划一直被忽视。核弹头已经陈旧，自 1980 年代以来就没有设计任何新的核弹头，最后一次核弹头试验是 1992 年，随后美国单方面停止了试验。”[20] 此外，美国的工业能力不足以在生产层面上生产核武器。诚然，它可以通过实验室的资源少量生产，但这和系列生产不能相提并论。最后，曾经参加核武器设计和试验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中只有寥寥数人仍在联邦政府供职，且都将在几年内退休。[21]

在部件层面，美国已不能制造空核（生产空核的洛基弗拉茨厂于 1989 年关闭），也不能在武器联合设施内生产氚。国会授权成立的美国核武器储备可靠与安全评估小组（福斯特小组）2002 年表示，国家核安全局对履行其预定的武器翻新计划的前景喜忧参半，翻新计划中包括 B—61 和 W—76 核武器，其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能生产新的空核。[22] 尽管国家核安全局于 2004 年宣布：“恢复我们生产钸核的能力是美国核防务政策的基本要素”，但是它推迟了兴建一个新核制造设施的决定，使得美国失去了生产层面的能力。[23] 氚是获得核武器设计当量的关键要素，但它每年 5.5% 的衰变率使其成为保质期最短的部件；但是自从萨凡纳河厂的 K- 反应堆于 1988 年关闭以后，美国的核武器生产联合体就没有再生产过氚。不过，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反应堆的确在 2005 年恢复生产。[24]

另外，美国已不再培养顶级核化学家来补充自己的核工业队伍。1960 年代初，美国大学每年授予的核化学博士学位多达 36 名，这个数字后来不断下降。[25] 美国物理协会是世界第二大物理学家组织，该组织表示：“只有极少数美国大学化学系有教授目前仍在从事核化学方面的研究。因此，高等核化学教育在美国已几乎绝迹。”[26]

奥巴马政府提交的 2011 财年预算包括用于国家核安全局的 112 亿美元，与 2010 财年的拨款相比增长了 13.4%。[27] 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托马斯·达戈斯蒂诺（Thomas D' Agostino）说，请求拨款中超过 70 亿美元的资金是用于国家核安全局的武器活动，其中包括增加投资，开始重组一些基础设施的资源，并且建立人力资源基地。[28] 虽然这样的举措会有所帮助，但即使是增加设施拨款也

无法让美国重建生产层面的核制造水平。此外，它不能解决核武库可靠性的不确定性，而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只要不开展全面试验，武器的不确定性就必然存在。如福斯特小组所报告："到某个时候，核武器的全套试验程序将失去用处，"[29] 尽管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这种情况何时发生。

武器可靠性、 政治意志和可信威慑

武器库存保管方案和延寿计划可能不足以确保库存武器的可靠性，而我们不可容忍对可靠性的任何疑问。美国在 1945 年至 1992 年间共进行了 1,000 次核试验。[30] 但自从自行暂停试验以来，我们一直依靠以科学为基础的库存保管方案来认证武器的可靠性。该方案"使用以往的核试验数据、小规模的实验室试验、大型实验设施，以及检查弹头等方法，来增进核武器科学知识，"并且每年从各种库存中抽选 11 件武器进行详细检查。[31]

如果库存保管方案发现某个弹头有问题，将经由延寿计划重新制造所需的部件来修复。多数专家认为，迄今这种做法足以应付并能够在短期未来继续使用，但他们仍然在辩论其长期可行性。据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1987 年的报告："精确复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对老旧系统而言，因为保存的文件从来都不会精确到可以确保复制的程度。对任何产品认证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试验：只有它能够提供有效认证所需要的数据。"[32] 一般来说，随着美国核武库通过多年的发展而逐渐成熟，武器变得更小更轻，以便由较小的运载工具携带；因此一枚导弹可以配载更多的弹头，一枚运载火箭可以带着弹头射得更远。尺寸的缩小需要非常奇特的工程技术，用美国前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林顿·布鲁克斯大使（Linton Brooks）的话说："非常接近性能的悬崖。"[33] 由于需要制出的弹头尽可能小而轻，还要确保它们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不会意外引爆，因此设计所允许的性能误差余地非常之小。布鲁克斯担心的是，在无试验的情况下，随着武器寿命超出了工程师当初设定的弹头退役时间，由武器老化和使用再造零部件引起的变化累积效应，会导致武器可靠性的不确定程度增加。[34]

例如，B—61 弹头的延寿计划已超出了用同类新部件替代原件的做法，将尝试对 B-61 这种美国核武库中几乎唯一的空投武器进行改造，从采用模拟电路变为采用数字电路。[35] 根据现行政策，这项预期于 2017 年执行的改造，将在不进行核武器整体试验的情况下完成。想以未经验验的武器来遏制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或者指望二类区域大国领导人相信这样的武器能够始终发挥预期的效果，大概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可信的威慑除了具备技术可靠性之外，还要求具备政治意愿，以能够提供核武器项目所需的资源，并使潜在的敌人相信：我们在必须使用核武器时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目前的政府与国会正在进一步削弱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延续这一已呈数十年之久的趋势。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演讲中说：

> 因此今天，我以坚定的信念明确地阐明美国的承诺，这就是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与安全的世界。
>
> ……首先，美国将采取具体步骤推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我们将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
>
> ……我的政府将立即积极推动美国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并且，为切断生产核炸弹所需要的材料来源，美国将寻求一项新的条约，这项条约将以可核查的方式结束企图用于国家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生产。[36]

虽然由不同政治派别组成的历届政府都赞同无核武器世界的梦想，但是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如此公开表示有意降低核武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作用。[37] 尽管奥巴马总统承诺维持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对手可以解释或曲解他的立场，使人怀疑美国是否有意愿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从而削弱了美国威慑的可信度。

国会通过预算权 ，也推动了核武器生产联合体的消亡,并且削弱了核武库的可信度。它在 2008 年切断了“可靠替代弹头”计划的全部资金（由总统于 2009 年 3 月正式终止），切实阻止了国家核安全局实施联合体 2030 方案，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振核武器生产联合体，恢复制造新弹头的能力。[38] 即使国会批准总统 2011 年的预算请求，包括增加国家核安全局经费，改善某些基础设施和翻新三叉戟导弹核弹头和 B—61 炸弹，但是国会仍然缺乏坚定承诺核威慑的意愿，没有下令设计新弹头，没有保证生产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没有指示开展新的核当量武器试验。

反对设计新核武器或试验现有武器的最大政治力量，来自那些认为从事核设计和试验活动将助长武器扩散并减弱美国反扩散可信度的人士。但是，这一立场与历史事件并不相符。自从美国于 1992 年单方面停止核试验以来，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韩都进行过核武器试验，其中有三个国家是第一次进行核试验。目前，伊朗很可能在寻求研制核武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曾经积极从事研发核武器项目，但迫于密集的军事和政治努力而收敛。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克制延缓了其它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决心。此外，如上所述，如果美国的盟国不再相信美国的延伸威慑是建立在可靠的能力之上，他们也可能开发核武器。美国通过不搞核扩散并且追究所有扩散核武器技术国家的责任，可以最大程度地巩固自己核不扩散的立场。以设计和试验来维持美国的核武库决不会扩散核武器，但肯定可以威慑那些试图获得与美国的战略均势、或者企图通过威胁使用核武器来胁迫美国的国家。因此，尽管上述政治反对力量有良好的意愿，但是反对维持强大而可信的核威慑的做法，实际上更可能使核扩散发生。

建议

美国应设计、试验、生产并部署一种新型核武器，以维持核武器生产联合体的运作，确保核威慑的可信度。利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可制造出更安全和具有反破坏技术的武器。此外，低当量武器能够扩大军事用途，并避免不可接受的附带损害。再者，穿透型武器能够对深藏地下的目标构成威胁，从而消除高当量武器的需要。

在“可靠替代弹头”项目终止之前，国会指示国家核安全局让“杰森咨询小组”对“可靠替代弹头”项目的必要性进行一次独立的同行审查。“杰森咨询小组”是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具有声誉的权威机构，就国防事务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39] 该机构认为：“为确保国家核威慑的可行性，美国必须现在就启动并投资“可靠替代弹头”项目，这样才可使现在可信的威慑与将来所需的威慑之间不至脱节。”[40]

设计、试验和生产新武器的过程将重振美国核武器工业基础，确保现有技术和知识能力能够验证武器库存的可靠性，从而恢复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信誉。此外，它可以向朋友和盟国表达美国坚守延伸威慑的承诺与决心，从而让他们放心，不需要去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另外，这一过程将向俄罗斯和中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试图获得超过美国的核优势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而留在核武器控制体制之内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没有任何技术理由阻挡立刻启动这一项目 —我们所需要的是付诸行动的政治意志和决心。

结论

鉴于技术和财政现实，美国的威慑依赖于核武器。在我们找到高度可靠方法战胜针对美国的核攻击之前，在我们的反击力量能依靠远程打击技术进步对任何敌人的核力量实施确保成功的毁灭性反击之前，美国必须依靠强大核能力所展现的威慑力量。没有任何其它武器系统能够为美国的生存提供同等的保障。

创建更安全世界的努力正被误导，美国眼看着支撑其核威慑战略的能力萎缩，对其核武库可靠性的信任减弱，对其在必要时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意志的信心动摇，却无动于衷。如此以往，随着美国核威慑可信度受损，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只会增加而非减少。设计、试验和部署新的核武器将有助于重振美国核武器生产联合体，并恢复美国威慑的可信度。♣

注释:

1. Melanie Kirkpatrick, “Sounding the Nuclear Alarm”[拉响核警报], Wall Street Journal, 22 November 2008,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731227702749413.html (accessed 24 April 2010).
2. Jonathan Medalia, The Reliable Replacement Warhead Program: Background and Current Developments [可靠替代弹头项目：背景与近期发展], CRS Report RL 32929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7 July 2009), 4, http://opencrs.com/document/RL32929/2009-07-27/download/1013/ (accessed 24 April 2010).
3. 同上，第 45 页。
4.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Nuclear Weapons: Annual Assessment of the Safety,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of the Nation's Stockpile”[核武器：美国武器储备安全、性能与可靠性年度评估], GAO-07-243R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 February 2007), 4, http://www.gao.gov/new.items/d07243r.pdf (accessed 27 April 2010).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见注 2，第 45 页。
9. William J. Perry et al., America's Strategic Posture: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the Strategic Pos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战略态势：美国战略态势国会委员会最终报告] ,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9), 20, http://media.usip.org/reports/strat_posture_report.pdf, (accessed 24 April 2010).

10.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radcany Square, Prague, Czech Republic,” 5 April 2009,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奥巴马总统 2009 年 4 月 5 日在布拉格演讲], http://www.whitehouse.gov/the_press_office/Remarks-By-President-Barack-Obama-In-Prague-As-Delivered/ (accessed 24 April 2010).

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联合作战构想总纲文件], version 3.0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5 January 2009), 30—31, http://www.dtic.mil/futurejointwarfare/concepts/approved_ccjov3.pdf (accessed 24 April 2010).

12. MSgt Ben Gonzales, “STRATCOM Leader Charts Nuclear Path for American Military” [战略司令部领导人为美军规划核道路], Air Force News Agency, 23 September 2008, http://www.af.mil/news/story.asp?id=123116467 (accessed 27 April 2010).

13.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Nukes We Need: Preserving the American Deterrent” [我们需要的核武器：保持美国的威慑力], Foreign Affairs, 88,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9): 41.

14. 同上，第 49 页。

15. 同上，第 51 页。

16. 见注 9，第 20—21 页。

17. 见注 9，第 10 页。

18. John Michael Loh, “Ensure Nuclear Deterrence by Developing New Bomber” [发展新型核弹，保障核威慑力], Omaha World-Herald, 7 December 2009, http://www.omaha.com/article/20091207/NEWS0802/712079997 (accessed 24 April 2010).

19. 见注 9，第 21—22 页。

20. 见注 1，第 1 页。

21. 见注 1，第 2 页。

22. John S. Foster Jr., chairman, FY 2001 Report of the Panel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Safety, and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Nuclear Stockpile [美国核武器储备可靠与安全评估小组 2001 财年报告],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5 March 2002), 4, http://www.fas.org/programs/ssp/nukes/testing/fosterpnlrpt01.pdf (accessed 27 April 2010).

23.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NNSA Delays Modern Pit Facility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and Selection of a Preferred Location” [国家核安全局推迟现代核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和优先地址选择], 28 January 2004, http://nnsa.energy.gov/news/print/1516.htm (accessed 24 April 2010).

24. Pam Sohn, “TVA Argues for Tritium Production at Sequoyah” [TVA 为 Sequoyah 氚生产辩护], Chattanooga Times Free Press, 4 February 2010, http://www.timesfreepress.com/news/2010/feb/04/tva-argues-for-tritium-production-at-sequoyah/ (accessed 27 April 2010).

25.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Panel on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Readiness of the U.S. Nuclear Workforce for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美国核业界员工准备应对 21 世纪挑战], June 2008, 12, http://www.aps.org/policy/reports/popa-reports/upload/Nuclear-Readiness-Report-FINAL-2.pdf (accessed 24 April 2010).

26. 同上。

27. Walter Pincus, “Obama Budget Seeks 13.4 Percent Increase for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寻求为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增加 13.4% 预算], Washington Post, 3 February 2010, A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2/02/AR2010020203884.html (accessed 27 April 2010).

28. Senat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on Energy and Water Development, Hearing on President Obama's Fiscal 2011 Budget Request for the 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总统 2011 财年国家核安全管理局预算要求听证会], 111th Cong., 2nd sess., 10 March 2010.

29. 见注 22，第 2 页。

30. 见 注 2，第 12 页。

31. 见 注 2，第 7 页。

32. 见 注 2，第 6 页。

33. 见 注 2，第 5 页。

34. 见 注 2，细节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应高度信任库存保管方案（SSP）。一般来说，支持评估的人认为，由于以往测试数据的详细程度，建模和仿真技术的发展，以及高功率计算的巨大进步，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为衰老对武器的全部影响进行精确建模。

35. 见注 28。

36. 见注 10。

37. 见注 10。

38. 见注 2，第 1 页。

39. 见注 2，第 2 页。

40. 见注 2，第 3 页。2010 年 3 月 10 日，在美国参议院拨款能源和水利发展小组委员会审议总统对国家核安全局 2011 年预算要求的听证会上，参议员范士丹和达戈斯蒂局长诺有一段交谈。达戈斯蒂诺承认，杰森小组 2009 年表示，它认为现有的核武器可以很好地延长到未来使用。但他同时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已不能用三四十年以前的方式来制造武器。我们只是没有人，没有这方面的加工技术。参看 Senate Appropriations Subcommittee on Energy and Water Development, Hearing on President Obama's Fiscal 2011 Budget Request [奥巴马总统 2011 财年国家核安全管理局预算要求听证会].

我们欢迎读者品评本刊文章，或提出有关改进刊物质量的任何建议。请用电子邮件将评论直接发给 aspj.chinese@yahoo.com。编辑部可能按版面需要对读者来信及作者答复做适当编辑。

读者评论“在伊拉克强悍到底”

如果美国政府不因任何政治或军事变数改变决定的话，从现在开始还有约一年，即到 2011 年底，美国将完成从伊拉克撤军的任务。事实上，撤军过程早已开始。在许多人的眼中，这场战争，连同美国政府的撤军宣示，没有解决“为什么而战”、“是否值得”、“谁赢了”等问题。还有，在美军完成撤离后，还会进一步出现“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撤军以后呢”等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我阅读了贵刊“在伊拉克强悍到底 — 空军为何必须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最后撤出”（中文版 2010 年秋季刊，英文版 2010 年夏季刊）一文。

毫无疑问，美国空军在从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的各场战争和作战行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没有美国空军情监侦情报覆盖、严密监视、创造作战环境、运送人员物资、作战保驾护航、以及近距离控制支援等，美军地面部队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作者实际上也就是根据以上这些作用和功能来论证空军必须最后撤出的理由。不错，战争还没有彻底打赢就要抽身走人，肯定需要空军押阵或者殿后（说白了），因为正如作者所说，这场战争不是“我们原来希望的或日后想要的战争”，也就是说，美军可以决定撤军日期，但是无法决定撤军时的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今年 8 月份的部分撤军行动，美军是悄悄地出去的。不友好的撤军环境，是美国空军必须最后撤出的最简洁、最合逻辑的理由。

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撤军决定讲话和国防部长等美军高级领导人的发言中，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撤军只是撤离“作战部队”，美国仍将有相当数量的“非作战”人员，包括现役军人，驻留在伊拉克，帮助维稳和伊拉克国内协防。那么，这些人的“非作战”行动和安全由谁来保驾？美国政府没有达到的国家目的由谁来继续努力？这两个问题其实和我在第一段中的最后两个问题相关。这篇文章没有继续朝此方向发挥，但是可以认定，美国空军将是美军下一步解决方案中的关键军种。

可以想象，即使美国空军最后撤离了伊拉克，仍不会离远。类似“南方守望”和“北方守望”的行动仍将不断上演。美军的军靴虽然不再踩在伊拉克的土地上，但美国空军仍将从空中继续牢牢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军事形势。所以，在可见的未来，美国空军不会真正撤离伊拉克。不当之处，请编辑和读者指正。

贾明正
中国南京

读“在伊拉克强悍到底”一文，觉得比较吃力。倒不是因为文章翻译得不好，是因为句子中缩写词太多，记不住。我注意到贵刊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页已经把这些缩写词归拢在一个小方框中，以方便读者参照。这种

做法当然很好。但是，如能尽量减少缩写词，则更好。比如前面有些文章中把 IRS（情报、监视、侦察）缩写成中文的“情监侦”，就很好。按照这种方式，也许可以把 CAS（近距离空中支援）缩写成近空支援。总之，我觉得，凡中国读者不熟悉的缩写词，或者作者为了文章方便而自己编造的缩写词，在译文中最好全部译出，如太长，可想法缩减，最后才考虑使用英文缩写词。一篇文章中，有一两个缩写词不要紧，如果太多，那看着头就要大了。

当然，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本来就和东方人有些区别，英文表达方式又不同于中文，《空天力量杂志》能把这些文章原原本本地、流畅地发表出来，已经不容易了。

中国北京
一名读者

读者评论“带兵之道（续篇）”

洛伦茨将军的“带兵之道（续篇）”（中文版 2010 年夏季刊，英文版 2010 年秋季刊）就像是打出一个完美的本垒打。虽然将军可能不在乎荣耀和名利，但我相信所有队员都会蜂拥站到本垒板上，祝贺将军打出的漂亮球。在某种意义上，空军官兵就像一支棒球队的队员一样，各有特长，各居一位，但必须团结协作，才能实现整体发挥。洛伦茨将军带兵，擅长激发，擅长鼓励，把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出来。他的几篇“带兵之道”实实在在，都说到了点子上，帮助我掌握了催发敦促军人奋进的基本要素。我身为一支由军官、士官和文职人员组成的飞行中队的指挥官，把我从将军文章中学到的心得运用到人员和团队培养计划中。我们把这些培养计划称为“洛伦茨项目”，因为其中反映了将军在文章中所提倡的那些原则和观念。洛伦茨将军，再次感谢你对空军队伍的建设、尤其对空军最重要的资产 — 空军官兵 —的培养所做的奉献。

Patrick A. Brown，美国空军中校
俄亥俄州 Wright-Paterson 空军基地

读者评论“哥伦比亚可以教阿富汗（和美国）如何取胜”

作为对海迪克先生这篇文章（中文版 2010 年秋季刊，英文版 2010 年夏季刊）的呼应，我认为美国对那些陷入反叛乱斗争的国家提供支持，真正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能够持久的社会均衡结构。多少文章都声称能为这类复杂的问题提出解决之道，然而却又脱不开“取胜”的巢臼，一味地解说如何打赢。

我国参与了哥伦比亚的小战争，并在不久之后以小投资获得大回报。但是在阿富汗，我们未能有序结束一场大战争（即使不是军事意义上，至少在政治意义上）。虽然海迪克先生建议的解决方案可能为阿富汗带来社会均衡，使美军抽身而出，但这样做也许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政府的意愿是希望阿富汗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央政权。如此来看，八年战争至今，以这样的终局收尾，能用“取胜”来表示吗？我觉得“求实”更加贴切。

Rick Bennett
弗吉尼亚州 Suffock 联合作战中心

我以巨大兴趣拜读海迪克先生的文章，但不得不指出哥伦比亚与阿富汗的重要差别。哥伦比亚是民主政体，人民亦广泛认同自己的国家。相比之下，阿富汗无中央政权可言，领导阶层更多体现为部落性质而非中央性质；各部落多为自治，追求的目标也与中央政府毫不相干。这种形势的实际体现就是阿富汗中央政府只能管住几个城市而已。

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派系之间的结盟不断变换。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哥伦比亚虽在西方世界之外，民众却习惯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反观阿富汗，其思维方式迥异于我们的西方理念。不幸的是，在美国和北约组织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这种状态还将继续缓慢恶化，一如当年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

Marcos Daniel Funes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哥伦比亚可以教阿富汗（和美国）如何取胜”作者回应

Funes 先生点出了哥伦比亚和阿富汗之间的一些重大差别。我同意这两个国家在文化和历史方面有着重大差异，拙文中对此也有着笔。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两个国家在叛乱局面上的相似之处，拙文中对此亦有讨论。

Funes 先生指出：阿富汗社会以部落统治为主，而非中央统治为主。我认为这种特征支持拙文中的观点，这就是把哥伦比亚的平叛做法移用到阿富汗。哥伦比亚的“家乡保卫排”组建计划对非中央化的阿富汗似可适用，因此正引起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成员的强烈兴趣。阿富汗基于本身文化背景，对强化中央集权的做法表现出明显的抵制，故而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意图建立大型国家武装部队和警察部队的现行计划背道而行。还是借鉴哥伦比亚的做法为上策，即建立规模小但精炼且专业的直升机机动部队。

最后一点，我们应回顾 1990 年代哥伦比亚的乱象。自那段黑暗时期以来，国家的安全形势已取得巨大改善，虽然继续面临各种挑战。这种改善表明：明智政策和良好领导能够开创新气象 — 即使是在阿富汗。

Robbert Haddick
美国马里兰州

读者评价本刊

感谢贵刊每期发来的增刊。经常选择阅读其中一些文章，感觉最深的就是，美国军人总体上来看做文章很认真，写的东西有观点，有深度，不认真做不出来。无论是前沿军事理论，或是当今面临问题，或是以往战例反思，多能从独特的视角开展讨论并提出具体建议和对策，少有空话废话大话。希望这些文章对咱们中国某些专业杂志、编辑和作者有所触动。

兹举一例解说“认真”问题：最近从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看到中国 2010 年征兵宣传画，广告词一共才三句话，怎么看都觉得不认真。

第一句：人民军队，正在为更伟大的未来，招募那些最优秀的士兵。问题：青年入伍后，才成为士兵。

第二句：如果你是其中之一，请加入我们。问题：“如果你是其中之一”在语气上不妥（可能是借英语中的表达方式 if you are one of them），感觉上有排他（比如有志向但次优秀者）倾向，并且部队的优势在于把平凡培养成卓越（例如《士兵突击》连续剧中的许三多）。

第三句：请向您当地的人武部或征兵办公室了解详情。问题：这句中用的是“您”，而第二句中用的是“你”。

也许是吹毛求疵。但是一如贵刊文章所表现的，学术研究必须有吹毛求疵的精神。上述广告例虽非学术，却比一般学术文章的影响更大。

中国老留学生
美国弗吉尼亚州